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四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第五篇 刘少奇篇（下）

十、拉锯战

（一）烽火起西楼

陈云，生于一九零五年，卒于一九九五年。

户籍：青浦人。青浦现在是上海的一个区，当年属于江苏的一个县。

性格：谨慎、低调、务实。

特长：搞经济。

官方评价上，陈云获得足够多的赞誉——当然，陈云配得上这些赞誉。

在中共历史上，在重大问题上，陈云从来都不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更多时候，陈云扮演了一个沉默者的角色，隐藏在众多声音之后，正如在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然而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要。不管在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陈云都有相当的分量。特别是邓核心时代，陈云更是举足轻重。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陈云的声音并不响亮，但是陈云的一生足够精彩，看看他的经历就知道了。

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寒微，陈云仍然是寒微的表率。陈云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然而生长在长三角地带的陈云和中部那些出身贫寒的将帅不同，没有贺龙那种马帮经历，也没有彭德怀那种苦工经验。陈云比较幸运，念了高小，后因家贫辍学，然后当学徒、店员谋生。这段经历应该是陈云的低调务实的性格的最初成因。

然而陈云同样有激进的一面——二十岁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历任县委书记、省委书记、中央委员——白色时代的虚名，抓住是要杀头的。在整个白区时代，有一个职位值得一提：三一年担任中央特科书记。中央特科干嘛的，大家想必都明白。

在战争年代，将帅们大大地出了风头，陈云则低调地主管财经工作。最重要的职位是——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负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干得很不赖，有力地稳固了中共的后方基地。这个职位锻炼了陈云搞经济的能力。在解放战争期间，陈云在东北干得也不错。所以猛人高岗对陈云比较信服。当高岗决定扳倒刘少奇时，就想到了陈云，想拉拢陈云。因为他们的关系很铁，从西边到东北，合作很愉快。然而陈云没有跟着高岗发疯，而是冷静地和高岗划清界限，从而避过一场劫难。

陈云一生都很低调，静静地隐藏在组织内部，最为高光时刻是解放后。国民党后期，那个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已经超出人类的容忍界限。比方说，想买点阴币给老祖宗上坟，发现阴币和阳

间的货币兑换率低于一比一。也就是说，还不如直接拿阳间的货币去孝敬祖先。题外话，如今的物价如果任其飞升，总有一天能赶上六十年前的水平。

国民党之所以崩盘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搞得太成功，另一个就是国民党自己搞得太差。要不是经济金融崩溃，断不至于败得那般彻底。国民党败了，留下一个烂摊子考验共产党。特别是长三角地区，那个叫无法无天。加上抗美援朝爆发，上海成了一个恶性肿瘤。解放军都进上海了，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人民币去不了上海，陈云就去上海，然后就解决了问题。陈云通过软硬两手打击投机者，借助一系列操作，通过银元、粮食、棉花、和公安局解决了那个烂摊子。当陈云再次回到北京时，毛泽东兴奋地说，陈云此行和打赢淮海战役一样意义重大。

陈云动用十万银元和一部分公安人员搞定了金融投机者，再通过江浙的棉花和粮食搞定了上海的物价，不少投机者只好去跳黄浦江。

陈云整个人生真正的贡献应该是协助邓小平搞改革。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陈云沉默的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段时间是在大跃进。当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足马力创造奇迹的时候，陈云保持了沉默。他的沉默可以理解为犹豫，号称经济专家的他实在无法预测大跃进的走向，也可以理解为明哲保身。即明知政策将带来严重后果，也没有大声疾呼。前有周恩来反冒进，后有彭德怀万言书，都没管用。陈云的声音不可能比周、彭更大。所以他选择沉默不语，即使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亲自请陈云说话，陈云依然拒绝。不是陈云敢在毛泽东面前耍大牌，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表达自己的观点。

时机就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去武汉巡视，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调整经济，消灭财政赤字——又称西楼会议。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发言了，他的发言点燃了战火。

陈云的讲话也是从老一套开始。第一部分摆困难：一，农业，近几年都有很大的减产，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还不如过去，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饿死人了，肯定困难重重，要有耐心。二，在基本建设上，建设规模同国家财力、物力和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炼钢炼多了，工程干太多了，要调整。三，在金融、市场上，因为多发了钞票，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特别是工业品不足，城市里的钞票大量流向农村，在人民生活上，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实际工资下降很多。——国家物质紧缺，百姓口袋里没钱。

第二部分摆了有利条件——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一，党已制定了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干部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各项工作会有显著进步。二，粮食和肉类的产量开始回升。三，人

民同党合作战胜困难的信心足。四，干部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这些都是浮云，问题是解决问题。

第一部分是困难，第二部分是有利条件。困难和有利条件综合在一起，形成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何解决问题呢，陈云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为啥非要等到西楼会议再讲？七千人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和鼓劲。如果陈云把这些观点摆出来，不仅是和大会的主题相违背，而且简直是往毛泽东身上扔泥巴。他敢那么做？不敢，彭德怀头上还顶着若干帽子呢。然而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揭露不少短，也没事，陈云也就放心了。

可以指责陈云不够勇敢，然而事关生存，可以理解。

陈云提出六点意见。

一，从1960年算起，“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大约需要五年，恢复的主要办法有两条：一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二是要稳扎稳打。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要先降下来，速度放慢，以调整为主。

二，减少城镇人口，“精兵简政”。既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又充实了生产第一线。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一是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二是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回笼货币；三是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重点放在农村；四是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一切力量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增加日用品的供应。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具体办法：一是除增产粮食外，保证经济作物增产；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三是拨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目前第一位的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

对此刘少奇非常支持。

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刘少奇说：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非常时期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不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赞同，会后他们一同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

这就是陈云的办法，概况起来：建设为生活（生存）让路。

这些措施相当有效，当时看起来也很中肯，所以大会很赞成。但是这些观点也有缺陷：对恢复期估计得过长。陈云同志虽然很懂经济，却也不是万事通。比如说农业，他就不懂。虽然他是农民出身，但没有种过地，不懂中国农民的“小强精神”。

中国农民是最为坚韧顽强的一个群体。只要政府放宽政策，给一年的时间：粮食给你种出来，瓜果蔬菜给你种出来，猪马牛羊给你养出来，酒给你酿出来，豆腐给你磨出来……两年时间，应有尽有。

所谓五年恢复期——那是书生意气。套用一顶那年头流行的帽子，叫右倾。

后来毛泽东说这是悲观的“黑暗风”，也有道理。

其实“黑暗风”只是表层。在表层之下还有一层坚冰，就是陈云这些措施如果实施下去的话必然引起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和三面红旗相违背，特别是和大跃进相违背。如果站在三面红旗的立场看，这些就是修正。作为三面红旗最坚定的旗手，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修正主义的。因为这些一系列政策，毛泽东曾认为陈云右倾，敲打了一下，并没用力。

在文革大潮中，陈云虽然暂时失业去江西某处“蹲点”，却也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而且七二年就回京再就业了。参照陈云的那些主张，陈云应该随刘邓一起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情形远比一些元帅严重。而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大概是为未来留下一颗棋子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给自己留点后路的话，后路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若干年之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在改革大潮之下，陈云再次成了保守派代表，主张脚步慢一点，稳一点。这里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政见不同而已。

评：懂经济的陈云是个保守派。

（二）庐山遗恨

西楼会议不久，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理由有三个：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就是指西楼会议那一套，现在看看翻案风。

提翻案，就要提到咱们的老熟人——威武的彭大将军。

彭德怀挺起脊梁、昂着脑袋走下庐山之后，就开始了一生中的炼狱之路。

其实彭德怀的一生都在炼狱之中，年幼家贫，历尽人世磨难；少年孤独，迷茫坎坷；青中年研战主军，历尽腥风血雨。腥风血雨之中的彭德怀依然保持平民本色，和士兵同甘共苦，从不奢侈浪费。即使在艰苦朴素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彭德怀依然是艰苦朴素的代表。别人虽然也是艰苦朴素，至少还钓钓鱼啊、抽抽烟啊啥的。彭德怀不喝酒，不吸烟，除了看书和下棋（水平不高）以外，没有任何个人嗜好，简直就是党内的苦行僧。

所以庐山上的朱德说：彭老总艰苦朴素，谁也比不过他。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虽然也是在炼狱，但那是悲壮的。那是一个英雄面对残酷环境写下的史诗，那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奋斗高昂起来的头颅，那是民族的脊梁。和平年代的彭德怀，同样也是炼狱，但那是悲惨的。因为这一次折磨他的都是自己的昔日战友，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人民。

看到文革时代彭德怀那张被反剪双手压下舞台的照片，照片上那干枯的白发，照片上那憔悴的面孔，照片上那弯曲的脊背，不觉悲从中来，泪水纵横。任何一个有血性或者感性的人，都不愿意看到那个一生威武的将军、那个敢于横刀立马的英雄、那个总是在危难之间挺身而出的男人落魄如斯，宁愿他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看他在自家人手上经受磨难。那张照片，已经成了那个悲剧时代的见证，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耻辱。

十大元帅之中，唯有彭德怀没有亲生的孩子，两个弟弟早年牺牲，为革命烈士。解放后，他把弟弟的孩子接到北京，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他们读书。他还把老战友、同样英雄了得的黄公略和左权烈士的女儿视为己出，资助她们读书、生活。

彭德怀来自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对人民有深厚的骨肉之情。所以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义无反顾地挑起志愿军的担子，因为他要消除国家旁边的威胁；所以在庐山上不顾后果去写信，只因为同胞在挨饿而已。

写信的后果很严重。在第三篇里已经分析过，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选择拿下彭德怀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也就是所谓个人恩怨；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彭德怀解决另一个问题，即通过拿下彭德怀来收拾所谓的右派，带领大家一起大跃进，度过难关。

上庐山的高干中，一开始挺彭德怀的还是很多的，后来毛泽东表态之后转而批判彭德怀。并不是这些人没有骨气的，而是他们视组织团结为第一要务。不少高层将帅，一边在大会上批彭，一边在会下劝彭德怀检讨，比如说聂荣臻，比如说叶剑英。

彭德怀最后还是检讨了。原因嘛，无外两条。一是私人的，想通过检讨过关。彭虽然是英雄，英雄并不意味着喜欢被批斗。第二条么，和那些劝他检讨的人一样，维护组织团结。现在很多人认为，彭德怀当初就应该硬顶着，硬顶着结局也不会更惨。这种观点是典型的马后炮，还真把彭德怀

当张飞了。彭德怀的观点已经表达出来了，已经够了，真顶，真分裂组织了。真分裂组织，就能解决大跃进问题？当时彭德怀之所以检讨，也是认为要给毛泽东一个台阶下。然而毛泽东回过头来解决问题。毛泽东是在解决问题，只不过方式和彭德怀的期望相反罢了。

彭德怀虽然检讨，只是个人角度上的检讨，那些原则性错误，并没认。特别是军事俱乐部、里通国外从来就没认过。不但不承认，还要一直讨要清白。我们知道，庐山会议对大饥荒的影响非常大，不仅仅是拿下一个彭德怀那么简单。凡是受灾严重的省份，省委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庐山”。凡是受灾严重的市，市委都有自己版本的“小小庐山”。凡是受灾严重的地、县，也有自己版本的“山寨庐山”。即使刘少奇去调查的天华大队，都有一样的“微型庐山”版本，这样一路下来多少人右倾？要调转政策，势必给这些人平反。要给这些人平反，就要牵扯到这些人的总根子——彭德怀。

离开庐山之后，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种地。在那里，他是农民，百姓中的一员。

起初村里只有一口土井，遇到旱季，井水枯竭；阴雨连天，井水又满贯，实际上就是一个储存雨水的水坑，不卫生。国务院管理局决定在园内打口机井，彭德怀提出要打井不能只给他一个人用，村里人也要吃上机井水。于是机井就打在吴家花园的西北角。此后彭德怀站在大门口，招呼村民进院接水，看着大家笑盈盈地把水挑走。

八届十中全会后，彭德怀的生存环境再次恶劣，门卫就不许村民入院接水！彭德怀大发一顿脾气之后，把一个叫景希珍的叫到大门口，说：你去找水管子，由我出钱把井水引到墙外去，再在下面垒个水池，不就行了吗？几天以后，大墙外水池前担水的人排起队，阵阵笑语。

那年头吴家花园左右的居民没有电灯，夜晚来临，园内灯光明亮，园外漆黑。彭德怀想帮助大家用上电。当时都困难，既没钱，也没材料。彭德怀掏腰包，买电杆电线，把电搞好，周围的百姓有了电用。

六一年夏天，多雨。一次暴雨连夜，凌晨四点钟，彭德怀翻身下床，披雨衣外出，趟着深水，直奔村民卢兴院里。卢兴家的两间老房正在暴雨中飘摇，一家老少八口缩在危房内听天由命。彭德怀站在院里大喊：“快走！都到我那里去！”卢家人执意不去（估计怕犯错误）。彭德怀冒雨跑回吴家花园，叫哨兵搬来芦席，自己拿着电筒，指挥哨兵给卢家苫房。这一时刻的彭德怀应该忘记了戴罪之身，依稀重回战场的感觉吧。此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依然无所畏惧。之后彭德怀没有再睡，在雨中逐户查看，把危房中的人家都叫到吴家花园来，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坐满了老人和孩子，彭德怀把热姜汤一碗碗送到淋了雨的人手中。

——凌晨四点钟到早晨，全国官吏绝大部分都还在美梦中，而被他们疯狂批判的彭德怀却干着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屑做的事。这就是彭德怀，即使身陷囹圄，也不失实实在在的本色。如果官吏能

有他身上一半实实在在的精神，何必需要那么多理论！何必需要那么多运动！如果在百姓身上培养这种实实在在的品质，贪官污吏如何生存？千年以来的官僚迷局将不治而治！何愁不能国强民富，天下大治！

四年之后，彭德怀即将离开吴家花园赴三线上任，中央专案组派人去挂甲屯调查，写《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如下：“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这样一个平凡朴实的人，有必要去打压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因为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那是一段悲剧的历史。我们今天翻开那段历史，主要出发点就是试图寻找悲剧的原因。

七千人大会上的结论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刘少奇和毛泽东这对矛盾的双方都公开说彭德怀不能平反。为何？

刘少奇说彭德怀不能平反，还发挥理论家的功底以政客的方式煞有介事地编制了一大堆谎言。原因可以找到两个：一，彭德怀是毛泽东亲手推下去的，他知道毛泽东不愿意给彭德怀平反，趁机编制一堆理由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不能平反，用意安慰毛泽东。因为刘少奇还在幻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不给彭德怀平反，也在打一张感情牌——从感情上安慰毛泽东。

第二个原因：对刘少奇来说，彭德怀是一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对自己不买账。这样一个人平反出山，可能会给自己的经济调整带来阻力，放出来还不如压着。

这是刘少奇的想法。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亮出阶级底牌，刘少奇正准备大干一场。一段时间之后，刘少奇就改变了策略，希望彭德怀出山了。因为局势变了，这是后话。

毛泽东的态度有点难以理解。既然当初因为大跃进拿下彭德怀，现在大跃进已经彻底失败了，为啥还要压着？难道真是所谓个人恩怨么？从后来的局势进展来看，毛泽东并没放彭德怀出山的意思。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从来不认为三面红旗有啥错了，当时也没有人能从理论上指出三面红旗哪里错了。所以那些反对三面红旗的人，那些曾经因为狂热支持三面红旗而造成大饥荒肆虐的人，都将再次被“救治”。

救治也有很多办法，比如说陈云和邓小平，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比起彭德怀就差远了，或许这就是政治家和军人的不同吧。把文革期间彭德怀写的材料和邓小平写的材料拿出来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别。

毛泽东为何对彭德怀如此狠？完全纠缠个人恩怨也可以聊以自慰，这里还能找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延安整风分析过，彭德怀成了被整对象。挑彭德怀为八路军代表参加整风运动的原因，并非彭德怀有啥大过错，百团大战啥的都是表象，真相是虽然军人，彭德怀身上有一种难得的独立性——尊敬毛泽东却不盲从。这个独立性让他有别于其他将帅，这样的统帅在领袖走上神位的过程中看起来非常刺眼。当毛泽东想要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去大跃进，并且出现问题的时候，其他人可能都会沉默，彭德怀绝对不会。再比如后来的林彪事件，彭德怀已经自身难保了，仍然发表看法。

世事会变，彭德怀不会变。毛泽东对这点非常清楚，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彭德怀出来。至于后来放彭德怀去三线，那是不得已为之，权宜之计。这点后面再谈。彭德怀出山的情况只有一个：战争。比方说美国从越南那边进来，或者苏联从北方突击。毛泽东很可能把彭德怀放出来。原因很简单：彭德怀身上有那种难得的独立性，天然的统帅。不仅是彭德怀，粟裕、刘伯承也会在那一瞬间恢复光亮。

（三）第三股风——单干

所谓黑暗风，也就是一种经济调整政策。

所谓翻案风，也就是政治纠纷而已。

真正触及到国家根本的还是第三股风——单干风。

七千人大会虽然开得相对成功，但是政策下达并不及时。西楼会议上制定了一系列策略，仔细分析一下那些策略，也都是纲领性的东西。所谓纲领性的东西，就是那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向左或者向右都可以，解释权在最高层。最高层的毛泽东没怎么表态，地方来不及细化。加上大会上解决左倾问题，很多之前被打成右派的被平反。这些被平反的人和曾经打倒他们的人本来就不对路，个人恩怨和见解纠缠不清。

一部分往东，一部分往西，大家也不清楚中央究竟向左还是向右，要形成合力并不容易。对于想干事的官员来讲，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团乱麻。想在政策路线不明的时候解决问题，根本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牙。当官也难啊！

这个时候政府的管理力度下降。老百姓自然按照惯性生活。老百姓惯性生活，就是数千年以来的那种生活状态：弄几亩田种一种，养点牲口种点菜啥的，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大家再也不愿意去公社过集体生活了，再也不愿意去吃公共食堂了。就按照之前政策放出来的口子单干了。转瞬之间就形成一股风气，叫单干风。

啥叫单干风呢？就是原来吃食堂，现在在自己家吃饭；就是原来大家一起种地，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各种各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又回到土改之后的那段时间里。特别是一些大饥荒比较严重的地

方，比方说安徽，百分之八十的土地都分了。

共产主义讲集体的，单干，呵呵，大家都懂得。

老百姓一单干，三面红旗名存实亡。毛泽东能容忍么？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心里都在敲边鼓。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继续外出巡视，同时派秘书田家英外出调查。调查出两个结果：一是农村情况正在好转，二是大家正在分田分地。田家英回到北京之后，毛泽东不在，便向刘少奇做了一个汇报。

田家英的行动非常准确及时。不但行动准确及时，而且思维活动准确及时，包含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包产到户合法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提法。为了这个了不起的提法，了解一下这个了不起的人。

田家英生于一九二二年，四川人，一介书生。

十五岁赴延安，先入陕北公学，第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由于思想活跃，经常给报社写文章。在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年代，田家英在延安相当活跃，活跃到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毛岸英回国，中文不咋样，需要中文老师。二十六岁的田家英去毛泽东家搞“家教”，给毛岸英当老师。两年之后“家教”老师变为毛泽东的秘书。田秘书年轻力壮，记忆力超强，且行事谨慎，深得毛泽东赏识。比方说毛泽东写诗，引用某个警句却找不到出处，不用亲自查阅，只要找田家英就行了，相当于今天的度娘。此外田家英还管很多事，包括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田家英给毛泽东的帮助，比毛夫人还多。因此田家英和毛泽东的关系极为亲密。后来号称大笔杆子的陈伯达，想要探听毛泽东的动向都要请教田家英。如果田家英机警圆滑，向前任陈伯达学习学习，应该非常有前途。然而很遗憾——田家英是个书生，一个可贵的书生。

书生，意气风发，不懂隐藏，更不懂隐忍。当书生认为领袖正确时，书生气会从正面发挥作用。便把自己的身心投入到领袖的世界里。战争年代，田家英把自己的全部才华、精力、智慧用在照料毛泽东上。比方说，刚进城时，毛泽东的书籍并不多。几年之后，在田家英的细心料理下，便有六位数藏书。当书生认为领袖不正确时，书生气便从反面产生作用。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等人就赞同彭德怀的主张，差点右派了，被毛泽东特意给撇开：“不要把我的秀才都挖走了。”吃一次亏应长一次乖。田家英不是，三年之后更进一步，直接赞同包产到户了。对错且不论，敢于坚持独立表达观点，尽了知识分子的本职（对比康生、陈伯达之流简直是云和泥的差别）——这就是田家英的可贵之处。世界需要这种敢于独立表达观点的知识分子，而非那种号称知识分子却整天唧唧歪歪、啰嗦不停、一见到利益马上就像看见鸡蛋裂缝的苍蝇。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合法化。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仅是田家英一个，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应该也说过，也就是主张“要退够”。对此刘少奇并不陌生。

刘少奇一听田家英的报告，竖起大拇指，赞同。

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刘少奇说：“可以。”

田家英这一问非常有意思。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毛泽东派出去调查的，观点是他自己的，本来就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为何询问刘少奇可不可以报告毛泽东？应该解释为，此刻的田家英已经在思想上向刘少奇倾斜。如果是他的个人态度，跟毛泽东私下说说，毛泽东估计会对他批评教育一番了事。经过刘少奇赞同之后，也就相当于得到刘少奇的认可。刘少奇是国家首脑，不便轻易发表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才拿出来。田家英这一问实际是在提醒刘少奇：毛泽东可能不同意。

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田家英去汇报。毛泽东没说啥，但脸上写满了阴云，然后凝固成雨滴。很明显，不赞成。而田家英的级别太低了，跟田家英说没有任何用处。

接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了，地点是在中南海游泳池。

据王光美和刘源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记载：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关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 you，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泽东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少奇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这段记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两人的心境和难处。两个人站在三面红旗下面，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均感到相当棘手。

毛泽东问刘少奇为啥没顶住，问题不在于是否顶住，而在于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政策怎么实行，毛泽东心中并无成竹。刘少奇更有趣了，直接说什么不违背组织原则，明显顾左右而言他嘛。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刘少奇终于道出心底的苦衷——人相食，要上书的。这句话应该是刘少奇心底的话。不是想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实在是承受不了历史的重压啊！所谓战友也罢、领袖也罢，在历史的污点面前都不那么重要。这一切应该在湖南考察的四十四天里形成的吧？毛泽东也平静下来，何必呢，争吵无疑，那就静待未来吧。

此次会见不久，毛泽东终于亮出来自己的底牌。

翻开毛泽东的底牌之前，交代一下勇敢的田家英的结局。田家英看陈伯达等人不爽，陈伯达等人看田家英也不爽。既然不爽，那就等机会吧。看看谁先露出破绽。僵持到最后，田家英因为书生意气败给了陈伯达等人。

田家英的书生气在三年之后发挥到淋漓尽致。

六五年，田家英随毛泽东在长三角地带，此时毛泽东正在策划文革。十二月八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打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枪。

十二月二十一号，毛泽东回到杭州，召开“秀才”会议。就是找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几个人开会。这是这几个人最后一次以同志身份团结一致（表面上）听从最高领袖的训示。从此之后就壁垒分明，天各一方。若干天之后，艾思奇病逝。若干天之后，田家英自杀。若干天后，胡绳挨批，若干年后平反。若干天后陈伯达和关锋升天，若干年之后又掉入地狱。

此次会议毛泽东谈及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的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句话要了田家英的命。

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向江青报喜。因为批《海瑞罢官》是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因此毛泽东的话就成了江青的喜讯。毛泽东的话只是口头谈话，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整理一通宵，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因为田家英不仅对庐山会议批判

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事实上，毛泽东此次谈话的杀机就在这几句话中。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一个秘书竟然敢随便删改领袖的谈话，说不好听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意见归意见，也不该这么干。特别是山雨欲来之时，对手虎视眈眈，欲除之而后快时，露出这么大一个破绽，相当于把自己推入火坑。江青和陈伯达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污蔑、报复、审查都来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上吊自杀，年仅四十四岁。

田家英是一个可贵的人，拥有可贵的书生气，遗憾地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

（四）北戴河——阶级斗争

北戴河是个好地方。冬暖夏凉，空气清新。大海让人心旷神怡，有海浪和日光洗去生活的烦忧。清晨观日乃人生一大乐事。今日去北戴河，有吃有喝有得玩，可以过半仙一样的生活，前提是银两得备足够。

早在秦始皇时代，老头子东巡至此，刻石为证。百年后汉武帝仿效之。又过三百年，曹操也带来一队人马晃悠来到这里，在秦始皇的石头旁边写了首诗——《观沧海》，害后世的学生耗费了无数的记忆细胞。又过三百年，唐太宗在东征高丽失败后路过。又过六百年，元世祖忽必烈干脆“发民九千，伐木于山及取寺庙、坟墓之树”，“平滦造船”。又过三百年，清人来了，然后列国战舰跟着来了，于是北戴河海滨沦为耻辱的“各国人士避暑胜地”。新中国建立之后，北戴河回到祖国的怀抱。那里增添了休养所、疗养院、海滨泳场、饭店、宾馆等。国家领导人、社会贤达经常来这里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江山。

有毛泽东诗词为证《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北戴河除了度假疗养，还是开会的好去处。从五四年开始，每年夏天，中央都会到北戴河开会，一边开会一边避暑。很多重要决定都是在北戴河做出的，比方说炮击金门。一九六二年八月照例举行北戴河会议。此次会议并不有名，却足够重要。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重提阶级斗争。

早在六一年研究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八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后面加上“充实”。这样就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刘少奇接下来也强调这几个字，好像找到了新法宝。

现在宣传上讲，这八个字是当时老一代英雄们发现的，把国家从困难中拯救出来。抛开宣传立场而言，这八个字比总路线“多、快、好、省”高在哪里？还真看不出来！说白了就是用一个口号代替另一个口号而已。

此时离文革还有一段距离，文革思想还没有最终形成。然而毛泽东已经无法容忍社会上一系列背离三面红旗的现象了，他决定解决问题。问题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在理论上突破三面红旗，依然坚持三面红旗绝对正确，而且三面红旗是第一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晶。毛泽东站在三面红旗的立场上看问题，就看到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

为啥会有这一系列风气？阶级敌人么！除了阶级敌人还能找到更好的答案吗？很难。在那个知识水平不够且并不注重客观规律的时代，大家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共产党领导全国百姓不辞劳苦去干活，没有理由干不好哇！打仗都能搞定，干活怎么就干不好呢？然而确实没有干好。本来应该干好，却没有干好，自然而然地认为：劳动成果被破坏了。那些人是谁？虽然暂时看不见摸不着，但一定存在，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会议八月六号开幕，毛泽东讲话，三个主题：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

毛泽东说：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毛泽东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

毛泽东说：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三天之后的小组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接着又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总结起来一句话：国家内部、党内有坏人，要抓出来；不抓国家就会变质，就会两极分化，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极端理想主义色彩，好像说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社会现象。

北戴河会议之后是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也不太有名，但同样重要。

吴家花园西北角那口机井，原本解决了整个村子吃水问题。然后门前卫兵就不准百姓进去打水了。彭德怀为了给百姓吃水，就把井水用水管引到花园外边。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意味着全国风云又变了。这个细节变化是以八届十中全会为背景的，这次会议相当于北戴河会议的延续。

北戴河会议只是理论，这一次则把阶级斗争再次实践了一下。要实践这个很简单，把右倾代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拉出来批判一番就行了，现成的。当然为了增加新鲜感，又增加了一个人，习仲勋。

习仲勋，陕西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卒于二零零二年。早年参加革命，陕北时期差点被肃反杀掉，中央到达陕北后捡回一条命。解放战争期间协助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彭习两人关系非常不错。曾任西北局书记，为一方大员。解放后曾任宣传部长。

习仲勋和毛泽东的关系也不错。作为自己救过的人，毛泽东对习仲勋非常信任，曾称赞三十三岁的习仲勋是从群众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五二年土改，毛泽东看见习仲勋写的报告，非常欣赏。就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轻有为。”薄一波回答。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五二年七月新疆动乱，局势复杂。毛泽东让习仲勋处理此事。习仲勋完满地解决问题。事后毛泽东赞誉：“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意思是说习仲勋一次就解决了问题。

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习仲勋是非常欣赏的。然而欣赏归欣赏，毛泽东是不会为了习仲勋改变原则的。也活该习仲勋倒霉，因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触动了另外一个人的神经。

一听阶级斗争，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大鳄揉揉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康生同志知道自己的菜又来了。他再一次收起颜面和廉耻拼了老命充当强人爪牙。也许大家不理解，为何康生这个人那么惹人厌烦。比方说吧，四人帮中的张春桥，也是干了不少害人的事。但张春桥从来没有背离他坚持的路线，是一个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康生不同，临死之前跑去跟周恩来告密状，为了身后事出卖同一条战线的战友，看似聪明，实则葬送了最后一点廉耻。若干年后，张春桥等人的评价或许会变一变，而康生永远不会变，只可惜了那一身的才华。

会上，精明的康生以其独特的观点指出，李建彤写的《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同时康生指

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同时康生再次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是反党。康生同志的逻辑是这样的，《刘志丹》这本小说美化了高岗，其实也谈不上美化，就是说点高岗和刘志丹在一起的功劳。既然习仲勋说小说写得好，那么就表示习仲勋同情高岗。因为高岗反党，所以同情高岗的习仲勋也反党。从此习仲勋同志光荣加入反党集团，直到十八年后平反。

当然，康生同志敢于如此嚣张，是建立在毛泽东的言语上的。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康生根据这些话把习仲勋变成反党成员。再次钦佩康生同志的推理才华。如果把这项才能用在理论物理学方面，说不定解决了爱因斯坦的困惑，呵呵。

（五）阶级斗争的思想基础

那个时代的人知道阶级斗争的残酷么？答案是知道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如果不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大家也没机会当领导。那个时代的人想要阶级斗争么，不想，当领导多爽啊，何必要去斗？都不傻么？

那么阶级斗争为啥还是诞生了呢？答曰，因为必须诞生所以诞生了。

阶级斗争比洪水猛兽凶猛，但绝非天上掉下来的洪水猛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有一个传闻，说一个很有钱的丈夫杀了自己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妻子然后自杀。一听这个消息，大家就觉得纳闷了，为啥子呢？好吃好喝好玩好好生活不好么，何必寻短哩？然后大家了解到更多：原来这个年轻漂亮有名气的女人不想要那个男人了，要离婚。一部分人长出一口气：啊，原来这样！男人的行为可以理解么，虽然太极端了。然后大家又了解：女人之所以不想要这个有钱的男人了，是因为男人已经四十多岁了，还离过婚，有孩子，而且可能还搞过外遇，而且还想把年轻漂亮有名气的老婆严格看管起来。这样一来，大家自认为了解全部，全然忘了他们当初结合时也有过恩爱和甜蜜，矛盾一点点积累，分歧慢慢浮现，最后才闹得不可收拾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

阶级斗争固然残忍，却是以温柔的脸孔出现的，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啥叫社会主义运动呢？就是叫大家不要当修正主义或走资派。为了文章接下来的叙述不至于落入厚黑的陷阱中，这里先澄清一下在当时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和资修的区别，大概对比一下。

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为人们服务；资修用人民的权利给个人服务。

行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导应该积极奔走，当好人民的好公仆，用自己的积极性帮助百姓富起来；资修领导呢，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公仆，自己抓钱抓权抓美色，吃香喝辣。

道德角度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官吏应该用自己的血汗养肥百姓；资修相反，用百姓的血汗养肥自己。

概况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官，要不怕苦不怕累，有事冲到前面，脏活累活干完，带领百姓实现国富民强。如果做不到，那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好好教育。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赞同这一点，所以即使一部分人意识到猛烈的运动即将到来也找不到理由反对，就跟着赞同了。

就是说当社会主义的官是吃苦受累的，这个观念和几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相反。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先看看，为啥要这么着，就是说为啥要对官员提倡这个作风。

一提起阶级斗争，大家以为那是毛泽东一个人搞的，全天下都反对。还真当毛泽东神了。阶级斗争能搞起来，是因为当时深厚的事实基础，思想基础和现实基础俱在。

从思想上讲，共产党人存在这样一个普遍观念：咱们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不容易是吧？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今天这局面。他们是咱们的前辈，他们是咱们的战友，他们死了，没来得及看见最后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白死，因为红色政权终于还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们，幸运的人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希望，继承了他们的理想，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吧？

他们的理想也是咱们的理想，咱们这些活下来的人的理想。不管是死去还是活着，咱们的理想都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国家。让咱们这个疲惫而衰老的民族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从咱们祖先到现在已经几千年了，生生不息，中间有过光荣和耻辱。光荣的部分和耻辱的部分都写在史书上。咱们希望后人回忆这个时代的时候，能够回忆到的是咱们的血性和辉煌，正如咱们回忆祖先的血性和光辉一样。咱们是一个古老民族传下来的一群人，曾经站在世界之巅，没有理由一直衰落，咱们要重新站起来。

虽然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保证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再次自立。然而这个世界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政治和军事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永远都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咱们共产党人的梦想也是这个。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前提是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么，物质决定意识么。没有物质基础的梦想永远只是乌托邦。

现在建设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肯定是中间某个环节出现了错误。而且不是小小的环节，一定是这个团队在思想上出现了大漏洞。那么就应该把这个漏洞堵上。怎么堵呢？共产党人不信神鬼只重实事求是，那就只能是教育了，那就来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吧。

正因如此，当领袖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即使有人预感到将要到来的政治风暴，却也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因为那一代人也运动，也斗争，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梦想，而非现实利益。这就是那一代人领导的党和其他党的不同之处。

然而他们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群众挨饿，干部待遇虽然和如今没得比，却比群众要好。教育，已经是最为温和的口实了。听到教育这个词，不少人还是心惊胆战。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也是以学习开始的。早期的教育或学习，都是在运动中体现的。

延安整风在整体和大方向上是对整个党组织有利的，虽然错误批判了一些人，但并没有对整个组织体系造成致命打击，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存在，生存环境险恶。如今有了政权，敌人看不见了，却更为危险，因为敌人是客观规律。那一代的共产党人对血肉横飞的场面很熟悉，对日本人、美国人、苏联人、蒋介石及国民党都熟悉，对客观规律却不熟悉。

既然教育，那就教育吧。想不到更好的方式了。

如果仅仅是思想教育，通过一系列的开会再开会解决问题，也就算了。

任何思想最终都要通过实践表达出来，要从实践中看看教育成果。

六二年冬到六三年春，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去了十一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他们在干吗呢，在解散食堂、分地，在残破的三面红旗上划口子。这个过程现在已经被美化了，中间也有很多缺陷。所谓经济调整，也就是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某些人得利，多数人吃亏，就像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一个道理。当年的调整和现在的调整在某些方面很相似。现在的调整被说得天花乱坠，当年的调整引发了一些政治灾难。区别只在于一个强力领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绝对不容许那种情况出现，于是强力阻止这个状况。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决定来点实际的。既然思想教育不管用，那就来点实际的吧。那就查一查账目、清一清仓库、过一下账本、弄清楚如何分工的，看看究竟谁占了便宜还卖乖、谁无视国法党纪、谁占有了公共资源，一句话，查一查谁他妈该死。

这就是所谓的小四清。

（六）小四清

现在仍然有不少人在困惑，当时好好地调整局面，怎么又回到斗争路线了？那就是调整时出现了大量不公平的现象。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搞经济调整，确实收到很大的效果，基本上告别了大饥荒，但也制造了负面作用，就是产生新的不公平。

新的不公平为何会产生呢？原因是必然产生。

三面红旗的基本精神就一个，那就是追求公平，即通过集体劳作生活的方式过渡到共产主义。如果说这个追求有缺陷，就两个，一是过于急功近利，即大跃进；二，人性是自私的。也许在未来

某个时候，生产力达到相当程度，人的认知水平达到相当程度，三面红旗中蕴含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可以部分变成现实。半个世纪之前是不可能的，然而半个世纪之前的人认为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最终惹来了大饥荒。

大饥荒固然残酷。然而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依然认为这个理想可以实现，只是操作方式出现了失误，于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人决定调整。本来是以公平为原则的，调整，即偏离公平。所以刘少奇的工作必然偏离以前奉行的政治观点。

举个例子，现在一个国有企业改革，既得利益者必然是部分领导，以及和部分领导有关系的少数人。之前那些靠国有企业吃饭的职工只能领一点补偿金下岗回家，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物价飞涨，积极一点的想办法再就业，消极一点的整天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曰世道变了。

半个世纪之前，人民公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这个企业由毛泽东亲手缔造，核心部分就是公共食堂。现在这个巨大的国有企业解散，当然要查一查各个环节。

怎么查呢？就祭出共产党人的法宝——开会动员吧。

六三年五月份，毛泽东在杭州开会，经过一番论述教育之后，颁布了一个文件，叫《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两个月后，中央又搞出一个十条文件，简称《后十条》。这两个十条起草期间，刘少奇在国外访问，没有参加研究讨论。即使他在国内，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前十条》是毛泽东主持的。《后十条》是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由田家英组织的起草班子，应该符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体认同。

奇怪的是，毛泽东主持的《前十条》还在讨论解决细节问题；而《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并且再一次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由此可见，至少在六三年，邓小平的思想还不成熟，和后来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总设计师还不是一个人。

这两个文件不算长，转过来就太长了，简述一下吧：

一，农村之前贫困，现在问题在好转，表示政策是对的。但是仍然遗留很多问题，而且问题巨大。巨大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因为阶级敌人还在。一部分同志对阶级斗争麻痹大意，认识不清，现在必须清醒起来，去发动百分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对付阶级敌人。

二，指导思想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农业六十条》和《十条》为纲要。大体上分为三步走：第一步，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首先训练一批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都要经过试点。中央认为，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

三，理论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要执行，就要有一批队伍。十条里给出建议，须同农村的贫下中农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整顿并继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组织应当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首先是在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要抓紧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没有建立的，要在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条件，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成员，要以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候的贫农、下中农为基础。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一句话，这个组织要注意它的群众性，也就是大多数。

指导思想有了，纲领也有了，要对哪些现象进行斗争呢？根据报告罗列，现象如下：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这些现象就是四清的基础。客观说这些现象存在么？存在。

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现象啥时候灭绝过？当年秦始皇强力建设国家机器，没能解决这些现象。之后朱元璋把屠刀磨的油光发亮，没能解决问题。到如今这些现象已经半公开化。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毛泽东在就走上另一条轨道的。在毛泽东那时代程度还算比较轻的，至少没有黄赌毒肆虐，不会有一个城市在一公里之内就能找到色情场所，不会出来火车站就看见红灯区。又扯远了。

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一个铁腕人物。在毛泽东的铁腕下，这些现象如何诞生的呢？说起来并

不费解，因为凡是有资源调动的地方就有不公。

食堂解散了，要把锅碗瓢盆分给百姓。分的过程中，难免不均。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何况当时既贫又不均。锅碗瓢盆本来就是从老百姓手上收上去的，办食堂时丢掉一部分，炼钢时又丢了一部分，现在再分，肯定不够用了。当时的轻工业水平又跟不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领导吃饭都要用锅，洗脸要用盆。领导之后是和领导关系近的人，然后是领导看起来顺眼的人，剩下一部分贫民百姓肯定是没得用了。刘少奇回湖南调查时，就发现一部分人没住处，没办法只好把老房子贡献出来。全国有那么多村子，刘少奇只有一个。这还是小事，主要是分地。

在分地的过程中，每个村子里的土地肥沃程度不等。大家自然想要沃土，贫瘠土地没人想要。在那个肥料贫乏的年代，种庄稼主要靠土地自然肥力。一块沃土一年多收一百斤水稻或者小麦不在话下，而上缴的公粮或税收都一样，大家自然就有纷争。沿河地带的土地，被水淹的可能性很大，大家自然也不想要。丘陵或山坡上的地，灌溉起来不方便，大家也不想要。还有谁家祖坟在哪块地里，什么哪块地本来就是俺家的等等，都是麻烦事。

既然肥沃的土地都想要，那怎么办呢？就祭出老祖宗的法宝——走后门呗。走后门这门技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从人类文明诞生起，这门技术就兴起了，通过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实践、归纳总结之后，形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来谈谈走后门的技术。这门学问需要两个基本因素：成本和察言观色。

要搞腐败走后门，成本是必须的，三样：钱、权、色。有钱送钱；没钱的话，拿权力交换也行；如果两样都没有，那就对着镜子化点妆，没有姿色的，就想办法找个有姿色的上。现在走后门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相关领导宁愿把权力烂在手里也不会开后门行方便的，在权力腐败的过程中，这叫做宁缺毋滥。走后门之所以是走后门，只因后面比较隐秘。直接拎一块肉往领导家一放，说某某同志我砸锅卖铁弄了这块肉，现在送给你了，现在跟你搞交易，我要那块沃土。而且说话的语调很高，这还叫走后门么？这叫走前门——前门才这么光明正大！

在走后门这项技术上，之前的地主或富农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老祖先都干过嘛，没干过也见别人干过，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对吧？贫下中农就不一样了，祖上下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想着一日三餐、传宗接代的问题，哪有那个时间、精神练习走后门技术的。走后门那玩意，对贫下中农而言，正如古惑仔眼中的少林功夫，神秘莫测，绝密的。

不懂察言观色，有东西也未必能送得出，因为后门是隐蔽的。

其实那时候走后门也没啥，可不像现在这样，物质相当丰富，丰富到领导懒得看一眼，走后门

也简化了，动辄给张卡，方便、实惠、快速、简洁。那个时代物质极为贫乏，走后门也就只是一捆烟叶子、一篮子鸡蛋啥的。但是这些烟叶和鸡蛋就造成了不公。如果能送点啥票票，说不定就可以多分点地。

多分了地就要雇人干，对吧，就能成为新地主，也就有所谓新的剥削。这些事在别人那里或许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在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

这些现象在城市里要更为复杂一点，城市里没地可分，后门却更多，而且更为隐秘。偷税漏税啊、偷工减料啊、贪污腐败啊啥的，都可以在后门解决。此外还有偷盗啊、诈骗啊、绑架暗杀啊这些江湖门道也可以发扬光大。

这些现象搅合在一起就变成一锅粥。当年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在大陆干了二十二年，就是因为没解决这些问题，跑到台湾了。现在大陆的当家人成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要展示他的手腕，蒋介石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来搞定。国民党摆不平的问题，由共产党来摆平。要解决这些事情，毛泽东采取的策略就是在乡下搞四清、在城里搞五反。

所谓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这几项并不难理解，而且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只要抓好这几项，就能做到相对合理公平。大饥荒之后，要寻找原因，只要把这几个环节弄清楚、理顺了，大概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所在。

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可行的方法上，在执行时又惹出大乱子。

（七）乱上加乱

不论什么样的理论，在执行时都会出现偏差。即便是万有引力定律，连太阳系都无法精确计算；相对论方程，也有自身的范围和界限。科学尚且如此，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历次的政治运动都要伤害一片的。

四清理论是中央搞的，却也得有人去执行。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人可以主持理论制定，却不能亲自下去查。要查，还得别人去。具体说就是工作小组。

首先第一关，工作小组的成员就是问题。既然工作组去下面查人家，凭什么说工作组就是对的，下面就是错的？就凭你是上面派下去的么？肯定说不通。连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问题，政治精英们早就想到了。他们不但想到，还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没有灵丹妙药，解决的方式就是来个大火锅。火锅大家都熟悉吧？虽然就一个锅，但是鸡鸭鱼肉萝卜白菜都可以有。

工作组就是这样一个大火锅，成员主要有四类：中央派过去的、省市一级的；另一个群体是知识青年，也就是学生；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国有企业优秀工人。

中央的人负责把一线信息传递给各个部门的领导。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的亲朋、好友、秘书啥的，可以说是领导的耳目，负责帮助领导了解前线的第一手信息。因为这个运动是伟大领袖主导的，弄不好就要从“人民公仆”变成“人民敌人”。信息非常重要，一旦有风吹草动，马上采取行动，该检讨检讨，该哭鼻子哭鼻子。

省市一级最为辛苦，需要了解一线信息的同时，还要尽量和中央的人接触，侧面了解一下高层的动向。毕竟嘛，省市级夹在中间，平时在地方威风八面，一旦涉及到运动却又得享受夹板子，就像七千人大会。这一层的使命是，给中央想要的，要敌人给敌人，要模范给模范，只要不出“意外”就行。所谓“意外”就是跟中央唱反调。中央要模范，你去挖敌人；中央找敌人，你去包装模范，肯定不行。一旦发生了意外，就地处理掉。处理不掉，领导即使倒霉也还有待遇，而下面这些跟着领导混饭吃的马仔，可能只有失业回家了，因为新来的领导会找来新的马仔。

至于学生么，热血青年呗，好比一群把理想当饭碗的无根浮萍，折腾不出啥花样。几年之后他们将成为红卫兵，又过几年他们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么，任务是协助干活。

工作组就是把这样一些人搅合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相互平衡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过于嚣张，你是中央某个部长的秘书，感觉后台很牛，但是你身边的那个人的后台可能是政治局的，还可能对你的部长大人不满。最好还是老实点，惹出麻烦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而且那时代讲原则的人很多，办事一根筋的人也不少，工作组的工作质量还是能靠得住的。

搞笑的是，工作组越是能靠得住，惹出的麻烦可能就更多。看一看这些人的工作就行了，机关单位工作的、甚至高级机关单位工作的，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搞资料的；学生，读圣贤书的；工人，工厂里的螺丝钉。就没有种地的！却要这些不会种地的人去管理种地的人、去查种地的人。隔行如隔山嘛，之前的大饥荒，就是一帮不懂种地的瞎指挥造成的恶果，这一次还来，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样一个工作组去了一个公社，第一步要干的事，就是让之前的公社书记啥的靠边站。组长就地行使公社书记的职权，然后组长下面的小组长就会成为公社下面的大队书记，组员啥的就要行小队书记的职责，相当于把公社书记的权力给夺了。没办法，查账么，就要让被查的人暂时靠边站。不靠边怎么查？

而且要狠狠地查，查到问题才好交代。要不然如何对领导解释自己这段时间干嘛了？领导有时候就像老师，需要检查作业的。作业不交想干什么？如果是学生，也可能就是贪玩啥的，最多被训一顿。作为领导下属，到下面不干活是不对的，不干活的解释只有一种：被腐化了。

一句话，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要发力过猛，运动起来，不发力是不可能的。不发力就可能遭殃，发力至少能保证不遭殃。为了个人前途着想，也要挑刺。每个人挑一点点，汇集到中央就堆

成山，运动升温是必然的。

不查则以，一查问题一大堆。

清账目，账目是清不了的。即使现在，有书面记录、有电子存档、还有备份的情况下，去查一个单位的账目，肯定也查不清楚。有些账单对不上，发票不翼而飞了，还有一笔笔的钱蒸发了，见鬼了。实际并不是见鬼了，比方说两个领导出去一个晚上，吃喝玩乐五万块，这样自然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能接受的。比方说业务需要搞灰色交易，这些钱肯定对不上，如此而已。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比较淳朴，比较穷，但是烂帐更多，为啥呢？看看仓库就知道了。

不仅账目对不上，仓库更对不上了。现代的账目对不上，是因为吃喝玩乐、搞亏空、腐败啥的，当时这一套不盛行，没多少人敢玩。但是当时仓库的缺口更大，因为直接吹牛。大饥荒是大跃进惹出来的，大跃进是吹牛吹出来的。刘少奇在湖南考察的万头养猪场，只有几头瘦猪。要查仓库对账怎么对得上？

六三年经济有所恢复，也就是农民跳出死亡方程式而已。大家有了东西填肚子，能吃到米饭馒头，其它不能想太多，还属于未来。这个时候去查账查仓库，肯定是查到一个大窟窿，而且是那种补不上的窟窿。因为这些窟窿本来就不存在，是通过吹牛吹出来的。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吹出来的窟窿填满？这不是瞎胡闹么！

现在国家来真的，问那些粮食去哪了？猪马牛羊去哪了？很好解释，因为根本不存在。

但下面的人又不能说这些东西不存在，说不存在别人也不相信。怎么办呢？工作人员也没有最后决定权，只好把这些问题如实上报。一上报，那还了得！资修特务卖国贼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来！一定要好好教育，好好整治。

第三项要查的是分工。分工查的是当下，不涉及历史旧账。分工分好了，可以减少不平等，减少百姓怨言。任何一个组织，想要把眼前的事情弄好，首先就要解决分工的问题。在分工这一块，很多人都是高手。分工，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人。那个时代的各级领导都经过残酷的考验，对用人非常精通。

这种分工不应该去干扰。本来基层干部的个人分工好好的，就算个别吹牛拍马屁、裙带关系走后门，但无关大局。现在派一个工作组去把人家挤到一边去，相当于打乱了这种分工。以清查分工的目的打乱了分工，相当于得不偿失。不但打乱了这种分工，而且这种打乱分工的人还不懂种地，更乱了。当然，基层那些事并不困难，种田也不是啥高尖端技术，用心学很快就能掌握。问题在于，这些人还是要走的，不会留在基层。清查时相当于重新分工，离开时相当于再一次重新分工。

最后一项，清财物。财物最不好清，反而成为最靠谱的一项。

当时的财物太容易清理了。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的财物都容易清理。因为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是地球上最为贫困的一个群体。如果有钱，那就升级一下，成了地主了。如果有钱又会来事，还能买个官当一当，就升级为贵族。

新中国的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是经历大饥荒之后，已经赤贫。

这个时候清财物，能清啥呢？也就是清点一下公共的锅碗瓢勺，清点一下锄头、犁子、钯、篮子啥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大家从集体生活变回个体生活，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是生存的保障。贫下中农可以不吃肉、不喝酒，但必须有这些生活用品。虽然没啥好清的，但为了百姓生活着想，有清理的必要。

这大概是四清工作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工作组还是认真办事的，仔细清查每一项任务。根据上面的分析，不认真还好点，越认真越糟糕，查出的问题越多。问题越多，动静就越大。这些动静逐层汇总，汇集到中央后，后果很严重。中央领导人会根据这些信息调整政策。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既然这么严重，就表示敌对势力还很严重不是？难怪三面红旗没能普照神州大地，原来是这些敌对分子死性不改啊！因为他们死性不改、顽固不化，造成了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挨饿受累。而这些农民是新中国诞生的保证。为了理想、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后代、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放过这些人不是？那好吧，让你们见识一下无产阶级的威力——为了灭亡敌人，把政策再紧一紧。

也不能把这些人拉去枪毙了不是？怎么办呢？要拯救他们，给他们一条活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优势。要拯救他们，就要把他们头脑中那些错误的思想清除。这些人的脑袋里有了水和面，摇一摇变成了浆糊。要把浆糊给清理掉，现在。

只有把脑袋里的浆糊给清理掉，才能解救他们。

由原来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分工、清财物升级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如果说账目、仓库这些东西不好清，政治和思想容易清么？又不能把脑瓜子打开给洗一洗吧？那就要采取更为强力的方式。

看看这个政策，从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央制定，到各位公务员、学生在下边施行，基本上都是好心好意没有出乱子，这一系列没有出乱子的步骤融合在一起却出现了大乱子。把原本一场以搞经济为目的的运动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无数人因此完蛋，无数人备受折磨。这还没完，这个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再一次升级，升级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运动。

——啥叫好心办坏事？这就是。

世间悲剧，往往都是以善念为出发点的！

治国——难啊！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说得是既生动又玄妙。

烹小鲜，谁不会啊，直接放到锅里也能煮熟。把小鲜煮熟容易，弄到色香味俱全却很难，能做到的，都是顶级厨师或乡下老大妈。终究有人能做到，而且人数不少。然而治大国真的是这样么？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有几千年历史。在这个大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寥寥无几。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要找名将，容易；找佳人，容易；找天才，容易；找权谋啥的都容易，唯有找治国之术难，因为那些啰嗦一大堆的人根本不懂治国。

本人很尊敬伟大的老子，然而综合起来看，老子那句话是瞎扯淡，相信那句话的人也是瞎扯淡。因为老子或者相信老子那句话的人，都不懂治国却以为懂治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断章残篇。这些断章残篇都是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基本上都是臆断或者是书生气使然。拿出来细细考察，还不如这四清运动经得起推敲。

国人啊，高谈论阔的时候，还是多多想一想可行性吧。

（八）枫桥经验到桃源经验

枫桥经验和桃源经验算是四清运动中的两个样板。

枫桥经验早一点，是早期的一个典型，桃源经验晚一点。从这两个经验样板中，可以窥视四清运动一个大概。

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曾数次到浙江巡查，开过不少会议，制定过不少文件，训斥过不少人。他发现浙江枫桥镇这样一个地方，社会主义运动搞得不错。上级看下级不错的标准一般有两个：出成绩和不惹麻烦。像大饥荒时代，不少饥荒严重的地区被压着，撒谎没成绩就算了，到最后惹来麻烦无数，麻烦到写到历史书上，如河南信阳。

枫桥这地方搞得不错，他们的经验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个总结看起来像标语，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分成两小段，第一段：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点好，好在那里呢？就是不给中央惹麻烦。就这就好了？在那年头确实算好了。那是一个几乎每个地方都有麻烦的时代，不同的麻烦从不同的地方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央，

中央领导的桌子资料堆积如山，问题总解决不完。

看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工作时间表，基本上都上班十二个小时以上。加班没工资不说，天天还要听各方面的唠叨、抱怨。虽然他们都比较强悍吧，也不是机器。人心都是肉，都想想工作少一点，多休息休息不是？那么多问题，能休息得了么？

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解决问题，那正好是那一代人的政治理想。

第二个小段：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这也是好处。因为在历次运动中，高层领导都在强调少抓人，抓个别就行了。而每一次运动都要多抓很多人。每次都有那么多特务、内奸、叛徒、阶级敌人，大家不是早就完蛋了？连我们这些人谁能凭常识看到的问题，当时中央领导看不出来？当然知道，知道也没办法，运动还得照样搞，冤家照常出现。如果真的能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不失为一条良策。

有了这两点好处，毛泽东亲自下令：推广枫桥经验。

客观来说，这个经验确实值得推广。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时代，这样的经验有助于解决很多问题。即使今天，这个经验依然被翻新，说明它确实有优点。然而在当时，这个经验的推广并不成功。如果成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运动升级。

其实桃园经验过程本身没啥，只是一个下去蹲点很多的人物的个人经验，只因为这个人比较特殊，这个人叫王光美；因为这个叫王光美的人是刘少奇的妻子；因为刘少奇是共和国的政府首脑，是四清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形成了一个样板。

这篇文章不是探秘或八卦，而是主要讲政治、军事主导的历次运动。因此出现的女性不多，王光美就是其中一个。她之所以出现，只因为对政局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王光美，生于世家名门，兼具才华和美貌，有一个让人羡慕、让人惋惜的人生。

一九二一年，王光美在天津出生。正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得政权，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

王光美的父亲叫王治昌，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于一九年参加巴黎和会、二一年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王治昌在华盛顿期间，听说女儿诞生，兴奋之余为其起名为光美。这个名字并不好听，甚至有点俗气，听起来像乡绅家的孩子，但不影响她耀眼的一生。

那个时代的名门之女，要么生活作风糜烂，要么沉醉于诗词歌赋中，王光美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这么说吧，王光美的数学和物理非常好。好到啥程度呢？得到一个称呼，叫“数学女王”，就

是说王光美是个理性思维一流的女人。六十年代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出访，被尊为“中国最有魅力的女性”。

古今中外，出身名门的女人不多。出身名门且拥有美貌和智慧的人更少了。出身名门、拥有美貌和智慧且成为国家元首夫人，那更是凤毛麟角。王光美把这一切占全了，简直到了让人羡慕、嫉妒的境地。当然她确实惹了一个人的羡慕嫉妒恨，那是后话。然而王光美的一生并非完美的。她的不完美，就是从四清运动开始的。

六三年十一月到六四年四月，才貌双全的元首夫人王光美带领一个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去搞四清运动，之后把经历讲了一遍，又写了一遍，供同志们参考学习，然后推广，名曰桃园经验。本来也就是一场普通的四清蹲点，因为主席夫人在，大家工作格外卖力吧。

一到工作地，大家就采取老苏区和敌人斗争的方式，第一步扎根串边，访贫问苦；接下来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弄好之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已经不再是小四清那般简单，已经在向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转变；再对“阶级敌人”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这其中的转变是恐怖的，也是必然的。因为查账查仓库时查出来一大堆问题来。一个大队查点问题，把这些问题转变成汇报材料，这些材料从大队汇报到公社，又从公社汇报到县，从县汇报到市、省、大区，最后到中央。中间每一级领导都要加点意见表示一下个人的存在。根据老传统，这些意见往往是往左倾斜，右倾有可能带来麻烦。客观说，大饥荒留下的问题确实很多。这样添油加醋地集结，原本只是大队书记收了两斤猪肉或多占几斤稻谷，到中央变成一个地方政权变质了，所以政策必然升温。

如果问四清升温是如何炼成的，就是这么炼成的。过程和当年的大饥荒一个样。

此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非常难做，因为他面临如此一大堆问题，这么多问题如何解决？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唯有给运动升温。

制定两个《十条》时刘少奇在国外，没有参与讨论。同时分析过，即使刘少奇在，双十条也会诞生。刘少奇回国之后一段时间处理国际关系，然后才把目光转移到四清运动上来。当时四清运动刚刚兴起，各种问题源源不断汇集到中央，刘少奇决定给四清运动升温。

升温的方式有两手，一是主持修改《后十条》，改得更左一点，把阶级斗争调子调高；另一手就是推广样板。中共历史上，历次运动都要搞样板，然后推广，这次也不例外。

那么王光美的桃源经验如何成了样板呢？

第一条肯定是身份比较特殊。很少有人想到国家元首的夫人会亲自下去搞蹲点，回来之后当然

要捧捧场。中央组回北京后，中央直属机关党委让她向机关干部作一个关于“四清”的报告。王光美第一次讲了桃园大队的做法和经验，然后又应邀在全国妇联召集的会上讲了一次，这都在比较正常的范畴之内。等到刘少奇打算给运动升温时，就变得不正常了，特别是在两人一路南巡的途中。

一路上，刘少奇督促大家搞运动，但是大家希望听到更进一步的指示。因为这样的指示本来就很难做，虽然有双十条为理论依据，却又有诸多难处，很简单，大家都没有干过啊！当地方晓得主席夫人搞过四清，自然要想方设法邀请她作演讲，一方面给大家传授点经验，另一方面算是顺便讨好国家主席，一举多得。

就这样，王光美从河北讲到山东，讲到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一路演说非常成功，途中反响强烈，所到之处掌声阵阵，听完还不过瘾，还要现场录音，还要印成资料下发，可以说场面相当轰动。之所以如此，根子还在刘少奇身上。如果不是他要给运动加温，大家也犯不着跑去找王光美取经。王光美只是做了她能做而且应该做的事。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结束，可以理解为国家元首夫人在作秀——要是作秀就好了。

偏偏刘少奇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讲原则，干事雷厉风行的人。

书面报告弄好之后，刘少奇亲自代中央拟批语：“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

刘少奇是什么身份？国家元首。国家元首代中央拟批之后，就是国家文件，具有法律法规效力。到广东之后，刘少奇主持修改了《后十条》。这样四清运动升温正式形成，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依据。说真的，刘少奇给四清升温的手法很漂亮。正是因为手法很漂亮，才引来更大的伤害。

此次运动刘少奇暴露不少缺憾。

第一个缺憾，他用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才华，给阶级斗争提供了一个范例。两年之后，毛泽东搞文革时，手法和刘少奇差不多，只不过规模更大——两人的差别只在于军方立场的不同。

第二个缺憾，就是刘少奇把王光美卷了进来。王光美不该卷进来的，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卷入了运动，相当于给后来的江青和叶群参政提供了一个先例。虽然在人品、学识、才华、乃至相貌方面，王光美胜过江青、叶群，却不幸地成为江青、叶群两人的“坏榜样”。然而这个口子开得相当不好：在王光美之前，中共还没有领导人的夫人如此卷入政

治运动中。

到此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刘少奇为何给四清运动升温？

事实上刘少奇是在拼搏。

（九）刘少奇的手段

给四清升温，是一场由刘少奇主导的政治运动。刘少奇之前也参加过大量的政治运动，但那些运动都是毛泽东主导，他参与实施的。这一次不同，由刘少奇自己主导、自己挂帅。这个运动蕴含大量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刘少奇为啥这么做？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刘少奇没有留下答案。后人因为刘少奇蒙冤，以及长期的宣传，也没有对此加以深究，然而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四清乃至后来的文革都非常有帮助。我们就试着探测其中的可能性吧，看看能不能从各种可能性中找到较为可靠的因由。

现在我们知道，四清升温意味着阶级斗争升级，阶级斗争升级导致很多人倒霉、很多人走运，有人倒霉、有人走运意味着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分配意味着动荡不安，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的凶险。这是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理解，后人都是局外人，当事者又如何呢？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刘少奇糊涂了。四清升温，明显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使得阶级斗争升温，很多人因此遭殃。刘少奇糊涂了，之所以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正如说文革是毛泽东晚年糊涂了犯下一个错误一样。这样的解释既可以给刘少奇开脱，又能省力气。然而这个解释非常地不靠谱，既不靠谱也不负责任。刘少奇又不是街头大叔，说糊涂就糊涂了？正如毛泽东搞文革一点也不糊涂一样，刘少奇也不糊涂。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刘少奇修改《后十条》推广桃园经验，只想解决实际问题，而没有意识到会把四清推向阶级斗争的新高度？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推测，换成一个现代人倒是有可能，对刘少奇来说，不可能。

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一下刘少奇的一生。刘少奇可不像现代人，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干了一辈子革命，搞了一辈子阶级斗争，什么样的情况下斗到什么程度，基本上车轻路熟，如同数学公式演算一样得心应手。抛开之前的不算，从当上国家主席开始算起，已经五个年头了。在这五个年头里，他经历了大饥荒。

什么叫大饥荒呢？除了饿死人之外，从饥荒本身的角度来探讨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公社干部为了要政绩，让大队干部把三亩地的稻子放进一亩地里，然后写份报告说亩产两千斤。公社干部政绩有了，把这份报告上报到县里，县级干部为了显示自己领导有方，又报其它公社也是如此，顺便

加点产量。县级把报告送给市里，市里领导也这么干。然后省里，再由领导加工润色上报中央，就变成全国性的吹牛。就这么简单，程序跟四清运动升级非常类似。

大饥荒出现之后，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这个流程非常清楚。他所谓的调整经济，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办法对整个国家公务员说，不要再吹牛了，再吹牛踢你们屁股。从湖南调查开始，到第二次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一直都在整这个问题。

要说刘少奇不清楚小四清变大四清蕴含的凶险，那是侮辱刘少奇的智商和阅历。

——就是说刘少奇把四清升温是故意的，他要来一场政治运动。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当然可以解释为刘少奇软弱了，对毛泽东搞退让。

关于这一点可以这么解释。说刘少奇之前之所以敢于高调搞调整，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表态，刘少奇以为毛泽东会支持自己搞调整。等到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亮出底牌之后，刘少奇开始退缩了。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可怕，不愿意与毛泽东为敌，于是在检讨之余把政策重新挑回来。这么解释似乎也通，却又有很多问题不通，比方说中南海的那个下午，毛泽东问他为啥没顶住时，他就很激动，说什么人相食等等。

如果说仅仅是对毛泽东搞退让，应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即尽量减轻“小四清”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他是国家主席，国家出乱子他是脱不了干系的。正如七千人大会上表现的一样，刘少奇并不是一个懦弱之辈，他有足够的胆识、才华、智慧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刘少奇究竟要干什么？故意把运动升温，也就是故意造成阶级矛盾扩大化，同时又不是讨好毛泽东。他在干什么？

有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刘少奇故意把这一切弄糟糕，是想向毛泽东表明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刘少奇要通过一定的损失和牺牲告诉毛泽东，阶级斗争不能搞了，以后也不要搞阶级斗争了，咱们还是好好搞建设吧，不要再折腾了。通过这种方式去说服毛泽东，对赢得毛泽东的支持做最后的努力。

这个答案是事情的真相么？如果真相就是这样，那么刘少奇这么做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这个风险是啥呢？就是毛泽东一旦不爽，后果是很严重的。之前的高岗、彭德怀都是前车之鉴，这种噩运当然也可能落到刘少奇身上。当然此时的刘少奇比高岗和彭德怀要强大得多。他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又是党内二把手，实际主持党政工作多年，早已树大根深，羽翼丰满了。毛泽东即使想要拿下他，也得仔细考虑考虑。

事实确实如此，回顾两人的关系可以发现，两人的分歧可以追溯到很远，但真正的分歧始于刘少奇的经济调整。两人的矛盾公开于六四年，这一年刘少奇修改了《后十条》，毛泽东弄出了《二十三条》，此时两人的矛盾已经不是秘密。然而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五年，刘少奇依然毫无悬念地

再次当选国家主席。这个事实也就意味着，整个行政系统已经偏向刘少奇了。那么从六二年到六五年，刘少奇的实力怎么增长得如此之快？

如果说是搞经济调整积累了人气，那么从六三年到六五年这段时间，刘少奇一直在指挥四清，也就是说政治运动。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指挥政治运动的这两年间，实力大增。政治运动中增长实力的办法大家都明白，就是拉自己的新人，打不是自己的旧人。

一句话，刘少奇通过四清运动培养自己的政治实力。

他不是不懂，更不是糊涂，而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这盘棋面上，他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战胜毛泽东。只有从力量上战胜毛泽东，才能安装自己的理想蓝图，设计、建设国家。这些雄心壮志至少在行政系统内实现了，但是在中国的权力构架中，有党政军三条腿。除了政之外，还有党，还有军。行政系统内的大员在党内也不弱。虽然毛泽东是党内一把手，刘少奇的实力也不弱。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任何党的政策最终都需要由行政力量完成。这些后面再讲，先看看大四清为何物。

（十）大四清为何物

大四清的核心也有四个：政治，经济，组织，思想。

一看这几个词就不得了，因为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完全过关的寥寥无几。如果把这几项标准拿到今天来衡量官民，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对公务员而言，估计只有政治过关，都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嘛；经济这一关，估计就有很多人过不了。从国家拿那点工资还不够水电费嘛，家里的车子、电器都是哪来的？组织上讲，哪个人在分工时没有个人喜恶？思想就不用说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啥的那叫啥思想？呵呵。民也差不多，吃喝嫖赌抽的、坑蒙拐骗偷的，三教九流的行业已经大大发展了。所以这世界不讲思想、信仰啥的，只讲和谐。大家谁不惹谁，各走门道赚各自的钱，和和美美过日子。

好吧，回到当年吧。

大四清采用的战术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简单说就是派遣更多的工作队；更简单地说，就是用城里人去查乡下人，有的县竟然上万人。这些人干吗呢？先学习文件，中央精神，样板范例啥的，然后开会，而且开很久。如果说开会是理论准备，接下来就是实践了。

怎么实践呢？两个字，找事。

找事很容易，也很不容易。

容易的部分是对象好找。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就是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

地主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曾经是地主的那些人还在啊，这些人已经成了历史痛恨的对象。

富农么，就是那种相对比较富裕的人，就是贫下中农吃不饱时，他们还可以喝点酒、吃点肉的那类人。富农从来就有，曾经有过，现在还有。自从离开原始社会之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就有贫农与富农，只是贫富差距程度不一样罢了。之前的富农，在贫下中农衣食住行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富农就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那类人。今天，如果再找富农，在北方就是那种住楼房，鸡鸭鱼肉随便吃；南方要上升到住别墅，鸡鸭鱼肉已经失去味道，整天想着养生，多活几年，如果有兴趣，常常出入娱乐场所风花雪月一番。

右派都有标记，翻一翻档案就知道了。通过一次次的运动之后，右派数量急速增加，而且还将继续增加。如何区分左派、右派呢？理论上讲，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主张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制度辩护的叫左派。右派里面又分为保守派和改良派。保守派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因此这一派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改良派要求照顾中下层利益。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是典型例子。左派里面又有两类人，左倾和右倾。左倾优先讲理论，右倾优先讲实践。如此一团乱麻，纠缠不清。很多时候左派中的右倾主义者和右派观点很接近。现在要反，实际上反右派，范围一旦拉大，很多人就会戴上右派的帽子。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更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是不愿意跟着在理论的金字塔里发疯而已。

至于坏分子么，就是那种善于不劳而获，对飞檐走壁之类的事情有独钟，善于偷鸡摸狗、扰乱一方的人。这些人运动运动，也该。恶劣一点的，聚集一批人打家劫舍的，也该运动运动。最为恶劣的，是那种为了点钱对老妈动刀子，谈对象不成去灭人全家，就像现在网络新闻精彩爆料出来的垃圾中的疯狗。对于这种个别情形极为恶劣之徒，用法制对待他们简直是侮辱法制。运动也不太适应了，应该把他们送回古代，享受一下凌迟、剥皮、五马分尸等酷刑。

不容易的是证据不好找。

现在工作组到乡下抽这么几类人。理论上的目标有了，还需要实际证据。取证的方式就是到贫下中农家去审访。

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形：一个机关秘书和一位大学生一本正经地去了贫农家。而这个秘书和大学生是互不相识的，神秘秘的，却都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导下为人民服务。

农民对这两个白白净净的城里人或许并不适应，用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第一步工作是赢得农民的信任，勤劳一点的帮助农民劈点木材，往水缸打点水，这样算熟悉了。然后开始聊天，问：那个大婶啊，有没有啥困难啊之类的。困难当然有咯，山珍海味这这些没见过、想不到，鸡鸭鱼肉这些不敢奢望，米饭馍馍也不够吃啊。衣服也不够穿哇，有些人家，连条换洗的裤子都没有。房子也不够住啊，夏天下雨，屋顶好几处漏水呢。出门车子不讲，种田必须的独轮车或两轮车也没有啊。

还有……总之日子不好过，当然还是比几年前的大饥荒那会好过点，没有生命之虞，不会饿肚子了。

听了这些，大学生会热血上涌，单纯的脑袋里会想起“为天下伸张正义”之类的句子。秘书则会引导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困难呢？你老好好想一想，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的指引下，谁敢狗胆包天剥削你们。你尽管讲，不用怕，我们代表毛主席给你伸冤来了。

这绝对是天大的误会。想一想，每个人遇到困难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很多人谈论自己困难的时候，未必能找到真正的原因。假如能找到真正原因，就有很大的机会能解决这个问题。比方说如今一位本科生毕业，想找一份五千块一个月的工作，但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两千块一个月的，就很苦闷。要是询问原因的话，主要两条：没有关系和缺乏运气；再深一点，社会大环境不好，体制问题。这些是原因，但是外因。很少有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即内因。有啥好找的嘛，不就是在大学里白白浪费了几年光阴。

半个世纪之前的贫下中农更不好找了，因为祖祖辈辈都穷，能想象到的富裕也就是平时吃上精米细面，逢年过节有肉吃，平时能吃上鸡蛋。问他们为啥穷，他们要是能说出来为啥穷还会穷吗？再让他们仔细想想，那就想想，说某年某月被某个人骂过。如果这骂人的人恰好有一个当地主的老祖宗（地），或者家庭过得还不错（富），或者和右派分子沾边，那就好了，有证据了，拉出来“洗手”、“洗脸”。

如果有人举报，某个大队干部多占了几亩田，或者几千斤麦子，好了又抓住一个黑五类，批斗会又有得开了；又有人说，张二狗同志昨晚偷了咱家的鸡，记录在案，“洗手”、“洗脸”；又有人说，那个叫王八蛋的同志骚扰过俺闺女，好吧，记下来；还有，俺听说谁谁家每顿都能吃到肉，特别羡慕。统统记下来。

如此这般，这些都是证据，都要清理的，连同之前查账查出来的陈芝麻、烂西瓜。为啥会有那么多账目搞不清呢？现在升级之后就明白了——思想和政治不清。那就清思想、清政治吧。

对于这些黑几类，大家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洗手洗脸。具体洗法是这样的，拉出来面对大家。

不同的人，待遇是不同的。

如果贫农张三因为一时赌博忘了种地，导致父母、老婆颇有怨言。大家认为张三同志还是好同志，仅仅是不小心办了错事，大家会真心帮助张三改正。那个张三啊，以后小心谨慎点，啊，咱们是社会主义先进制度下的人民，不能让万恶的地富右坏看笑话。你看看你，你怎么能赌博呢，那是旧社会恶习嘛。要是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连口吃的都没有，就是给权贵当狗。哪还有老婆？哪有老婆给你生孩子？你老婆就会是地主有钱人的丫头。人啊，不吃口馒头也要争口气。那么多烈士的流

血牺牲才迎来新国家，现在新国家给你大好的机会，反倒成了半截驴子——牵制不住打着后退了！你啊你啊你，要好好干活！

李四的爸爸和爸爸的爸爸都是地主，这一次分地时又钻了点缝。这一次抓了条大鱼，把李四、李四的地主爸爸（如果还活着的话）、被李四钻了空子的村干部一起拉出来，拉到空地上，好好修理一番。在旁边拉起一条横幅，写上坚决批斗地主及其后代谁谁、严厉打击经不起地主及其地主后代的糖衣炮弹的谁谁谁。工作组成员带领贫下中农开始批斗了。开头是这样的：在伟大领袖思想的照耀下，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个地主，把你欺压百姓的事情给我交代，接受人民群众的审判。

那个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谁谁，说你对得起人民的信任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么，对得起伟大领袖苦口婆心的教导么？

交代得好，也能过关。问题是怎么能交代好呢？比方说经不起糖衣炮弹（几斤肉或几百斤粮食）袭击的干部。接受那些玩意时，也就是想改善一下生活。在工作组成员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根据理论指导，这叫政治和思想上有问题，要交代。天地良心，当年的基层干部也就是大老粗，或只认识几个斗大的字。让他去交代政治、思想，他能说出个屁来啊？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有多少知道思想为何物？

然而工作组成员却不是这么看，他们会这么联想、推理一番：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当社会主义的官，却被资本主义腐化。腐化后拒绝帮助，这叫顽抗，要从严。如何腐化的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内部，二是外部。内部还好办，如果是外部，一定有蒋介石或帝国主义特务的渗透，要把这些特务挖出来，加大批判力度，吊起来抽两鞭子，或者是罚跪啥的，最好让老百姓扔点鸡蛋给那个龟孙子。当然，鸡蛋是稀罕货，那就用泥块或石块代替吧。

工作组成员都是多疑的秘书或满腔热血的学生。他们哪里知道，如果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素质，能够忍受农村的贫苦，当年的国民党也不至于败退得如此迅速。

就这样，把农村折腾了两年，也没折腾出花样。这里留下一个非常大的谜团，就是这样一番折腾，基本上是城里人折腾乡下人，上层折腾下层，为何把行政力量全部折腾到刘少奇那边去了？这个问题要仔细说一说。

（十一）官吏的心

常言道，女人心海底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

官场讲利益，这是一个定律，基本上所有人都认可这样一个定律。根据这个定律，可以分析一

下，究竟是谁得利了。

从理论上讲，四清运动是为了帮助贫下中农对抗地富右坏，最直接的得利者应该是贫下中农，实际并非如此。四清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政治斗争跟生产从来没有太大关系，名义上是搞地富右坏，实际并无多少利益可图。在这几类人中，右派基本上是虚拟的，是在阶级斗争模式里推演出来的，没有看得见的利益；坏，存在，但不多，也没啥家当；真正和油水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地主和富农。

但在那个时代，地主已经被消灭了十年，重新分地也不到两年，而且仅仅是多占了一点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主，没啥家底。这类地主的后代能有啥？把他们的家当全部给抄了，每家也分不到一口锅。另外就是所谓的富农了，但那个时代的富农并非真的富裕，且数量不多。就算把这些为数不多的富农全部杀了吃肉，每人也分不到半斤，何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可言？

更多时候是运动打断了生产。中国的农民，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一年中至少要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田里劳作，四清却常年在搞。开批判大会时，农民可能正在田里除草，也可能在播种插秧，要说不耽误生产那是瞎扯。四清还留下一些恶果，即让农民去教育干部，等到工作组走了，干部还是干部，农民还是农民，农民还可能遭到报复。

当然了，贫下中农也不是没有得到一点利益，至少可以抽空去批斗那些所谓的坏分子，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视、甚至没有任何娱乐休闲的时代，也不失为一种放松的方式。站在贫下中农的立场来看，相当于免费看了娱乐节目，很爽、很开心，情形估计跟现在的小年轻看综艺节目差不多。然而对于赤贫的农村而言，对物质的渴望远胜于精神需求。如果可以，相信贫下中农们愿意拿这些娱乐节目换一盘红烧肉，不行换盘炒鸡蛋也行，毕竟吃饱才是第一位的嘛。

基层干部更不可能受益了。四清运动期间，他们都过着心惊胆战的生活，总担心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青天大老爷，成了悲情戏的主角。坐着（最好的待遇）、站着（次好的待遇）、或跪着（不算最差的待遇），任凭人家戳额头、戳脊梁，那个滋味不好受啊！

那么剩下最后一个阶层了，即官吏上层（县以上），也就是参与七千人大会的那些人，也就是指挥四清运动的那些人。所有的官僚都包含在这个阶层里面。

提起官僚二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估计很多人对他们恨得咬牙根。基本上所有的坏事都能找到官僚的身影，要在好事中寻找这些人身影，如同在火焰山里找西瓜。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官僚就是那种挺着大肚子，除了索贿和玩弄女人，不知办事为何物的傻瓜。在各种故事情节中，涉及到清官的，都有这样一个官僚阶层做背景。包青天一拍惊堂木，下面那个吓得肚皮晃了好几道波纹的，就是官僚阶层的一个代表。涉及到贪官的，还是有这样一个官僚阶层做背景。

有史以来，动乱、饥荒，都和官僚阶层有关。比方说明朝末年，并非崇祯皇帝不给力，在是对整个官僚阶层无能为力。所有的帝国崩溃，说到底都是官僚阶层太腐烂了。这是一群嘴上为公、为天下苍生，手上为私、为情妇狗腿子的人。如果这个阶层膨胀过大，国家的前途只有一个——灭亡。他们或是慷慨激昂或是阴险狡诈，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银两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所谓良知、信念、梦想，或公义，永远透不过皮层下面那厚厚的脂肪。

这个阶层该不该骂？当然该骂！要骂这个阶层么？不要。因为在这次转变中，讲的是整个行政系统，而非官僚阶层。官僚阶层只是寄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一个特殊群体。只要国家还正常运转，就不能把行政系统和官僚阶层之间划等号。整个行政系统转头，并非为了实实在在的银两。

各级核心人物基本上没有参与四清，派下去的，都是秘书、助手啥的，最多也就是二把手。因为运动嘛，需要有人坐镇指挥。而且这些人的知名度相对较高，下去后也起不到啥作用。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说自己不承担主要风险。

当时的农村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当年的上层官员想从农民那里获利不太现实。况且当时正在搞政治运动，没有谁那么傻迎着风当出头鸟。傻到那程度，不好意思，根本就不配当官——不配在中国当官。当然，作为青天大老爷下去的工作组成员可能得到好处，比方说收点土特产（正宗的土鸡、土鸡蛋、野生鱼等等）改善下生活，是有可能的。

既然看不见实际利益，那么上层官吏是如何获利的？只好从看不见的地方入手了。

整个行政系统，从原来支持毛泽东转向支持刘少奇，在这个时期，除了短暂的经济调整之外，就是这个四清运动。当时在行政系统内部，有一大批从军队转业过来的干部。这些人可是长时间忠心于毛泽东的，不可能因为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背离毛泽东。比方说，毛泽东死后很久，老一代的将军仍坚持忠心于他。行政系统短时间内倒向刘少奇，中间一定有隐情。这个隐情在哪里？

关于刘少奇如何应对行政系统。正史是这么介绍的：通过经济调整，大家觉得刘少奇行，愿意跟着他干。要说刘少奇通过短短一段时间的经济调整，就让整个行政系统脱离这个国家的缔造者，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当然这是愿意，但不是主要愿意。个人认为主因是刘少奇的政策消除了整个上层官吏的隐痛。

回过头，回到大饥荒时代。

大饥荒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上至领袖毛泽东，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下至大队书记、村干部都有责任。从中央到地方，中间任何一个阶层能够置身事外，大饥荒都不会如此严重。好几年的时间里，国家和人民，从生命到财产，均损失惨重。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大黑锅，其重量必然是整个官吏阶层共同承担才能担得起。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人人检讨。有人有资格说跟我没关系

么？没有。大家均站在黑锅下面，落得一身黑。

不仅是身体黑，心里也难受。做错了事，心里难受，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不小心伤害了其他人，都会感到内疚，感到不好意思。如果把那人伤害得比较严重，会有负罪感。如果工作干砸了，也是一样，会觉得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同事、对不起爹娘妻儿、对不起祖先等等。如果这时候有人指出，这件事搞砸的原因并不在你们，而是另有其人，只要把那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补救余地，内心那种负疚感或者说负罪感就会减弱，就会鼓起勇气去解决那问题。

官吏也是一样，他们也是人，肉身凡胎。就算是最为典型的官僚，首先还是一个人，并非变形金刚啥的。当官，实际上也就是工作。干得好，心里高兴；干不好，心里难受。如果干了错事，那就会有负疚感；重大错事，就会有负罪感。就算隐藏得再好，人终究是社会动物，社会文化的基因会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比方说吴芝圃最后的检讨，说引颈就戮也是心甘情愿，我相信这是真心话。比方说曾希圣，晚年研究农业播种，也是出于一种心理补偿。比方说李井泉，平反后尽力干点事，也是一样。

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共同检讨，集体扛下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一个如此高效的官吏团队为何会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为什么？相信包括毛泽东，很多很多人都在心里问过无数遍。

困惑不解，问题必然继续。

如何解惑呢？就是查账。所谓查账，也就是查责任。查到责任在谁头上就算谁的。如果把责任查清楚，那么一些人就会清白。所谓四清，就是查账。经济也好，思想也好，组织也好，政治也罢，说到底都是查账，也就是查责任。其实所有政治运动都一样，都是算账。四清运动如此，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理清了这一点，就能继续了。

刘少奇把四清升级，从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升级的结果是，行政系统倒向了他那一边。个人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刘少奇通过大四清，大肆通过上层查下层，查出无数问题来。有经济问题，有政治问题，有组织问题，还有分工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地右富坏反，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个问题说明了啥呢？说明了当年在大跃进过程中，基层工作很坏很坏，坏到没法看。这些基层干部在反动势力的煽动下，欺上瞒下，干了无尽的坏事。基层坏事越多，责任越大，暗示上层罪过越小。就好比两个人一同干了一件错事，分为主犯和从犯。主犯干的越大，过错越大，就意味着从犯干的越少，过错越小。

当四清运动全面升温之后，把大饥荒的过错导向基层，消除了上层官吏那种心理负疚或者负罪

感。这些人当年支持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他们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现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进入死角，他们偏向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的政策消除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

所以说在整个上层官吏系统中，他们没有得到看得见的利益，但是还是得利了。写到此又想起太史公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我们分析利益的时候，不要把目光仅仅盯在金钱或权力上。

女人心海底针。那么官吏的心又该如何？呵呵，大家应该有答案了吧。

十一、交锋

通过以上一些论述，才能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一些激烈的言词。

从刘少奇决定调整经济开始，已经在做打算了。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两人实际上已经进入交锋状态。在刘少奇出国访问期间，毛泽东搞了小四清。小四清的真正目的还是整理经济。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毛泽东打算重新回到一线管经济了。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把四清升温，等于和毛泽东摊牌。因为毛泽东一生都自誉为基层代表，把责任导向基层，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事情到了这个田地，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那一天，两位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大人物最终由不爽、很不爽，到完全摊牌。

事情还得从五天前说起，十五号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家们再次开会，研究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开幕式上，刘少奇说：“主席身体不好，而且又处于二线，这次的工作会议只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他的一些意见已经转告各地，就不必请他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幕时的讲话，也是由刘少奇讲的。通常闭幕大会的讲话由毛泽东来讲，而毛泽东根本没有被告知参加这个大会，他愤怒了，决定反击。毛泽东提出要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并且亲自让秘书通知了名单上的有关人员。毛泽东说：“这次社教究竟要搞什么？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四清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四不清的性质是什么？打击面的比例要占多少？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都需要认真，为什么不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让我谈谈我的意见呢？我有话要讲！”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电话，意识到了什么，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二月二十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还没有来，就问：“我们的秦始皇哪里去了，怎么不积极了？”邓小平说：“他马上就到，让我们先开始。”毛泽东说：“这样重要的会议，许多的情况我却不了解，也没有人来向我汇报。我还是党的主席就已经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很难说了。依我看，你们这两年来严重地右倾，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的准备工作就表现出来了。”接下来又对一些实际工作提出批评。

会议中间，刘少奇匆忙赶来，向毛泽东点点头：“来晚了会儿，有点事情被缠住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现在是个忙人，我是个闲人。你来了你就先讲话，发一个号令嘛，因为你是国家主席嘛。”不冷不热，态度暧昧。此时的刘少奇确实是个大忙人，因为第二天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他是下一届国家主席的候选人。光看开头，就知道两人已经不对路。其实早在六四年的春节座谈会，两人已经就教育问题争议很大了。

刘少奇说：“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点是一致的，

就是必须下去蹲点，领导干部必须下去参加和领导四清和五反，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大家可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一下嘛！这是目前全党的大事。”

毛泽东说：“大事？大事应该是当前的阶级斗争！我看这次会议还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有什么矛盾？矛盾属于什么性质？这些矛盾究竟应该怎么解决？”

刘少奇：“大家下去蹲点了，方向正确，认识基本一致了。”

毛泽东马上说：“方向对不对，要在省、县、区、大队、小队里都发动起群众了，同时群众成立了贫协会等组织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细致和长期的工作，现在还仅仅停留在我们的文件。河北省听说也死了不少人，都是什么四不清分子，都是自杀的。为什么要自杀呀？方向明确了还自杀？我看还是不明确！”

刘少奇摇摇头说：“我对农村知道一些，但对城市了解少，农村材料看得多些。这几天对城市工厂的材料正在努力看，我这里的材料还是初期的经验，有些人对这次四清和五反不那么理解，声势浩大的运动起来了，严重四不清的人感到了恐惧，这是经常的。也是我们在一定的时期需要的，不造成这样的威慑作用，运动就开展不下去。”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地富反坏分子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只搞地富分子，贫下中农是通过的。但是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解决干部的问题。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恨，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群众主要的对头嘛，主要的是那些坏干部顶在他们的头上，坏当权派骑在他们脖子上拉屎拉尿，他们穷得很受不了，产生了和坏当权派的严重对立。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对贫下中农和社员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作用很大，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革命就解决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讨论了多次，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看这次会议就没有取得预定的收获。”

到此毛泽东已经亮出来自己的观点：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坏的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言外之意，要整党内坏的当权派。坏的当权派是那些人？当然就是所谓的修正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换成以前，毛泽东表态，刘少奇会第一个赞同。现在不一样了，刘少奇要用自己的理论为政策辩解。

这是两位理论高手在较量，但这两位能量绝不仅仅在理论方面。

刘少奇说：“这是头一回较量嘛，认识不一定统一。当权派后面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很密切，地富反坏分子混进组织，包括漏划的地富变成贫农和共产党员，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

刘少奇说：“如果不叫富裕阶层，那就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把这些统一叫四不清分子或者四不清干部也可以，这是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新概念。”

关于这个新概念，刘少奇解释：“四不清分子和四不清干部与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的总是多，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是少数，压迫人民越厉害，他们就越孤立了，我说的信心就在这里。”

这个所谓新概念，并非是什么新发明，而是有利于解释党内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个概念在他自己和毛泽东之间划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最终演变成了楚河汉界。

刘少奇说：“漏划的也不少，和平土改区多。许多地区当年对划成分不重视，走了过场，后来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了，但是已经迟了。我在蹲点时就遇到不少这样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坚决地重新定成分，从这个形式上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

邓小平说：“我赞成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四清不搞退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这是让群众得到果实的时候嘛。打土豪是为了分田地，这次搞四清也是为了让群众得到物资上的好处，不然他们就没有积极性。”

刘少奇继续补充说：“搞掉四不清分子或他们的职务后，等于教育了干部和群众。他们的干部不能当了，当然多数还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一定要搞彻底，恐怕这个政策和策略要定下来。”

邓小平点头说：“赞成！少数恶劣的四不清分子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到此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配合相当默契了。两人配合，至少开会时，说道理并不输给毛泽东。但毛泽东是不会退让的，毛泽东讽刺地说：“他们先富裕，你就用扣工分的办法解决。”

自行车、毛衣都有的，还有富裕的贫下中农。这些人还能用你那个解决办法吗？查应该是查有问题的人的东西，把所有富裕的人都列入四清的范围，能行吗？”

刘少奇说：“我现在说的还是王任重讲的四清，可适用于机关搞五反。”不能不承认刘少奇把事情大大复杂化了：发明新概念不算，还把这个运动搞成一块一块的，王任重的四清，王光美的四清，每块适用不同范围，太复杂繁琐了。

最后邓小平说：“四清这两个字的含义，在第一个‘十条’里已经从正面提了，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由王光美的报告和河南省委从反面提出来了。这样讲的结果当然使人们只是从经济上来看待这次运动。如果没有根本上的退赔，搞四清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李雪峰补充说：“我们先搞经济上的四不清，再搞政治上的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的清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后，我们又连上了思想上的清理，于是成了四清。”李雪峰时任华北局书记，文革挨批。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没有这个印象了，但是你们把王任重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报告是王任重的。现在你们大吹王光美，把四清运动的真正发明人倒丢到脑后了，这样的做法不妥当嘛。”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把好账挂在河北的账上，王任重也是河北人么？你老婆的那个什么桃园经验整的人是否扩大化呀？”

刘少奇说：“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只要把这个经验整理出来，对全国的社教都是有启发的。王光美的经验也是有重点的，她蹲点采取的办法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带任何的框框下去。也就是从扎根串连中发现问题，从社员们的呼声中找到办法。事实证明，这一条还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那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打倒，我看主要是先把只有一百块至一百五十块贪污问题的干部都解放出来，这样才能做到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不使我们受到孤立。”

刘少奇顶回来：“那也不一定，几百块的也还是不少，一千元，一千斤粮的也相当多，首先让他们退赔，如果退赔得好，就是有一千元问题的人也可以解放出来，退赔得不好，几百元的也要严惩，而且还要他们退赔。这样就更有把握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说：“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你就能挤那样干净？我看不见得吧？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具备宽大条件的还要宽大处理么！”

刘少奇再次顶回来，说：“能挤多少就一定要挤多少，反正不能让他们四不清的人占了便宜。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就是要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是恶劣的，一直抵抗的，要坚决地没收他们的财产，看他们退赔不退赔。”

毛泽东摇摇头：“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这个提法对！但是也要讲合情合理的好，不必讲彻底。你讲彻底了，底下的同志办起来就没有余地了，总是要给下去的干部一个主动权嘛。凡事都要讲究留有余地，不给自己的干部留下余地，底下的同志怎么工作？他们没有主动权了好吗？”

这是毛泽东主张中的另一个重点，即给下面的干部留余地，这样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是毛泽东用人的一贯策略，现在重提，无非是反对刘少奇四清运动中的搞法。

刘少奇不满意地问道：“那打击面究竟多大好？百分之几对我们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苦贫的也可摘帽子，那是极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

的，有表现很坏的。这个我们掌握好了就不会出差错。我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定框框，还是要从扎根串连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这样提出政策才是真正地留有余地。”

邓小平马上赞成道：“打击面控制在百分之几有利？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掌握一个具体的数字。地富分子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就不能戴帽子了，贫下中农和中农极少数给他们戴上帽子，对进行批判或斗争也有好处，譬如有的能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就可以起到震慑其他四不清干部的作用。而且这样对那些出身好的社员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农村中不但有地富反坏分子的捣乱，也有贫下中农和出身好的人的破坏，四不清干部中这样出身的人占了多数。所以，简单地用成分作为标准是不科学的，但是对犯错误的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了，不能做党员了，但是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刘少奇说：“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多吃多占的人数量也不会少了。”

毛泽东问道：“你给他们叫什么分子？给群众留点出路，好么？整社员不涉及家庭，帽子还可以再摘嘛。只要是在其他问题上有好的表现的，可以不戴贪污帽子。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的拥护，也不要弄得人心惶惶。现在好多的地方死了人，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听到风声就自杀了的。过去手脚不那么干净的，一听运动来了，就胆战心惊，弄不清怎么整治他们，一死了之。有人说：‘不怕天不怕地，就怕共产党搞运动。’这些话你们听到了没有？我早就讲过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而不是见四不清就斗争，就整人。整是整，就整当权派。他们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群众出几个贪污的，多吃多占的，算什么！”

刘少奇说：“群众中也有歪风邪气严重的，不整是不行的。四不清分子有相当大的势力，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集团。抓不住他们，他们就要造反！”

话说到此，可以说双方都到了底线。如果开会的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可以到此结束了，因为已经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再说下去只会伤了颜面，像他们这个层次的人一般都是谈笑间置敌人于死地。

毛泽东要抓上层，整顿党内坏人，而刘少奇依然坚持整下层，双方各不相让。此时不是两位伟人在斗争，而是伟人背后的阶层。刘少奇背后，站着整个行政系统。毛泽东背后，是军方和下层。这样的碰撞，注定是火星撞地球。不论谁胜谁负，国家都将面临新一轮的动荡。

越线过后怎么办呢？继续辩呗。为啥还要继续辩论呢？因为这是在中央政治局上，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能量，支持谁、反对谁都很重要。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需要他们。

毛泽东说：“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

钱少的做小官，反正问题不少。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你怎么解释？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你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连良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也讲对贪污的问题要具体分析。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给你们泼冷水呀！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说，对群众中的问题和对当权派的问题处理不能完全一样了，要有个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了。”

刘少奇说：“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群众是懂得许多的道理的。”

毛泽东不满说：“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五反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使得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了业，这就是盲目性嘛。不能搞斗争搞到了自己的头上嘛。那时的五反斗争是谁搞的？是不是你这个皇帝？”

单看这一段，两个人的位置好像调换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搞运动，搞得很热烈。而刘少奇抓实际工作，倾向于保守一点。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至少在五月二十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扮演了激进派。毛泽东不但不同意刘少奇的激进，而且翻出历史旧账，认为三反五反斗争也太左了，耽误了生产。

刘少奇说：“我当时就怀疑。”不认，当然不能认同。认了三反五反，接下来大跃进怎么办？也得认么？不能认，打死也不能认。不认账怎么办呢？那就继续。

毛泽东说：“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要准备长期作战。只要我们隔两三年不搞，反动势力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的敌人，一个新生的敌人，一个烂掉的班子，这些都是指的当权派，我们要搞就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你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要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去当经理，就是先擒下马来，然后改造。重点就是当权派。四清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要听一些人散布的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哪个历史朝代没有四不清？什么时候都有党内外矛盾交叉。提法抓不往问题的关键，其他的工作就都会走了样。”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的，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但是许多问题，我们横竖搞不准，我们就要留给下一代，不要事事都是我们这些人给他们作标准。总之我们只是抓大事。”

刘少奇插话说：“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外矛盾交叉，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摇摇头说：“你还有那么步骤我就不赞成了，你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开始就是联系小职

员嘛！你在安源时，联系肖志远，朱锦堂，还有朱少廉的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又联络要成立工会，工人你一个不认识，我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办法，你是否又用到这次社教中来了？”

刘少奇说：“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才会不要上当，扎根串连，是李雪峰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他们不怕事。有一时期居然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老实根子，工作队不一定一开始就能找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说他是根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组织我们自己的队伍。”

毛泽东火了：“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是搞社会主义。你总是离不开你那套神秘秘的工作方法，要搞群众运动嘛！”

刘少奇辩解道：“群众也是要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地出来嘛，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他就可以带动起群众来，你说他不是老资格？群众没有他们发动不起来嘛！”

毛泽东摇头说：“李立三同志倒是老资格，但是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你和他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都是搞少数人的秘密行动，总是不敢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刘少奇说：“不只是李立三吧，蒋光头也跑了，李立三认为他的人多，因为宣传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规定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我的这套办法还是灵的，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了。”

毛泽东说：“你是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的人。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整了几个？”

刘少奇说：“我们主张对犯了四不清错误的人，先背靠背地揭发，看看究竟能够揭发出多少问题来，然后让他们坐在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让四不清分子自己检查，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到了确实证明他们没有问题了，再把他们逐步地实行退赔后解放出来。当然有了四不清问题的人还是要给予处理的，究竟怎样处理由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大会来决定。”

毛泽东讥讽地说：“这不是做样子吗？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我们的少奇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不灵，少奇一骂还不是下去了？就是做样子也要这样干，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制度。”

毛泽东看了看刘少奇说：“所以需要你这个死命令，我看我们这个国家还是应该有个秦始皇。如果要有秦始皇是谁？就是你刘少奇，我只配给你当助手。同志们说对不对呀，我给刘少奇当个助手行不行呀？我现在已经没有刘少奇这个权威了，只能当下手。”

大概就是这样，开会的结果已经不能用“不欢而散”这个词来形容了，是全面摊牌。

毛泽东看着刘少奇，看着几十年来一直提拔、栽培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那个踏实肯干的助手，而是成为了自己的敌人。好吧，既然你一意孤行，莫怪我不讲情谊了。

刘少奇看着毛泽东，看着这个老领导、历史巨人，感慨良多。并非我想要走向你的对立面，实在是你已经落伍了，而你却不认为自己落伍，我将用我的行动证明你已经落伍。

纵有数十年的战斗情谊，为了各自理想，也得各奔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历史的玩偶。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中共最强的政治同盟终于走向分裂对抗。

从毛泽东走向会场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不会平静了。等到刘少奇到会之后，一切已经不可避免。其他人除了静静倾听，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态度问题，即支持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心中各有各的一本帐。

会议上的毛泽东还是长期以来那个毛泽东，刘少奇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刘少奇了。之前那个毛泽东的助手摇身一变，变成建国之后毛泽东的最大对手。

之前的刘少奇看到毛泽东不满，立刻就会改变策略、消除分歧，甚至通过自我批评来达成谅解。此时的刘少奇已经骑到老虎背上下不来了。

刘少奇转变不稀罕，稀罕的是转变得如此剧烈。在那个政治经常大变动的岁月里，政治家转变很正常。比方说邓小平原本是毛泽东的亲信，后转变成反对毛泽东。比方说毛泽东原本支持高岗，后来反对高岗。刘少奇原本和毛泽东站在同一条船上，出于大饥荒的逼迫调整政策，这些前面都解释了，属于正常现象。

现在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刘少奇的身份都是实干家，这一次怎么钟情运动了？

要解释这个转变，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用厚黑那一套，说刘少奇搞运动为了整人夺权，从接班人位置上转正。刘少奇是搞运动的行家高手，这一次搞四清，取得了行政系统的支持。他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想要赶毛泽东走人了。毛泽东自己也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比方说尊称刘少奇为秦始皇。而且刘少奇之前也对毛泽东说过：“年龄大了，可以当党主席，其它事我们来干。”这么解释可以说服不少人，却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

弄清领导人的斗争之前，首先要清楚，权力是一杯毒酒，也是一副良药，可以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灾难，也可以带来荣耀。权力可以是最好的东西，所以引得世间无数人竞相折腰，纵然身不能至，也是心向往之，掌握不了权力就对掌权之人摧眉折腰。权力也可以是最坏的东西，所以无数人唾弃谩骂，骂权力，诅咒掌权之人，个别人竟然可以在不知不觉间达到歇斯底里的至高境界，让后人难以望其背项。

问题的关键要看谁掌权、以什么样的方式掌权。这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赢得所有人的

赞誉，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权力博得所有人的谩骂。因为让所有人满意的权力是不存在的，或许在天堂和共产主义世界中可以勉强达到，但是人类社会达到那种境界之前，权力就消失了。同样，能够惹所有人诅咒的权力在此之前就被推翻了。权力掌控者能够博得大多数人的赞誉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这个大多数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将稳如泰山。

而且攫取权力者的目的各有不同。有人往上爬，是为了权力本身，爬上去之后就不下来，站着茅坑不拉屎或者一直拉屎，这是政客的行为；另外一些人，则是为了用权力去干一些事，为国为民，这是政治家的行为。

刘少奇搞四清，就是为了取代毛泽东，这点前面已经分析了。现在要回头看看运动的目的，究竟为了权力而夺权，还是为了干实事。

再次回头看看大饥荒以来，刘少奇的总体转变。刘少奇起于工运，从延安整风开始，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党内主要助手，干了将近三十年，作用相当于林彪在军内。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全力以赴加入到毛泽东的领导小组，忠心耿耿地执行策略，直到大饥荒的到来。从湖南调查开始，刘少奇下决心转变，即逐步脱离毛泽东的政策。

在那空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一份被称为“虎头蛇尾”的报告。那份报告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巨大的矛盾，把自己推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理论还是之前的理论（三面红旗），实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实践。站在理论的立场上看实践，就是资和修。所以毛泽东看刘少奇，也是在搞资和修。

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矛盾，需要改变。刘少奇也看到了其中的矛盾，也需要改变。毛泽东坚持原来的理论指导实践，因为当时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刘少奇趋向于从实践中打开缺口，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出路。如果最后理论迫使实践回归，那就意味着刘少奇失败。如果实践改变了理论，那就是毛泽东的失败。

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合作的那几十年里也有分歧。比方说建国初的高岗事件，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那件事的结果是，刘少奇妥协，毛泽东舍弃高岗。高岗事件中，两人的分歧也不小，最终却得以和好。这一次两个人为啥要押上全部筹码？

答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彼时毛刘分歧，只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大家都在雄心勃勃地搞建设，起点是一张白纸，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没有太大压力。即使有不和，也被未来的光辉前景给冲淡了。那时候大家需要携手共进，让未来的光明前景更加光明，然后在历史上留下各自的光辉形象。

此时毛刘分歧也是在建国方式上步调不太一致，然而局势已经变了，之前建设出现巨大纰漏，

大饥荒已经成为历史上最为巨大的黑锅，失败者要为大饥荒买单。这是一点，属于巨大压力；还有一点，则是巨大诱惑。我们在第三篇论述到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在下层，即农民和军方。在军方，是因为毛泽东缔造了军队，领导并指挥军队取得无上荣耀。在农民，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土地政策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的土地问题，领导了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资源再分配。这一次，在刘少奇的实践政策中，再一次出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再一次实现资源再分配，即再一次分地，相当于第二次土改。如果刘少奇能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他的威望可能直逼毛泽东。二十年之后，所谓改革开放，说穿了，也就是资源再分配而已。今天大家闹改革，说穿了，还是希望资源重新分配而已。

纵观历史上的巨人，没有人愿意去独自承担那么大的历史黑锅，也没有人可以经得起如此巨大的诱惑。毛泽东不能，刘少奇也不能，后来的邓小平依然不能。

刘少奇想要取代毛泽东，想要从实践上指导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方式就是搞运动。通过运动增加自己的势力，通过运动削减毛泽东的势力，可以把他的行为理解为权力之争。对政治家而言，权力背后是理念。所谓浩劫，所谓运动，不过是理念的差异而已。当两人的理念相同时，可以形成最有力的战斗同盟，分开则惹来最激烈的政治运动。

打通了这一层就能理解，为何刘少奇突然左转，一下子剧烈起来了。

最后需要指出一点，就是刘少奇的这番转变引来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让毛泽东认定国家建设之所以出了那么大的问题，皆因为政策执行上出现了错误。特别是通过四清运动，亲眼见证刘少奇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更加认定是政策执行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他甚至还在怀疑，刘少奇在他身边隐忍了那么久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走向最高领导的岗位，如同赫鲁晓夫隐藏在斯大林身边。自从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政坛就扮演了反面角色，形形色色的赫鲁晓夫纷纷浮出水面，可怜的赫鲁晓夫是躺着也中枪。而这些所谓的赫鲁晓夫中间，分量最大的无疑就是刘少奇。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促使了二十年后邓小平对中国经济进行调整。因为刘少奇的实践（邓小平也参与其中），邓小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核心之后，有了样板可以参照，少走了很多弯路，节省了探索时间。后来邓小平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把之前刘少奇赞同的“责任田”制进一步发挥，接下来就是改革开放，然后就是今天的争论。

这一正一反两个结果，如同硬币的两面，在刘少奇那里结合起来。

十二、毛泽东的选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两个人还有缓解的余地么？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应该还有几天，但两人此刻都没有缓解的意思。又过一年，刘少奇最后一次面见毛泽东，提出回老家种田时，已经太晚了。运动已经兴起，毛泽东能做的也就是因势利导而已。

会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对话很意思。

邓小平对刘少奇说：“主席的情绪太大，下次会议还是劝他一下，别让他再参加会议了，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否则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是定不下来。”刘少奇说：“那得你去和他讲，我去讲还是会出问题的。”

刘少奇又说：“但是许多问题你不向主席汇报还不行，绕又绕不过去。还是多征求他的意见为好。只要有婆婆在，媳妇到老也是难当家呀。”这应该是真心话。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想的还是你老人家就不要来掺合了，看看我们是如何干活的吧。邓小平应该真的这么做了，这才有了八天之后，毛泽东拿着宪法和党章闯入会场开会的事。

六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六号，毛泽东生日。

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定了几桌菜，请一批人来吃饭。名义上还是庆祝七十一大寿，其实根本不是。在他的客人名单里，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中央领导人，也有钱学森、陈永贵、王进喜等科学家和劳模，老婆、孩子都没有请。吃饭时，中央和大区领导人坐在一起，毛泽东和钱学森他们坐在一起。

以往这样的场景，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说话诙谐幽默，引来笑声阵阵。这一次完全不同，局势已经消磨掉了他幽默的心境。毛泽东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的孩子没来，他们没资格。”接下来话题又转到在座的身上，大意是：你们都是国家有功之臣，干了很多工作；这四清我是没有下去蹲点，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机关又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修正主义威胁，等等。

毛泽东走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

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下去蹲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能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入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的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这大概是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生日之一。这次庆生宴的目的是啥？从客人名单来看，人数不多。中央领导和大区领导人，这些人参与了六天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了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请他们来干吗？无非是吹吹风，让他们冷静冷静。至于钱学森、王进喜他们，根本就是干活的，对上层人物之间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不错了。毛泽东拉他们过来作陪，也就是一个暗示。暗示对面那桌子人，该回头回头，要不然有你们好看；活是科学家和劳模们干的，你们不要瞎折腾了；还有就是本人开始管事了。吹风或暗示，只是开始而已。

这些动作似乎没起多大作用。因为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号，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到会场，参与四清讨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见了毛泽东，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到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他是带着《党章》和《宪法》进入会场的。

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说：“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既然说话了，那就火力全开。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的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四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这些话都是冲着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去的。

接下来，毛泽东把刘少奇修改的《后十条》逐条批驳。当然还是老生常谈，大意就是说这个文件是冲基层去的，把问题导向了基层，浅点说是方向问题，深点说是路线错误。最后总结：“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分清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这次四清不把运动的主要对象放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完全失去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必然要使运动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这正是毛泽东的特点，不动手则以，动手就是雷霆之威，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当然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陈伯达等人在助阵。陈伯达号称大笔杆子，他的理论功底深厚到看见一只苍蝇飞过来，就能联系到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陈大笔杆子一看毛泽东对少奇同志不满意，就顺着毛泽东的话，从“理论”上加以发挥说：所谓清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质，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确的，性质不清楚，就会迷失方向。他这个发言，受毛泽东欣赏。后来陈伯达建议停发原来的《十六条》，推倒重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撰写《二十三条》。

所有现象均表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摊开了矛盾。尽管如此，五天之后，也就是六五年一月三号，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刘少奇依然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国家元首。这是刘少奇在行政系统内部的胜利，也是刘少奇一辈子最后一次胜利。

就在刘少奇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晚上，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在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四

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联，结果“冷冷清清”；第二个十条“太长了，太繁了”。

毛泽东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三条：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接下来就是《二十三条》出台了。

二十三条，就是毛泽东的雷霆之怒。

毛泽东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清运动，我再三强调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重新改造人的运动，目的就是为教育而不是惩办。但是现在发展的结果是大大地整人，刘少奇搞什么扎根串连、秘密进村，干什么去了？为了整人嘛！我看了许多的材料，到处都是控诉工作队如何整人，为了一百块钱几天几夜不让人家睡觉，不给人家吃饭，轮番批斗，甚至吊在树上剥光衣服毒打，这还不是法西斯吗？一个地区死了几千人，说是自杀，鬼才相信。所以我让他们重新搞政策，绝对不能这样下去，要纠正刘少奇这种形左而实右的东西！当然我公开这样说，他们都会反对的。但是我如果不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批评他们了。有人对我说，刘少奇已经变成真正的秦始皇了，在党内和国内都是说一不二了。”

毛泽东轻易不表态，一旦表态，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条路走到黑了。

毛泽东打电话通知陈伯达赶到他的住处。大笔杆子看到这样一个毛泽东：因为整夜不睡觉，眼睛里布满血丝；但他丝毫不在意这些，而是边抽烟边说话，来回不停地走动——这是一个思考结束，进入战斗状态的毛泽东，这样的毛泽东是不可阻挡的。对毛泽东了解颇深的陈伯达一下子想起战争时代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不可阻挡！

毛泽东说：“不能让他们胡闹！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我只是主张批判那几个代表人物就算了，刘少奇他们一插手，来了个工农兵学商齐动手，右派分子满天开花。这样也好，可以起点警告作用，无非是给他们摘帽子罢了。现在，少奇同志又想满天开花，我是不会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伯达同志，我说你记！”

接下来毛泽东口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初稿，点名批评刘少奇。他说：“我看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说的那些矛盾都没有牵涉问题的本质，也没说明问题的根本性质。说到底，社教中出现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忘记这点，就是欺骗了人民。我看刘少奇是在为那些走资派说话。我看他就是要把斗争的方向给搞乱，矛头向下，混战一场，最后来一个混水摸鱼。”

通过这些言语，可以证明毛泽东基本上摸清了刘少奇的动作和目的。外人、甚至今天大多数人对当年的是非曲直依然是云山雾罩，但对于当事人而言不是问题。

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太熟悉了！两人在一起共事数十年，如何运动，如何出牌，以及最终目的如何，简直是了如指掌。刘少奇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同样了解刘少奇。

大笔杆子把毛泽东口述的材料整理成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就不转述了，大意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基层不要搞太过火了，要整理上面。根据薄一波回忆，《二十三条》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解放了一批干部，减少了损失。

然而《二十三条》仅仅缓解了基层左倾局势，却没能解决党内走资派问题。这个问题由另外一场运动来解决，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它依然影响深远。

五年之后，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毛泽东回答：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

评：《二十三条》只是毛泽东扔向行政系统的第一枚炸弹，是全面进攻的开始。

PS：下面是二十三条的内容，作为资料附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没兴趣的绕过。

一、形势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 and 希望。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

现在的问题，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运动的性质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

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

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

三、统一提法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四、搞好运动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

2、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他们。明确宣布，不论在什么社队，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

3、工作队必须在运动和斗争过程中，发动贫下中农，组织阶级队伍，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同他们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4、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

5、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6、在运动中，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像小脚女人，不要束手束脚。同时，要深入细致，不要大轰大嗡。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7、总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极少数。有些人犯了错误，还可改正。对四清的对象，必须善于分化他们，区别对待，把最坏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进行初步的排队。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很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点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队，要上下左右适当地结合起来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发展，解决一批地方的问题，又解决另一批地方的问题。

各省、市要有调配力量的机动权，必要时可以调集一些干部，在运动中培养训练。

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这样，点可以多搞一些，也利于走群众路线。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配备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和懂得走群众路线的骨干。

七、蹲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蹲点，可以有不同的办法。要有一批人比较长期地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把运动搞完。中央局、省、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要实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除了选择一个地方蹲下来以外，他们还可以在自己蹲点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会议，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他们还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视，或者组织小型巡视团，以便掌握动态，互通情报，交流经验。

八、抓面的工作

必须兼顾点和面。现在进行四清运动重点以外的面，占全国的绝大部分。这些地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必须认真做好。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区、全省、全专区的工作。面上，也要适当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启发自觉，洗手洗澡。应当向他们明确宣布，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

有的县，如果有条件，经过省委批准，也可以进行一些四清试点工作。

可参考一些地方整训干部、由点带面的有效办法。

九、干部问题

1、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

2、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

3、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又说过：“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仍然必须遵守毛泽东同志这些指示。

我们对于犯错误的干部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4、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对于那些错误性质一时分辨不清楚、又不适宜留在原工作岗位上的干部，可以调换工作，或者集训，进行审查。

5、经济退赔，不能马马虎虎，同时要合情合理。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过群众同意，退赔可以减、缓、免。

6、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不称职的干部，有的可以调整，有的可以改选。不够条件的党员，可以劝他们退党。这些都可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7、性质严重、领导权由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的，要夺权。先斗争，后撤职。一般的，党籍问题放在后头解决。个别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撤职，开除党籍，以至拘留。钻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要开除党籍。

在要夺权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下，要采取妥当办法，把民兵的枪支、弹药收上来，发给贫下中农中可靠的人。

8、个别对群众有严重威胁的反、坏分子，必要时，有的可以暂时放在当地看管起来，有的送农场劳动，同时审理他们的案件。重大案件，例如，杀人放火或有其他严重罪行的现行犯，要逮捕法办。

9、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要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

十、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

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贫农下中农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在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会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一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

十一、时间

一个大队，半年左右。一个县，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从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

好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六、七年内，全国搞完。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确，运动的进展，就可以争取快些。

十二、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

瞒地，经过群众讨论，自愿公开后，国家对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负担，不加征购。

十三、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配合。不准因为那里搞了四清，就增加负担和多收贷款。财贸机关应当在投资、贷款等方面，适当支持进行四清地区的生产建设。

十四、工作队的成员

不一定要十分“干净”。犯过错误的，也可以参加，一方面便于教育改造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有些人可能熟悉内情，对工作有用处。

工作队要不断总结经验，定期整顿。

十五、给出路

对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有的不当干部了，不当党员了，可以让他们当社员，好好劳动。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都由群众审议决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

拿一个县来说，在四清中，四清后，要逐步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逐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设好一个社会主义的县，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

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十七、生产队规模

生产队可以在四清过程中，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进行适当调整或者改组，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居住比较集中的，可以超过三十户。居住比较分散的，可以少于三十户。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

十八、基层干部任期

要按六十条规定，定期进行民主选举。连选连任，一般的，以四年为限。贪污的，犯严重错误的，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

十九、监督问题

干部要有上下监督，主要是群众监督。在四清运动中，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监督机构的权力，要大于同级的执行机构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队，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态度

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是形而上学。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条文，使人得不到要领，是烦琐哲学。

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二十三、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十三、触手伸向军方

（一）刘少奇向军方伸手

刘少奇和毛泽东相识合作于一九二二年，别于一九六六年，前后四十四年。在这四十四年中，国内战争持续了二十七年，抗美援朝前后将近四年，一共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战争期间，刘少奇都是配角，作用是毛泽东在党内的总管。接下来经济建设，刘少奇才慢慢走向前台。走向前台之后的刘少奇从棋子变成棋手，成了毛泽东的对手，并且在行政系统内战胜了毛泽东，这是刘少奇的辉煌胜利。然而新中国由三条腿构成，仅仅一个行政系统是不够的，还有党，还有军。只有掌控了党和军，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这党政军三脚架中，党领导政府，党指挥军队，也就是说党处于最高地位，军队和政府相当于党的两只手，一文一武。没有文武两手的党内一把手是脆弱的，如张闻天。

在党内，毛泽东是一把手，但不太管事；刘少奇是二把手，主持党内日常事务。在党内是没有办法直接争夺的，因为党的功能要通过政府和军队表现出来。没有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党就成了一个空壳。比方说苏共，失去政府和军队之后就变成今天这模样。

刘少奇赢得了行政系统，相当于赢得了文官集团。要想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必须赢得军方的支持。这个太难了，军队是毛泽东一手带出来的，要让军队转向，呵呵，难于上青天呵！但是军方并非铁板一块，虽然他们视毛泽东为神明，但是毛泽东在军内也不管事，实际事务由其它将帅来管。只要把这些将帅拉过来，就能在党内赢得更多话语权。

在刘少奇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次绝佳的机会培养军方势力。

第一次是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重新整顿新四军。皖南事变之前的新四军主要听项英的，毛泽东都无可奈何。所谓重整新四军，意味着重新整合军事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两个人才：文武双全的饶漱石和军事奇才粟裕。

刘少奇和饶漱石也是老相识了，他把权力给饶漱石，没想到看错了人。应该说刘少奇的眼睛很毒，饶漱石掌权之后把陈毅给闹得日子很不好过。然而饶漱石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后来还和高岗在一起，想取刘少奇而代之！刘少奇和粟裕之间的故事前面已经说很多，这儿就不说了。

第二个机会来自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面临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是迫于国际国内环境，开会讨论“天下大事”。因为不但是中国抗战胜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还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首次扬眉吐气。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立马开打影响非常不好。即使要打，也得先谈谈，看看能否通过“和谈”达到目的。真打起来，也得找到合适的借口，师出有名，正所谓

师出有名。如若不然，名不正言不顺，会失去民心的。天下人都不鸟你了，仗还怎么打嘛？因此才有了强势一方的蒋介石几次三番邀请弱势一方的毛泽东离开延安窑洞去重庆开会。毛泽东去了重庆，刘少奇代理一把手。

国共面临的第二个共同问题就是抢占东北。

九一八之后，东北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已经十几个年头了。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已经往东北渗透，历时半世纪有余。国共双方力量均微弱，苏联红军消灭关东军之后，东北就成了一片真空。

四五年之后的东北，如同一个成熟的桃子，鲜艳欲滴啊，引得两党口水直流，大家都想去摘。如果国民党摘到，就有机会把共产党压缩在长江以北、黄河以西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如果共产党摘到，相当于有了一块可以真正安身立命的根据地来站稳脚跟，并且有机会复制历史上由北向南统一中国的故事。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延安的事由刘少奇说了算。

此时国共双方明争暗斗，一边谈一边打，刘少奇迎来一个真正发挥智慧的机会。刘少奇不负众望，整出了解放前最为重要的一个战略决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翻译过来就是，南方暂时扔给国民党，共产党集中全力向北发展，主要抢占东北。

东北的优势就不说了，什么接壤朝鲜啊，背靠苏联啊，这些还比较遥远。在这些大背景之前，首先是眼前利益。真正的利益有两个，一个是日本留下的工业基础和武器；另一个就是东北在苏联人手上。只要苏联人愿意，东北完全可以归共产党。虽然苏联名义上不支持共产党，但暗中给了不少好处。这才有了超豪华阵容去东北。

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派哪个当一把手呢？是彭真。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就不用解释了吧？然而彭真只能抓政治。在战争岁月，政治是没办法填饱肚子的。要吃饱饭，肯定得靠战争。现在大家只记得林彪在东北呼风唤雨。如果按照刘少奇的意思，东北主军的肯定不是林彪，而是另一个人，徐向前。

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最善于谋身。

（二）善谋的徐向前

徐向前，生于一九零一年，卒于一九九零年，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

身份：生于农家，长于贫寒。

性格：中庸。

兴趣爱好：喜欢戏曲，晋剧、粤剧、河北梆子都爱听；懂得玩乐器，弹扬琴、拉二胡都不错；针线活也不错，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还能给自己织毛衣，自己织了件毛背心，一穿就是三十年（质量过硬啊），最后成了徐家压箱底的宝物，现在这件毛背心还在博物馆；善于各种手工艺制作，喜爱读书写字等。另外还喜欢养动物，比方说在长征的时候，年轻的徐向前骑马挎枪走在前，马背上还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在长征中陪他走了很久。

给人印象：土气。徐向前话不多，一生说山西话（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爱吃山西饭，有“布衣元帅”之称。

主要经历：十八岁那年考上一个师范速成班，现在就是拿钱就能上的那种，而且毕业后很难找工作；当时还比较稀缺，所以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然而徐老师很不称职，因为思想政治不过关被辞退了。徐向前是个少言寡语之人，天知道他对大龄儿童说了啥，大概也就是社会很不公平，咱们日子很难过之类的话，然后就下岗了！

在动荡年代，失业未必不是好事。几个月以后，下岗职工徐向前再就业，这一次比较走运，找到一份高光、高风险、收入低但有前途的职业：摇身一变成了孙中山先生的侍卫！神奇的时代啊！新中国建立之后，徐向前和宋庆龄女士提到这事，宋女士惊讶莫名，说我怎么就记不得了。能记得才怪呢，当年大名鼎鼎的孙夫人当然记不住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卫士。

孙中山先生深感自己力量单薄，于是要搞自己的军队，创办了黄埔军校，徐向前同志又从侍卫变成学生。

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和同期被尊为黄埔三杰之一、深得蒋校长器重的陈赓大将相比，徐向前同学就低调多了。

校长蒋介石先生善于以相取人，具体说呢，就是看这个人的长相是否耐看，口齿是否伶俐，是不是老乡关系，文章写得怎么样。

有一天晚上蒋校长查哨，看见一个房间里有灯光，以为学生兵不按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训斥。正要发火之际，却发现一个人正借弱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心想孺子可教，便记住了这个人，此人名曰陈诚。

又有一天早晨，蒋校长在操场跑步，发现有一个同学比他更早，心想这小子不错、够勤奋，便去搭话，不搭话则以，一搭不得了，老乡啊！那人便是胡宗南。当年汤恩伯同学写了篇文章送给蒋校长，从此脱颖而出。如此这般，自以为赢得无数才俊。

尽管如此，蒋先生比如今的大学校长还是强多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在哪里？飞机上？宾馆？会场？还是在“制造”论文？反正不会早晨到操场跑步，也不会晚上去学生寝室就是了。

徐向前是另外一种情况，既没有高大威猛的身材，也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给校长写过文章。在校长面前不愿多说一句话，而且带着生硬的山西口音，让浙江人蒋介石听了就别捏，而且是小学教师出身，以为此人乃“平平之辈”。加上后来林彪的遭遇，可见蒋校长以相取人的技术不怎么行。

英雄不惧出身低，打仗靠的是脑子。后来低调的徐向前和林彪远胜当年的尖子生。时光快进若干年，一九三一年的时候，蒋校长精心挑选的尖子们还在摸爬滚打的时候，蒋介石派兵去围剿中共第二大根据地，结果老实巴交的徐向前同学一次又一次给了那些人才们大大的惊喜，惊得他们合不拢嘴。

红军时代的徐向前威望达到顶点。井冈山上，毛泽东的军事地位时不时受到挑战；同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的军事地位却从未受到过挑战，因为军事就靠他。以至于抗战初期，很多人还将其与朱毛并列。等到蒋介石发现自己的错误，采取了补救措施，即高价购买徐向前的人头（和朱毛一个价），左等右等，等了几十年，从大陆等到台湾也没等到有人提着徐向前的人头来推销。

军事成绩很大的徐向前好像对政治没啥兴趣。张国焘得势，徐向前不表态反对毛泽东。毛泽东得势，徐向前同样态度暧昧不明。以至于张国焘不信任徐向前，用陈浩昌压制，还把徐向前的老婆给整死了。到了毛泽东的手下，徐向前同样不被信任，从来没有独当一面的经历。不管张国焘也好，毛泽东也罢，不信任归不信任，都从徐向前那里得到超额回报。没有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就没有张国焘后来的嚣张。

刘邓跃进大别山之后，徐向前于临汾晋中，干净利索地搞定阎锡山。

当然，徐向前并不完美，军事生涯中有污点，比方说西征。西征是注定失败的，名曰战略上打通苏联通道，实际不可能。从陕北黄土高坡出发，基本上是地广人稀。征兵没有兵员，征粮也不好征。过了兰州之后，就是几千里的戈壁滩，别说行军打仗，就是现在坐火车都够难受的。何况西北土匪之强悍，并不次于徐向前带的那两万人。在没有策应甚至后勤补给的情况下，怎么打？说不好听，还不如冷兵器时代的骑兵管用。徐向前的军事才华在西征时起到相反作用。如果徐向前指挥能力差点，而不是一路打胜仗打到人困马乏、全军覆没，一开始就失败的话，还是可以撤回来的。

不被重用的徐向前从不抱怨，也不声张。张国焘杀了他手下也不打招呼，杀了他老婆也不打招呼，这些徐向前都忍了。然而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等到张国焘跑到戴笠那边吃剩饭，等到陈浩昌惨淡结局，徐向前依然不倒。

在毛泽东时代，各种雷厉风行的运动中，病榻之上的徐向前竟然一一避过。就算卷入文革，就算被抄家，比起大红人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经非常幸运了。熬到邓小平时代，成了国防部长。

时也？命也？都不是，善谋身也！谋身者当如徐向前。

需要奋起时奋起，功成之后自身退。

徐向前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在民主法治尚未健全的时代，与其去争，不如早退。但徐向前的退让，和古代的隐士不同。徐虽不争功，但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从未退缩过，这就是真英雄的价值。

徐向前不争，不代表没人晓得其价值。毛泽东就启用过他，用了一半赶紧收回来。

真正想启用徐向前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之时进入权力核心，然而环顾四周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就不说了，通过整风，已经成了彻底的老大，党政军一人说了算。朱德总司令，地位稳如泰山。周恩来的地位就算不稳定，军方背景也很深。其他人，诸如彭德怀、贺龙等人，虽然党内地位不高，但都是军头，一个个神气不得了。就他刘少奇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军方背景。

怎么办？等呗。等到四五年抢占东北，安排彭真成为东北一把手，但是必须有人去打仗。刘少奇打算让徐向前复出，去东北管打仗的事。按照山头划分，徐向前应该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自愿跟蒋介石混了，徐向前也就闲了。

如果这事真的成了，东北组合就变成彭真搞党和政，徐向前主军，和当年鄂豫皖根据地的陈浩昌和徐向前这样的配置一样。以徐向前的个性，绝对不会和彭真争老大。那时东北变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以徐向前的军事才华，不见得差。要知道后来红军改编，中级军官（许世友等人）多出身于红四方面军，都是徐向前带出来的兵。即使文革时代，江青还说，要论山头，徐帅的山头最大。

这里再次假设一下，如果是徐向前和彭真把四野搞起来，那么刘少奇的资本一下子就变大了。那样的话，后来毛刘之争，刘少奇不见得会输。刘少奇输，并不是输在党内，更不是输在政治上，而是输在军方，说白了就是输在林彪身上。之所以输在林彪身上，皆因林彪去了东北，带领四野从北方杀向南方，在军内建立了极高的威望。

林彪在东北成功的秘诀是啥？除了指挥有方，就是土地政策搞得成功，这些方面徐向前搞得都不差，早在红四方面军时代就证明了嘛！

如果刘少奇起用徐向前，徐向前带着四野从东北杀出，然后抗美援朝，徐向前就成了最合适的那个人，他会像林彪一样以不赞同出兵的方式辞帅么？如果不会，那么十大元帅排行榜上，徐向前坐二望一。在后来的毛刘之争中，即使徐向前不支持刘少奇也不会像林彪那样控制着军方跟毛泽东走。即使毛泽东把徐向前拿下，批臭（参照彭德怀），那么林彪也没有那么高的威望控制军方。事情极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事情是这样，后来就没有高岗啥事，所谓的高饶联盟也就不存在。彭真的地位将空前提高，

将远远高于邓小平和陈云。如果经过历次运动之后，彭真还能保存下来，那么毛泽东死后……呵呵，有点远了。

可惜刘少奇的这一招意图比较明显的妙棋没有走成功。两个原因，一是徐向前身体不怎么样（但不见得比林彪差），最主要的是毛泽东不同意。那么好的一个位置当然要留给自己人——林彪。这是毛一生最具决定性的策略之一。林彪去了东北之后，不但垄断了军事指挥权，还把彭真给排挤了。彭真、陈云等人在东北做的政治经济工作后来（彭真成了反党人物，陈云成了右派）统统变成了林彪的功劳。

（三）彭德怀复起的背后

一九六五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庐山之后赋闲六年的彭德怀复出了，到西南三线去搞建设。

九月二十三日清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在颐年堂前等待着彭德怀的到来。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主要就干一件事——为自己洗脱冤情。洗了好几年，不但没有洗白，反而越洗越不清。大饥荒之后，辛辛苦苦写了“八万言”，非但没有平反，处境反而更糟了。身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原本中央开会还通知一下，彭德怀请假说不去了，后来也不通知了；原本中央发给政治局成员的材料还有一份，后来也没有了；原本在吴家花园还可以随处走动走动，现在所到之处皆有卫兵跟随。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彭德怀也没有睡大觉，他自己种菜、种瓜，所得果实赠给邻居或监视他的士兵。后来环境恶化，士兵再也不敢要他的任何东西。彭德怀本是农民，戎马一生，老来得到种地的机会。地是自己开垦的，肥料是自己从水塘里捞出来的污泥。技术么，请教附近的农民或者对着书本钻研。并自嘲曰，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按道理说这样也挺好，戎马一生之后，功成名就，安逸放松一下也好，符合传统思想。对大多数人可以，彭德怀不行，因为他并非名士，也不是所谓高人，他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打仗时实实在在，干活时也实实在在。越是实实在在地种地，越觉得问题严重。想一想嘛，彭德怀去种地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可以通过自己下水塘捞肥料、自己种地养活自己，为啥全国发生那么大的饥荒？他想不明白，搞不懂。如果是别人，那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他是彭德怀。所以即使是六一年，即使身陷囹圄看不见翻身的希望，他依然又跑回湖南老家调查。这一趟再次惹出麻烦。啥麻烦呢？就是回老家后栽了几棵树。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中央竟然对他立案侦查了。专案组专门跑到湖南一趟，调查彭德怀回湖南的言行。之前已经搞过一次，没事。这一次不同，结论曰：栽树，收买人心！——神奇啊！如果说彭德怀贪污受贿或者个人品德不行，调戏了良家妇女（当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损点私德，没啥。

偏偏是收买人心，结合头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这已经不是往彭德怀脑袋上扣屎盆子，是往死路上逼啊！

不过从这样的办事方式上也可以窥视为啥会搞出来大饥荒了。通过这种调查方式，可以把一个地区小麦亩产两千斤（假的）调查为真实的。

然后去农村种地的机会也没有了，成为一个囚徒。侄媳妇龙国英来看望他，建议：还是告老还乡吧。彭德怀不同意，因为他头上的那些帽子没去掉。闲来无事时倍感落寞，他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知音——明朝的于谦，并深深地爱上于谦那首《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确实，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多人曾经把彭德怀比喻成猛张飞，其实彭德怀更像于谦。

其实彭德怀的真正心思并不在农业上。虽然他可以干农民的活，但他的主要身份还是统帅。戎马一生，说转行就转行？哪有那么容易啊！正如他自己说的，每天夜里都会梦见战场。那枪声、那炮声、战士们那雄健的身躯才真正动人心魄啊！可惜一觉醒来仍然是个囚徒，如同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此情此景又让人想起一一九二年十一月四号那个晚上，年近七旬的老翁陆游的心境：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放翁一辈子对局势无能为力，没去过几次战场，立功更是可以忽略，但他是诗人。他这首诗看起来更像为千年之后的彭德怀写的。兵戈铁马啊，难道只能在梦中了么？还有机会么？机会是没有了，但一个似是而非的机会来了。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相见了

这天是个好日子，中南海秋高气爽，非常宜人。一别六年，两双强有力的大手再次相握，往事不堪回首啊！井冈山相识以来，是是非非发生那么多，从来没有分别这么久。不论谁对谁错，恩怨未了，是非仍在，终究是老相识啊。

其实这次会见之前，彭真等人已经和彭德怀“通气”，说那个老彭啊，现在局势有点紧张，打算让你去西南干点事。彭德怀当时拒绝了，理由是自己一块“臭石头”，如何干活？彭真拿出杀手锏，有可能带兵哦。带兵，对一个老将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啊！其实彭德怀已经心动了，但还需要一个台阶。九月二十三日，台阶来了。彭德怀接到一个电话，听到毛泽东（老乡）那浓浓的湖南乡音，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过彼此的乡音了。

毛泽东：“德怀，你有时间吗？”

彭德怀：“时间总是有的嘛！”

毛泽东：“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

彭德怀：“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

共事多年，彼此对对方太了解了，彭德怀知道这位老乡是个夜猫子，别人的清晨恰好是毛泽东的“午夜”，他不愿意在“午夜”打扰这位老乡的休息。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我说呀，你这个人还是那个犟脾气，叫你来你就来吧。”

和所有认识很久的人一样，纵然诸多不快也不能失去了面子。首先致以问候，啰嗦一点开场白，身体怎么样啊，多了白头发呀。当然咯，烟和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点上。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心结，不堪回首啊！两位湖南老人时隔多年在北京相见，如果不是在政治上闹别扭，应该好好坐下来唠嗑唠嗑。然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唠嗑你家媳妇是否孝顺、我家孙子是不是调皮之类的话。两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物，一个已经从赫赫有名的统帅，从民族英雄变成反党集团头目，另一个还是伟大领袖，个中滋味局恐怕外人难以品味吧。

略有尴尬的氛围中，两个倔强的老人面对面吞云吐雾良久，毛泽东发话了：“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这一刻两个人都动了感情。按照孔子的话，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此时毛泽东七十三岁，彭德怀六十五岁，人生经历无数，该看透的早已看透，何苦呢？怎么会弄到这个程度呢？两个人都不满意啊。啥事还能让两个历尽世事沉浮的老人不得放手呢？毛泽东费尽心血搞建设，结果国家出了大饥荒。彭德怀戎马一生，身经百战而不死，最后落得一身臭名。能放下么？换成谁能放下？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

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毛泽东开出的条件已经相当诱人。能让毛泽东说出“真理或许在你那一边”已经很不容易，而且还许下继续带兵的承诺。

彭德怀还是不愿买账：“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敢这么跟毛泽东说话的人估计也只有彭德怀了。

毛泽东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彭德怀，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

然后又扯到历史问题。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这样一番说辞，相当于从感情上安慰彭德怀。为了说服彭德怀，毛泽东使出了杀手锏。

带兵啊、真理啊、都是馅饼，心理按摩，属于晓之以情，大局——才是毛泽东的杀手锏。他知道，一提到大局，彭德怀肯定忍不住。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一下局势，说苏联可能怎么怎么样，美国可能怎么样，越战可能怎么样，和印度的摩擦可能怎么样。总之一句话，中国现在很危险，需要你老彭。

毛泽东是把彭德怀摸透了，一提到国家，彭德怀肯定会服从安排。所谓抗美援朝，所谓庐山上书，还不是为了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的国家么？这叫晓之以理。

在双管齐下这招之下，彭德怀再也挺不住了，那沉寂的热血再一次沸腾。他掐灭手中的烟头，抬起那刚毅的头颅说：“主席，我听你的。”多么熟悉的一幕啊，当年井冈山如是，长征如是，保卫延安也如是。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问道：“想通了？”

彭德怀说：“想通了，我去大西南！”

世人都知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重要性，能运用者却很少。能运用到毛泽东这种出神入化的境地的，古往今来也不多。

这是一篇典型的“说”，整理一下，不比史上那些神乎其神的“说”差，完全可以取名为《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去三线》。

在此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回顾了两人的历史和现状，和庐山上那种杀气腾腾的回顾不同，这次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那种。中间又穿插了现实局势很严重，咱们处于美、苏、蒋的包围之中，组织需要你老彭等等一通大道理。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结果也很满意，毛泽东成功说服彭德怀去西南搞建设，一直苦闷的彭德怀也实现了再就业。

一切解决看似美好的，其实暗流涌动。

随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相继来到颐年堂，同搬出中南海多年的彭德怀握手问候。虽然在政治局经常拼杀得你死我活，但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几十年了，知根知底，时隔数年再次重逢，朋友还是要讲的。

毛泽东对众人说：“刚才我与德怀谈了很长时间，交换了思想，说得很投机，他也愿意改变原来的想法，去西南工作。现在请你们几位来，就想召集西南的同志们开个会，由少奇、小平同志把情况讲一下，讲清楚，让德怀去后好工作。如果有人还有意见，这没有关系，那就叫他来找我。”

彭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刘少奇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你看主席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有的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他们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走到彭德怀面前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然后又是一番热情客套闲聊，当然中午咯，午饭还是要吃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德怀马上就要出征了，我今天请大家来，为德怀送行。”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酒杯里斟满了酒，两人相对而饮。毛泽东很少喝酒，再一次为彭德怀端起酒杯。上一次两人如此对饮，还是朝鲜战争之前，毛、彭再次携手，顶着巨大压力出兵朝鲜。十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变了。

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这场特殊的会见才告结束。

彭德怀与毛泽东肩并肩走出丰泽园。

彭德怀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握手别过。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什么领袖宽宏大量，彭大将军是好样的等等，然而事实却异常惨烈。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彭德怀去了西南之后，并没得到施展拳脚的机会，而且在行动上常常受限制。彭德怀刚走，姚文元就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影射彭。接着西南三线建委干部开始在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曰“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悔改”。然后彭被红卫兵押回北京，批斗了好几年。

此时和彭德怀握手话别的那几个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正是摔向低谷的前夜。几个月之后，彭真成为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负责处理彭真案子的正是刘少奇。案子还没有处理完，刘少奇、邓小平轰然倒下。负责刘少奇专案组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此时因为事忙，没来得及送彭德怀。

为啥？如果要批彭德怀，直接拉出去批斗就是了，何必搞得如此复杂？何必安排工作？而且高调地安排工作，还让刘、邓全程陪同。难道说三公费用太多了需要消费一部分么？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当年毛泽东派彭德怀去三线，实际上是一种流放。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劣，战争一触即发，担心彭德怀留在北京搞风浪。

对于此话，应该理解为三七开，三分靠谱，七分不靠谱。彭德怀是什么人，毛泽东还不知道么？什么里通外国、反党夺权，都是大帽子、政治手段而已。如果彭德怀真的里通外国，毛泽东早把他给处理了。既然没有里通外国、反党夺权，那么战争越近越需要彭德怀，就应该留下来，因为一旦有战事，还要彭德怀出马。三线是战略大后方，如果需要人搞后勤工作，派贺龙去更为合适。因为在解放战争中，贺龙在后勤这一块干得相当出色。

比较靠谱的解释是，这是一场戏，一场演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看的一场戏。

所谓文革，说白了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个群体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个群体的摊牌。刘少奇的优势在行政系统，毛泽东的优势在军方。毛泽东想要通过打倒刘少奇来重新整合行政系统；刘少奇则希望渗透军方而赢得胜利。此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正在和军方的贺龙、罗瑞卿搞关系，但刘少奇并无多少胜算。因为说到底，贺龙和罗瑞卿还是忠于毛泽东的。刘少奇想到彭德怀，彭德怀虽然被打倒多年，但影响力还在。

——也就是说刘少奇在策划彭德怀复出。

当时的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控制行政系统，通过正常程序恢复彭德怀工作完全有可能。如果之前这么干还没有必要，现在已经很有必要了。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分析一下还是可以的。

话说刘少奇和彭德怀是老对头了。想当年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刘少奇在党内，彭德怀在军内，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彭德怀赶走了粟裕，把刘少奇在军内仅有的一点根系拔掉。同样在党内，彭德怀的地位从未高过。两人互看对方不顺眼很久了。彭德怀在庐山落马，刘少奇确实高兴一阵子，几年之后还表态彭德怀不能平反。

按照政治斗争的原则，只要刘少奇还身居高位，就不可能让彭德怀再起。然而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摊开。毛泽东已经布置倒刘，刘少奇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在行政系统内有优势，但军方终究是空白。如果彭德怀从自己手中复起，将对毛泽东是一个牵制。毕竟在庐山上，真正拿下彭德怀的还是毛泽东，彭德怀从来就是敢于顶撞毛泽东的人之一。

如果彭德怀真的复出，对毛泽东确实是一个牵制。因为彭德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事基本都是对事不对人。像那种表态站队紧跟某人的事，彭德怀干不来。彭德怀对大跃进不感冒，对文革也很难感冒。这种人从来都是百姓心中的楷模、领导眼中的钉子户。如果刘少奇顺利成为一把手，估计也不会策划彭德怀复起。

即使彭德怀在刘少奇手中复起，也不会追随刘少奇。刘少奇也不指望彭德怀为了自己和毛泽东拼命。但是彭德怀的威望绝不比林彪差，彭德怀回到军内，林彪就没办法紧紧控制全军。彭德怀不会像林彪一样毫无保留地紧跟毛泽东，这就够了。没有军方铁板一块的支持，毛泽东不太可能毫无顾忌地发动文革，这样就增加了刘少奇的胜算。

那么会不会毛泽东真心启用彭德怀呢？就算毛泽东想要启用彭德怀，一定不是在一九六五年。当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时，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把彭德怀放出来碍事，但是更不能让彭德怀从刘少奇手上复起，那样的话就更碍事了。所以才让彭德怀复出去三线上班，以给工作的名义把彭德怀支走，实际原因只有一个——断了刘少奇的念想。

就在毛泽东给彭德怀工作的时候，另一方面正默许林彪倒掉罗瑞卿。此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只是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系密切一点而已。实际上，罗瑞卿虽然和刘少奇关系不错，和彭真走得很近，但依然忠于毛泽东。可见毛泽东要保证文革顺利发动，必须把军方牢牢抓住，一点潜在危险都不能容忍。

给彭德怀送行的刘少奇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因为又一个妙招失败了。也许算不上妙招，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彭德怀被毛泽东支走，意味着刘少奇渗透军方系统的希望破灭。只可惜了彭德怀，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只是一心想干点实事而已，却沦为政治家的玩物。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为啥去四川？比如说朱德，后来就被疏散去广东。要支走彭德怀，四川

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具优势。三线建设固然重要，和彭德怀没啥关系。彭德怀的特点是统军和种田。三线建设，还是留给专家吧。彭德怀之所以去三线，主要是因为一个人，李井泉。

当时李井泉是整个西南的老大，也是三线老大。除此之外，李井泉还是大饥荒中的明星。这颗明星在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积极批判。在毛泽东眼中，彭德怀是李井泉的敌人。在李井泉的一亩三分地中，彭德怀应该不会惹出太大麻烦。与此同时，李井泉还是邓小平的老乡兼曾经的部下。七千人大会上，是老乡邓小平保李井泉过关。在刘少奇、邓小平看来，这位在大饥荒时代的老乡会好好照顾彭德怀，至少能保证不再出事，那么看看接下来的局势怎么走。

彭德怀在三线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没麻烦，很平静。有吃、有住、有床睡觉，却没啥活干。他可以活动活动，但不能随便活动。李井泉基本上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彭德怀。因为李井泉固然牛叉，但是面对毛泽东和刘少奇，他都得罪不起。即使是虎落平阳的彭德怀，说不定哪天又复起了呢？所以李井泉也不敢过分。

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能挺过文革初期那段时间，说不定还会策划彭德怀复出。在朱德逐渐淡去的情况下，只有彭德怀能抗衡林彪。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能够很快修成正果，彭德怀的结局也不至于如此凄凉。可惜的是局势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挺住，文革成了一个遥无尽期的死胡同。

因为这条死胡同，毛泽东和彭德怀再也没有见面。这一次分别的时间是九年，直到一九七四年，七十六岁的彭德怀备受折磨而死。三十年的交情终于走到尽头。两年之后，毛泽东病故。两人共同打天下，打完天下之后却因为理念不同而分手。最终的最终，毛泽东的梦想没有实现，彭德怀的梦想也没实现。因为他们都希望国家富强，都没有看见。

联系这一切就可以发现，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午那顿午餐背后隐藏多少暗流。

培养粟裕，策划徐向前复出，谋划彭德怀复起，以及与贺龙、罗瑞卿搞关系，都是刘少奇试图渗透军队的措施，无一例外都失败告终，一切过后，剩下的就是一代政治家刘少奇从精神和肉体的毁灭。

接下来说说罗瑞卿和贺龙。这两个人的故事应该放在文革里面的，昨晚想了一下，认为他们两人也属于刘少奇渗透军方的手段，还是顺着一下子说了吧，免得后面显得散乱。反正接下来就是文革，也不算跑题太远。

（四）罗瑞卿的选择

（1）罗长子的奋斗史

罗瑞卿，四川人，生于一九零六年，卒于一九七八年。

军衔：大将。

绰号：罗长子。按身高算，开国将帅中估计没人比得上罗瑞卿。罗瑞卿身高多高呢？保守估计有一米八。这个个头在现在稀松平常，当时可就不得了。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同志矮，很少人知道邓小平的身高矮在当时并不十分明显。要知道林彪、粟裕等人的身高也就一米六几，周恩来略高一点。毛泽东一米七几的个头已经高大威猛了。毛泽东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估计罗瑞卿应该在一米八以上。传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大家以为罗瑞卿完蛋了，去做棺材，结果发现按照当时棺材的尺寸，罗瑞卿的腿太长，放不下。

生平：罗瑞卿生于农村，母亲温柔善良，父亲游手好闲。和同时期的其他将帅相比，罗瑞卿的生活还算可以的，一直有饭吃，一直有书念。这些要得益于外公鲜锦堂。鲜家的家境还可以，资助罗瑞卿念书，从私塾念起，一直往上念。女婿不争气就算了，鲜锦堂打算好好培养外孙成才。没想到罗瑞卿同学学习之余，接触了危险人物，从事了危险事业。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无论贫富，基本上只有两条路，要么老实巴交地生活，被人欺负、被人敲诈；要么就是狠一点，想要好好生活基本上不现实。鲜锦堂不管，就是要罗瑞卿同学好好念书，光耀门楣。罗瑞卿同学的心却全不在念书上。五四运动开始，罗瑞卿同学就跑去搞演讲了，那时也就十四五岁而已，放到现在他还在钟情奥特曼的阶段呢。

此后，罗瑞卿同学不仅学习不安分，还常常跑到工人兄弟中制造不安定，成了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到最后还跟共产党员纠缠在一起。当时还是文斗时代，共产党还是合法党组织，但是共产党那些激进纲领和鲜锦堂的人生观是天然排斥的。直到有一天，罗瑞卿同学从同情工人、声援工人过渡到加入工人反对资本家斗争的行列，鲜锦堂老先生终于意识到，这个外孙比女婿更不靠谱、更危险，遂果断把罗瑞卿骂个狗血淋头，之后除了狗血还是狗血，反正钱是没有了。

没了经济来源的罗瑞卿同学几经周折，终于在共产党的推荐下进入武汉黄埔学军事，开始了传奇的一生。这传奇一生的精华就是三游鬼门关。这三次游览，诠释了三个时代。来看看罗将军版的“三枪拍案惊奇”。

一九二八年，罗瑞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一年之前，也就是二七年，中共开始从文斗过渡到武斗，通过三次武装暴动拉开大旗，但三次暴动均失败了。此时年轻的罗瑞卿是武汉黄埔一员，属

于跟着蒋介石也可能很有前途的那种。也许是武汉黄浦太偏远了，也许是前几期黄浦出现的人才太多了，罗瑞卿没有得到这个机会。罗瑞卿同学也可能根本不要那样的机会，一听到南昌起义，满腹雄心的罗瑞卿决定离开武汉去南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冲动的决定，离开黄埔相当于和国民党切割。此时的罗瑞卿还不是共产党员，跟共产党上层也没有关系，不见得被信任，搞不好被当成特务给处理了。

冲动，注定要付出代价的。

罗瑞卿刚到九江，就面临张发奎同志的棒子，回到武汉，迎接他的是屠刀。怎么办呢？罗瑞卿的人生再一次迷茫。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高大威猛的罗瑞卿突然得了伤寒，住进一家教会医院，一个月之后钱用完了。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即使是教会医院也一样。没有钱，要你命。当然医院的指导思想是救死扶伤加人道主义，不会直接要你命，只是不给你看病，让病要你命。没有钱的罗瑞卿先生被医院雇的黄包车悄悄地（注意这个词）推到一个灰暗的小房子里。奄奄一息的罗瑞卿清醒过来，竟然不知道身在何方，以为到了鬼门关。此时的罗瑞卿应该更怨恨那荒诞、凄凉、唯利是图的现实世界了。

然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命，一位熊师傅发现了他，每天吃饭时给他送去一点粥。这位熊师傅可不是专家医生，开不出价格昂贵的灵丹妙药，能施舍的仅仅是一点粥水。正是这一点粥水，让罗瑞卿正在消失的生命有了转机，最后竟然奇迹般康复。如果在古代，这位熊师傅可能被描述成奇人异事，他端来的粥可能是独家秘方哦。

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去了井冈山，成为罗瑞卿将军。俗语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对罗瑞卿好像不太合适。当年的井冈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休闲娱乐不说了，能填饱肚子就感谢马克思了。而且蒋介石先生对井冈山非常关心，时不时去慰问一下。只是慰问品不是鸡鸭鱼肉，比较特殊一点，是飞机大炮。搬运这些慰问品的不是红十字会，而是军队。正是在井冈山，罗瑞卿将军经历第二次死里逃生。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继续他的剿共大业，发动第二次围剿战争。罗瑞卿和十一师师长曾士峨（此君湖南人，曾在长沙黄埔学习，将才，参与秋收起义，属于毛泽东嫡系，二十七岁那年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奉命迅速抢占观音崖。

在敌人猛烈的攻击中，罗瑞卿不顾安危观察敌情。一排子弹呼啸而来，罗瑞卿倒下，鲜血咕噜噜地往外流，头发里流满血浆，衣服被鲜血染红，原来是子弹击中了颈部动脉。

好个罗将军，竟然咬牙大喊：“冲上去，占领山头！”

战士们响起雷鸣般呼喊：“为罗政委报仇，冲啊！”

战斗很快结束。罗瑞卿昏迷不醒，又是肺炎，又是高烧。当昏迷之中的罗瑞卿苏醒，听见有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通知后勤部准备棺材吧。”罗瑞卿很纳闷，难道又有同志牺牲了？随后听见锯木头的声音，又有人说，“棺材要长一点，没见那人好高哩！”罗瑞卿这才意识到别人说的高个子就是自己。

然而棺材没用上，罗将军再一次大难不死。“我摸了摸阎王的鼻子又回来了。”罗瑞卿调侃。就连毛泽东都开玩笑说：“罗长子要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没成。”

这可不是写评书，而是真真实实的历史。共军将帅，多在死人堆里打滚，能活下来，都在鬼门关前转悠过。就连林彪、粟裕这种人，都曾数度受伤，留下终身后遗症。刘伯承元帅更是被子弹从太阳穴穿眼而过，损失了右眼，手术连割七十二刀，未用麻醉。下层将军就不用说了，常常有人被放进棺材又活了过来。

很多人都不明白，当年蒋介石围剿红军，在优势占尽的情况下剿而不灭，原因很简单：那些人的命太硬了。正是因为这些人命硬，才有新中国的浴火重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命硬，后来的政治运动才显得额外惨烈。

如果说罗将军前两次鬼门关观光是因为敌人的馈赠，那么第三次再去就让人痛心疾首了。因为这一次对罗瑞卿将军出手的是昔日的战友和领导。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复杂的关系吧。

（2）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

在高层将帅当中，罗瑞卿的入党时间相对较晚，既没有参加早期的工人运动，也没有参与三次起义。在讲究政治资历的中共，罗瑞卿这种“晚辈后生”能够跻身大将行列，并且日后大权在握，除了个人实力外，和高人相助是分不开的。高人就是林彪和毛泽东，主要是毛泽东。某种意义上讲，林彪也是毛泽东培养的。

第一次鬼门关游览回来之后，罗瑞卿进入苏区，于二九年结识了毛泽东。当时苏区物质匮乏，女人匮乏，人才更为匮乏。连王佐、袁文才那种绿林好汉，毛泽东都尽心培养。像罗瑞卿这种既学过文也学过武的知识青年进了苏区，而且没有任何派系背景，是绝佳的培养对象。

毛泽东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搞调查研究。罗瑞卿不负所望，进步神速，随后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随后第二纵队改为十一师，罗瑞卿任政委。此时十一师隶属红一军，军长正是林彪。后来林彪升任红一军团长，罗瑞卿则是保卫局长。正是这个保卫局的工作经验使他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建国之后成为公安部长。到达陕北之后，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林彪不怎么喜欢管琐事，具体的事都由罗瑞卿管。

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在这次反围剿中，红一军团长林彪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在黄陂、草台岗指挥了一次精妙的伏击战，心情大好，在身上那个神秘的小红本子上写道：“1933年2月，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敌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此后罗瑞卿成为红一军团保卫局长。罗局长多才多艺，不仅能指挥军事、能搞政治，还能搞文艺。大家天天打仗，生死一线之间，生活却极端贫乏，从物质到精神都缺。这打完胜仗，罗局长决定给大家找找乐子。

刚好此时宣传干部写了一个话剧《庐山之雪》，剧情是蒋介石训练了大批军官进攻苏区，但最后在红军英勇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失败。那时候既没有舞台也没有摄像机，更没有专业演员，情节和对话都要求演员自己编。演员中常常有一些牛人：这一次的导演是罗瑞卿，演员中有政委聂荣臻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这阵容，刚刚的。但是罗导还觉得阵容不够大牌，还需要一个角色，那就是红一军团老大——军团长林彪。然而林彪一般沉默寡言，不拘言笑。罗导和演员们商量好：耐心寻找机会。

一天，军团干部开会，讨论军事问题。打了胜仗，大家又对自己的观点比较认可，所以林彪心情很爽、很高兴。罗瑞卿乘机把话题转移到演戏上，故意神吹自己演起戏来如何神形兼备、多么牛叉，自己本质上是演员，现在当军人埋没了表演天赋，目的是引林彪上钩。

心情大好的林彪一听罗瑞卿会演戏，接腔：“别吹你那两下子了，真正的师傅还没开腔呢！我在中学那时候，也演过老太爷，拄一根文明棍，一步三摇，还是蛮有味道的。”人在开心时总是容易自恋，没办法。

罗瑞卿立即接上：“军团长，那你现在为啥不演了？”

林彪摆了摆手，说：“现在不方便了！”

罗瑞卿使出激将法：“恐怕还是不会吧？聂政委那次上台，有板有眼，一看就是行家，什么方便不方便。”

一提聂荣臻，林彪忍不住奚落说：“他那哪叫演戏，一口四川辣子味，吓得死人。”

聂荣臻立刻说：“咱们别学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真有本领咱俩上台亮亮。”

聂荣臻的话激起来林彪的好胜心，他说：“那咱俩就比一比。”

导演和演员联合激将成功，成功拉到另一大牌加入。关于角色问题又犯愁了，林彪自尊心很强，自视甚高，即使演戏也不能掉身价的。林彪问道：“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嘛？”，“同王金钰！”，“他算老几？”，林彪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这是打仗多了，演戏也不忘打仗，敬业啊！如果把人生当成一台戏看，林彪同志无疑是最为专

业的演员之一，肯定是实力派中的实力派。如果反过来，把演戏看成人生，林彪就相当业余了，只可作为群众演员跑跑龙套。

“何应钦怎么样？何应钦是军正部长”

“何应钦？”林彪沉吟了一下，还是嫌小，但没说话。

聂荣臻知道林彪的脾气，就说：“罗局长，你干脆改为蒋介石，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这时连连点头：“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阵要得！”，不过他马上又问道：“罗局长，打算叫谁来演蒋介石？”

最困难的是排练，因为林大将军不肯背台词，也不听从导演安排，总说：“背不下，到台上我顺口说下去就是了。”这演员，放现在肯定是戏霸。

这戏上演时，免费公映，还有不少观众来捧场，比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伯承等人。要知道当时是第四次反围剿结束，毛泽东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过着鬼都不上门的日子，这几位已经是大牌中的大牌了。眼见这么多名人捧场，不拘言笑的林彪表现出罕见的热情。

高潮部分，林彪出场。只见他大模大样地走上台，刚坐下，电话响了。

“喂，我是军团长，有什么事？”林彪煞有介事地拿起电话。

“现在山上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回来。”林彪答复得很干脆。

“山上怎么走船？”

台下一阵大哗，周恩来等人笑成一团。

林彪知道自己演错了，不记得台词，却依然镇定从容，拉罗荣桓出来做挡箭牌，说：“请罗主任回答。”林彪向来不管属于政治工作的事。这是政治部主任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忘了，罗荣桓正在害疟疾，事先说好不上台的。林彪这一嚷不要紧，台下又是一阵哄笑，几个小伙子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为了不扫大家兴致，罗荣桓陪着演了一阵。

然后是处理了俘虏的问题，蒋介石押到。这个蒋介石是由导演罗瑞卿扮演的。因为林军团长的固执任性，他这个导演也没法干了，只能上来配合林军团长的任性。

林彪问：“你是蒋介石吗？”

罗瑞卿：“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罗瑞卿：“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又忘了台词，随性来了句：“你怎么长得这么瘦？”纳闷了，咋不问你这么高？

罗瑞卿：“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补药可多啦，人参、燕窝、罐头、红烧肉……”罗瑞卿把他吃过的、想吃没吃到的、想到没见过的、将来可能吃到的好东西统统倒出来，然后再灵机一动，总结说，“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罗导演不仅变身为演员，甚至化身为编剧，而且是临时编剧，可以说非常成功。

林彪又没台词了，只得随口问：“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再次发挥机灵劲，补充说：“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家也不要了。”

如此这般，戏剧在众人哈哈大笑中收场。这样的戏剧，如此超豪华的阵容，如此高级别的观众，难得一见哦。从戏剧本身看，这戏还真不怎么样，但是娱乐了观众，特别是能看到林彪演戏，那绝对不容易呵。

这出并不高明却能逗人乐的戏剧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一，罗瑞卿和林彪可以合作得很好，但需要罗瑞卿配合林彪，后来为啥矛盾了，有政治原因；二，林彪这个人，敏感、自尊心强、聪明、不善言辞，正是这些特点导致三十八年之后，毛泽东逼林彪作检讨时，林彪决绝出走。

从年龄上看，罗瑞卿比林彪大一岁，但罗瑞卿一直都是林彪的下级。在林彪和罗瑞卿合作的岁月里，一直都是罗瑞卿配合林彪，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文革。林彪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罗瑞卿任参谋长；林彪当国防部长，罗瑞卿是副部长。

建国之后，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这个位置绝对是个火炉子。因为建国之初可不像现在这般和谐，地痞、流氓、黑社会啥的都是小角色，特工、散兵游勇、巨型土匪遍地都是，弄不好哪个名人就被干掉了。干掉了，都得找公安部长。而且这个位置涉及到领袖及其战友们安全。所以说罗瑞卿能坐上公安部长的位置，说明了一点：毛泽东绝对信任罗瑞卿。

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信任就是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本。

（3）罗瑞卿的第三次选择

罗瑞卿第三次死里逃生是自己的选择。他选择跳楼，给妻子写下遗书：“治平，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为啥这么干呢？

从保卫局长开始，罗瑞卿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毛泽东。无论前线还是后方，毛泽东去哪，罗瑞卿就去哪。公安部长时代，还是毛泽东到哪里，罗瑞卿就跟到哪里。罗瑞卿因此有了另一个绰号，影子——毛泽东的影子。得此称号之人，只有罗瑞卿一家，别无分店。在公安部长的十年生涯里，罗瑞卿干了很多事，干得很不错，但也不是百分百正确。没有人可以百分百正确。比方说轰动一时的“两陈案”，就是极左思潮下的冤案，周恩来亲自过问都没有解决，没有毛泽东的支持肯定是过不了关的。和其他部门不一样，公安部几乎要涉及所有的权贵，怎么可能把所有大人物都照顾好？遇到难题，肯定需要毛泽东撑腰嘛。

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信任，罗部长在公安部的火炉子上非但没有烫到屁股，还稳步上升。到了五九年四月，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和黄克诚挨批，林彪成为军内代言人，但不管事。贺龙和罗瑞卿掌控军内实际事务，而且两人关系良好。罗兼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还有国防部副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是林彪提名、毛泽东拍板的。此时的罗瑞卿横跨党政军，成了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然而在六年之后，也就是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罗瑞卿突然遭到批判，而且是突然批判。当然批判罗瑞卿的人很多，主要是军方，比方说徐向前、叶剑英等人都表态了。这些人军衔比罗瑞卿高，却没啥事干。中共十大元帅，每一个都有一番来历，要么代表一个方面军，要么建立某个革命根据地，或兼而有之。等到六五年，除了罗荣桓英年早逝之外，只有林彪和贺龙在掌军权，其他人转行的转行，清闲的清闲，战功并不显著的罗瑞卿却横跨党政军。大家办点事，还要看罗瑞卿的脸色。不爽可以理解，老师也就是表表态，说罗瑞卿这个人有点狂了、手太长了，向党要权，权力大了之后个人主义严重，需要批评教育等等。也不排除老师们通过表态来表达支持毛泽东的可能，毕竟军方的将帅永远都是跟随毛泽东的。

批判罗瑞卿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林彪，另一个是毛泽东。罗瑞卿一下子从人生巅峰跌入低谷。这六年时间里，罗瑞卿究竟怎么了？惹了这么多人，还让毛泽东和林彪亲自出马！为啥？估计连罗瑞卿自己都不明白，所以才会愤而跳楼。因为跳楼，又惹来更为残酷的批判。罗瑞卿的悲剧种子就此种下。

站在现在的立场看，罗瑞卿之所以挨批，是因为拥有的权力太多了——不是太大，而是太多。

当时的罗瑞卿拥有这些关系：毛泽东的信任，军内林彪、贺龙的支持。

还不止这些，罗瑞卿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关系越来越好，刘少奇曾经暗示过罗瑞卿，下一届人大可能更换国防部长，罗副部长变成罗部长。然而刘少奇虽然成功连任国家主席，却依然没能让罗副部长转正，因为刘少奇还不是党主席。除此之外，罗瑞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关系也很铁，在公安部长期间，常常和彭真拉关系。彭真是刘少奇在政治上的第一助手（邓小平的身份是合作者）。

在和谐的年代，这些关系可以让罗瑞卿稳如泰山。然而在毛泽东决心整党，特别是面对建国之后最大的竞争对手刘少奇之时，这些复杂而多余的关系决定了罗瑞卿的悲剧。

罗瑞卿的案子并不是孤案，之前已经发生过一次，上一次发生在粟裕身上。粟裕和罗瑞卿一直忠于毛泽东，即使毛泽东死后，粟裕依然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罗瑞卿出狱之后更是到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像三鞠躬。

在分析这个现象之前，回顾一下反教条中的粟裕。粟裕和罗瑞卿的处境有点相似，当时粟裕也是总参谋长，而且拥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个人的赏识。正是因为这些优势导致粟裕挨批，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策划刘少奇走向前台，必须断掉刘少奇在军内的根系，所以把粟裕拿下。此时罗瑞卿差不多，拥有毛泽东的信任，军内拥有贺龙的支持，政府内部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关注。此时毛泽东要通过文革倒掉刘少奇，又必然要斩断和刘少奇有千丝万缕的人。罗瑞卿既然横跨党政军，又是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自然首当其冲。

批判粟裕的理由之一是，和领导搞不好关系，批罗瑞卿也有这一条。

主批粟裕的是当时威望正隆的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批罗瑞卿的也是威望正隆的时任国防部长林彪。

林彪批罗瑞卿的理由同样有趣：不通气、对他搞封锁，搞突然袭击、疲劳战。说白了这些理由本来就不是理由。因为罗瑞卿之所以抓大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林彪不愿意干活，或者说身体不好不能干活。大事小事都跑去通气，那林彪还怎么做撒手掌柜？通气太多反而有了另一项罪名——搞突然袭击、疲劳战。怎么办？换谁都搞不定！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林彪都是要批判罗瑞卿的。林彪为啥要批判罗瑞卿，究竟是否真心批判罗瑞卿已经难以追究了，但是可以分析批判罗瑞卿的动机。

林彪要批判罗瑞卿，是因为毛泽东要批判罗瑞卿。毛泽东之所以要批判罗瑞卿，是因为要以罗瑞卿为切入点发动文革。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既然罗瑞卿是忠于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为啥还要批判？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当时不晓得罗瑞卿的立场，为了以防万一。这是一种解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和长期以来的观点一样，毛泽东知道罗瑞卿的忠诚。毛泽东拿下罗瑞卿，只因为政治需要。就像高岗事件，毛泽东知道高岗忠于自己，同样把高岗推入深渊。在反教条中，毛泽东没有理由怀疑粟裕的忠诚，同样默许对粟裕的批判。

罗瑞卿和行政系统搅合太多了。十年公安部长，基本上都在和政府大员打交道。公共安全么，哪个不涉及到？罗瑞卿和行政系统的关系，也是拜毛泽东所赐。毛泽东因为信任罗瑞卿给了他很多权力。随着权力的增多，罗瑞卿需要接触的各方势力就多。不错，罗瑞卿和刘少奇关系不错，和彭真关系也很铁，但是罗瑞卿和刘少奇、彭真建立关系的那些年头，刘少奇还是毛泽东的助手。作为毛泽东的心腹，有必要和刘少奇搞好关系，配合好了才能有助于帮助毛泽东嘛。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紧密合作的年代，如果罗瑞卿和刘少奇等人搞不好关系，说不定就完蛋了。高岗就是因为一心倒掉刘少奇才被毛泽东舍弃的。甚至可以说，罗瑞卿和刘少奇等人的关系仅仅是工作关系而已。

林彪恰好相反。建国之初，林彪一直在修养，游离于政治圈之外，好像是一柄冷藏的利剑。直到反教条那会才开始活跃，彭德怀倒下之后才开始复出。复出之后的林彪躲在毛泽东身后，从来不提自己的主张，挂着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的头衔，不管具体事，态度上紧跟毛泽东。这样就避免了和行政系统内部的任何牵连。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势单力孤之时，林彪毫不吝啬地支持毛泽东，雪中送炭啊。林彪那篇著名的讲话，是林彪临时自己搞的，罗瑞卿最开始起草的那篇稿子没用。为此毛泽东找过罗瑞卿谈心，让他向林彪看齐。

理顺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接近问题的核心了：罗瑞卿当时是什么态度，他为啥跳楼？现在的主流观点是，罗将军因为不堪羞辱纵身跳楼。不堪羞辱是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当时政治批斗已经是家常便饭，并不是单独给罗瑞卿一个人开小灶。他受到的那些羞辱，休说和彭德怀比，连朱德也比不上。血雨腥风几十年、在政坛最高层晃悠了十几年、鬼门关前转悠好几圈的罗瑞卿连这点打击都扛不住？心理太脆弱了吧。如果就这点心理素质，罗瑞卿的一生也就没啥好说的了。不是罗瑞卿心理素质太糟糕，实在是受到的打击太大。而打击并非来自批斗会，而是另有深层原因。

世人说起罗瑞卿的遭遇，都是从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身上挖掘。有人说毛泽东要倒罗瑞卿，有人说林彪要倒罗瑞卿。吵吵嚷嚷，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问题的重心还在罗瑞卿本人身上。

虽然罗瑞卿的军衔是大将，实际特长是搞政治。纯粹的军人是干不了他的那些活的。以罗瑞卿所处的位置，他对当时的环境很了解。也就是说，罗瑞卿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纷争看得很明白。而罗瑞卿自始至终都是忠于毛泽东的。既然如此，罗瑞卿为何还在跟刘少奇搞暧昧，不立刻站到毛泽东身后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难道他不知道政治运动中站队的重要性？不是。那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担心。

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摊开的环境下，当时整个行政系统倾向刘少奇。而罗瑞卿又不知道毛泽东如何反击，更不知道毛泽东打算通过文革一次性解决问题。因此站在他的立场上看，刘少奇处于

优势的一方。即使罗瑞卿倒向毛泽东，刘少奇还是优势的一方。此时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可能失败。

换成玩政治一般的，只要考虑赢家就行了。罗瑞卿不同，他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如一。不管毛泽东活着或者死了、成功或者失败，罗瑞卿始终追随毛泽东，因此他需要给毛泽东做打算。如果毛泽东失败，罗瑞卿有两个选择：一，站在毛泽东身后，陪毛泽东一起失败；二，自己和刘少奇保持关系，依然身居高位，可以充当毛泽东的保护伞，保证失败之后的毛泽东不会太凄凉。罗瑞卿做了第二个选择，可以说罗将军通盘都在为毛泽东考虑。

正因为如此，第一夫人江青召开文艺座谈会邀请罗瑞卿时，罗瑞卿才会“不识抬举”，对她置之不理，和此时彭真对江青的态度一致。江青要一套军服，罗瑞卿只给她一套军装，不给领章和帽徽，理由是第一夫人没有军籍。其实这正是罗瑞卿向毛泽东靠拢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的好机会，甚至可以学林彪和江青合作。以罗瑞卿的地位，至少可以比后来的谢富治赢得更多的“荣耀”。后来评价都是说，罗瑞卿节操高尚，和江青进行坚决斗争。当时的江青还是一个小角色，用不着去斗争吧？以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连毛泽东发动文革都不反对，难道要处处和毛泽东的夫人过不去？他只是做做样子，替毛泽东谋身后事而已。

罗瑞卿疏远林彪也可以用这个理由解释：全天下都知道林彪是毛泽东的人，国防部长啥的都是虚的。要替毛泽东谋划，必须和林彪保持一定距离，所谓“不通气”的理由正在此。所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的原因也在此。所以说罗瑞卿确实在两边下棋。但他下棋的目的还是为了“保卫毛泽东”。

很多人都说罗瑞卿对毛泽东是“愚忠”，这是一个低俗且有市场的说法。忠，没必要和“愚”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人身上，可以把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李逵之于宋江。但是“忠”和“愚忠”之间不存在等号关系。罗瑞卿忠于毛泽东，这是愚忠么？罗瑞卿文韬武略，枪林弹雨，啥事没经历过？而且从罗瑞卿替毛泽东的谋划来看，和“愚忠”相距十万八千里。

结论：罗瑞卿忠心，但不愚。

然而——罗瑞卿有两点没有想到：一，毛泽东并不是常人，他的境界和魄力远超过罗瑞卿，无须罗瑞卿替他谋划归属，他不需要；二，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的反击竟然是从拿下自己开始的！站在罗瑞卿的立场上看，这表示毛泽东不仅怀疑他罗瑞卿，而且不了解他罗瑞卿。

这个变故超出了罗瑞卿心理承受的极限。好吧，既然你不信任我，那我证明给你看；既然你不理解我，那就永别了。

罗瑞卿给妻子写下遗书之后纵身一跃！他不是承受不了政治风波，不是受不了所谓的批判，一辈子大风大浪啥没见过？只是承受不了毛泽东的怀疑和不解。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跳楼

之前，遗书中嘱咐妻子“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罗瑞卿出狱后路过天安门，努力以最标准的姿态，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此时的罗瑞卿已经身体残缺，已经白发苍苍，已经老泪纵横。毛泽东逝世，罗将军在自己家里，为毛泽东设立了灵堂，臂上带上了黑纱。孩子不解，罗瑞卿训斥之。

然而毛泽东真的是怀疑或不了解罗瑞卿么？也不尽然。听到罗瑞卿跳楼的消息，毛泽东铁青着脸说了两句：没出息！不是不解，不是怀疑，是怒其不争！

毛泽东批罗瑞卿大概有两层用意。鉴于罗瑞卿和刘少奇的关系不错，要通过批判的方式把他晾在一边，如同粟裕。粟裕虽然挨批了，却躲过了之后的历次运动。正常情况下，罗瑞卿也应该是这个待遇。批判罗瑞卿的另一个目的是震慑军内其他人：看看吧，罗瑞卿是我一手提拔培养的，因为跟刘少奇搞关系，挨批了。

应该说毛泽东和罗瑞卿之间是个误会。这种误会发生在一般人中间，也就是一段期间不说话，或者骂两句。然而在特殊时期，特殊人身上，就显得尤其刺眼。特别是联系到罗瑞卿的遭遇，简直让人难以承受。

但是罗瑞卿的跳楼举动完全打乱了毛泽东的步骤，那是以死抗争啊，所以毛泽东才会铁青着脸说他没出息。

所谓将军一跳声名裂，罗瑞卿这个举动的后果极其严重。在那个年代，特别是高岗之后，所谓自杀，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形同背叛。而且选择在文革风暴即将到来之时，不仅是做出头鸟，而且是出头之后逆风飞翔。

批斗会是很残酷的。罗瑞卿跳楼之后，命是保住了，腿摔坏了。自由没有了，罗瑞卿进了监狱，待遇是一间小牢房，上有一个透不进阳光的小窗子；房内一张硬板床，一个供写材料的小方桌，断肢的疼痛伴随着他。而且批斗会照常开，罗瑞卿腿有伤，红卫兵就把他高大的身躯放在大箩筐里抬出来，鲜血外渗。因为腿伤，一个月内做了两次手术。做第二次跟骨病清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比上战场还急。

六七年九月十四号，罗瑞卿整日高烧不退，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看守嫌他走得慢，推了一把，把他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腿股骨骨折。骨折后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十一月份，新旧伤复发，威胁到生命。罗瑞卿再次住院做骨折牵引复位手术。

医院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罗瑞卿的病房成了审讯室，专案员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别想舒服。”然后又是一系列虐待，稍有怠慢或回答不中对方的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痉挛、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这段“治疗”是毫无人

性的，比起三十年前冷漠的教会医院把危在旦夕的罗瑞卿偷偷送走还要残忍。当时的罗瑞卿还是一文不名的革命者，此时的罗瑞卿已是共和国大将、国务院副总理。这不仅是对罗瑞卿的侮辱，还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

一系列批斗、审查之后，通过无数车轮战、疲劳战、精神战之后，罗瑞卿成了“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成了“军内第二大走资派人物。”——第一号是彭德怀。把罗瑞卿和彭德怀一起批斗，可笑的是罗瑞卿和彭德怀的个人恩怨尚未了结。

批斗会的幕后是谁？是林彪。其他人没有这么大能量，毛泽东不会干这种事，林彪也不会亲自干，操作这种事的极有可能是叶群。批斗会上时时有叶群的身影，四大金刚参与其中。即使是叶群搞的鬼，责任也该由林彪来担。因为没有林彪，叶群屁都不是。然后罗瑞卿被迫出演，然后是伤口继续恶化，需要再一次手术。

六八年七月十三号，罗瑞卿再次被送进医院。直到十二天之后，也就是八月二十五号，医院才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报告，高效啊！更为高效的是，又过九天，也就是八月四号，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还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又过三天，也就是八月七号，专案组重写报告：“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秋凉之后是啥时候呢，是四个半月之后，也就是六九年一月二十五号。手术方案没有怎么讨论，手术医生和护士是临时换上的“临时工”。在医生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直接截掉罗瑞卿小腿最下面的三分之一。这还没完，五周之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手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以下摘除。本来股骨有可能治好，这样便可以安装假肢，截掉之后罗瑞卿在中国的国内技术条件下便站不起来了。九年之后，罗瑞卿去德国安装假肢，因血管硬化而亡，终年七十二岁。

罗瑞卿跳楼的时间是六六年三月十八号，到六九年，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时时刻刻忍受着断骨折磨，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又需要怎样的毅力方能挺过来啊！

叹：罗瑞卿，命硬！也只有如此命硬之人才熬过那个残酷的年代。

（4）林彪为何对付罗瑞卿

林彪为何如此残忍地批判罗瑞卿？说林彪和罗瑞卿有多大的私人恩怨也是瞎扯，而且同为毛泽东的嫡系，两人同根同源，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罗瑞卿威胁到林彪地位了？看似有，实则无。

论威望、论地位、论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罗瑞卿皆不如林彪，而且作为上下级的关系，罗瑞卿还能干活，帮林彪当甩手掌柜。然而罗瑞卿出于对毛泽东的担忧（没有和刘少奇划清界限，而且继续保持暧昧关系）把自己逼上悬崖边，又因为对毛泽东的误会而走上绝路（跳楼）。这个时候作为毛泽东在军方的代理人，必须强力出击把罗瑞卿打成典型，以敌我矛盾处理（对敌人用不着手软），以此断绝军方和刘少奇的关联。如果不这么做，军方就不可能完全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这一边。

没有军方的铁板一块，文革可能一开始就失败。如果文革起初就失败，最大的失败者是毛泽东，毛泽东之后被冲击的就是林彪。毛泽东可能还能捞到一个党的名誉主席，作为一个过气的太上皇被晾在一边，吃好喝好待遇不变。那么林彪呢？也将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一个过气的将军。失败之后的彭德怀可以种地、自食其力，而林彪呢，林彪能干嘛？他需要呆在恒温的房子里，不能见光、不能听到水声、不能吵闹。高干待遇没有了，他该怎么办？只能作为跳到岸上的鱼——等死。林彪是个愿意等死的人么？当然不是。

所以说，罗瑞卿的行为并非威胁到林彪的地位，却威胁到林彪的生存。当一个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管是林彪还是其他人。只不过林彪的地位特殊，使用的手段又是政治斗争而已。

打倒罗瑞卿的正是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摧残了罗瑞卿的精神，而林彪摧残了罗瑞卿的身体。

两人倒罗，并非对罗的个人仇恨，只是运动需要。罗瑞卿固然位高权重，还够不上两人联手对付。在这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文化大革命中，两人必须小心谨慎。罗瑞卿只是作为不安定因子给清除掉而已。个中关系理清之后，还能说什么呢？唯有感叹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而已。

要发动文革，罗瑞卿并不是唯一一个需要清洗的军方要人，还有一个比罗瑞卿更为重要的人物需要清洗，他就是贺龙。

（5）贺龙和罗瑞卿

贺龙和罗瑞卿早期交集不多，因为两人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当贺龙纵横天下之际，罗瑞卿还在想着如何向外公讨生活费呢。

当贺龙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时候，罗瑞卿还在为去不了南昌而烦恼。

红军时代，罗瑞卿只是红一军团中的一个小角色，而贺龙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性人物，不在一起工作，也不是一个级别的。两人相识比较晚，首次见面是在延安。此后两人交集也不多，罗瑞卿主要在抗大搞教育，而贺龙则是一二零师的师长，领兵在外。

解放战争有过一点交流，但相识不深。建国后第一个十年，罗瑞卿风风光光，在公安部呼风唤雨；贺龙的日子也是过得有滋有味，把体育部搞得有声有色。

两人真正的工作交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特别是六二年毛泽东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需要紧密配合，就配合出感情来了。贺龙为人豪爽仗义，见多识广，能说会道。空闲时间，两个人在一起拉家常、吹吹牛啥的也很正常。纵观当时的局势，虽然运动重生，政坛暗流涌动。作为国家支柱，军方实权俱在两人之手，也有一种俯视天下、豪情陡升的感觉吧？然而局势变化之快远远超出两人的预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是姚文元飞黄腾达的日子。这天有篇叫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署名姚文元，文革大幕就此拉开，刀光剑影悉数登场。大幕拉开之后，罗瑞卿成为第一批中枪者之一。

批判罗瑞卿之前，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组织批判萧向荣。萧向荣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听起来很拉风，在中央高层还是太小了，小到不够看，最多只能充当钓鱼的鱼饵，钓大鱼的鱼饵。十一月十一号，会议主持人到贺龙的办公室报告：“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斗萧向荣，而他的后台是罗总长。”

贺龙问：“有什么根据吗？”

主持人回答：“有。曾有国防部长来访，接待单位为他安排了一些打仗的影片，而这位外宾不喜欢看打仗的片子。罗总长知道后就说：‘不爱看战争片子，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总长说这种话，就是暗指林总，是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罢，对这种牵强附会的回答很不满意。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主持人回答。

贺龙一听来火了：这不是莫须有么？总参谋长反对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这种大帽子怎么能随便乱扣？于是，他严肃地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罗总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等等。”

经过这番批评教育之后，主持人走了，还一副很受用的样子。然后两天之后又跑去找贺龙了。贺龙还没来得及发挥急性子，主持人却先发飙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起来！

这一哭，贺龙更急了，很不爽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讲嘛！”确实，一个大老爷在军委抹鼻子不成体统。军委是啥地方？硬汉的地盘。

主持人抹了抹眼泪说：“贺总，就是前两天向您报告的那件事，马上就要出会议简报了，在简报中还是要写明萧的后台是罗总长，你看怎么办？”也不能怪主持人，毕竟压力太大了，任何一个都惹不起啊！

贺龙一听很生气，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吗？！”他有生气的理由：老子主持军委工作，说话没人听？放肆！

主持人则说：“贺总，你上次的指示，我回去向大家传达了，但不解决问题。”随后，他进一步问道：“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有问题？”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看，此时的贺龙应该好好想一想了：既然大家要批斗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而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发话都没用，表示问题很严重，是不是该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贺龙选择逆流而上：“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主持人又问：“你的话能不能传达？”

“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贺龙回答很干脆。这样，贺龙成了罗瑞卿的后台。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罗瑞卿的后台是贺龙。

贺龙说的是对的，罗瑞卿绝不可能反党反革命。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罗瑞卿却成了文革的绊脚石。既然罗瑞卿成了文革绊脚石，贺龙也将是绊脚石。罗瑞卿被搬开之后，就轮到贺龙了。对当时的局势，贺龙不了解么？贺龙很清楚，清楚地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有问题。那么为何还要逆流而上？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其人。

（五）贺龙传奇

（1）英雄出少年

在开国将帅中，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要么励志、要么有趣、要么感人，均十分独特。以传奇性而论，首推贺龙。

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二号，贺龙出生于湖南植桑县洪家关一个农村家庭。

贺龙，字云卿。贺龙的偶像是岳飞。岳飞，字鹏举，所以贺龙给儿子取名贺鹏飞。

贺龙的籍贯是汉族，按照血缘划分，四分之三属于土家族，贺龙的奶奶和妈妈都是土家族人。现在土家族人把贺龙当自己人。土家族人，勇猛彪悍。贺龙的性格：猛、豪、爽。

贺家男人的勇猛是有来头的。贺龙的曾祖父叫贺廷璧。咸丰四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横征暴敛以供军用。百姓缴不起税赋的，不是被抓就是被砍头。当太平军由粤入湘时，贺廷璧在洪家关一带聚集数千农民，揭竿而起，响应太平军，攻入县城。后与清军对抗两年，最终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贺廷璧被捕，判处秋斩。

刑场上的贺廷璧昂首挺胸，双腿发力踩入泥土，绝不下跪，纵声高呼：“老子死便死，头不能落地！”大义凛然，博得群众山呼海啸狂赞。按古语，人头落地为英雄悲剧。头不落地表示宁死不屈，坚信后继有人。监斩官妥协了，不再要求贺廷璧下跪。此时贺廷璧的妻子刘氏冲入法场，跪倒在丈夫面前，庄严地撑开衣襟。贺廷璧看着她，感激地点点头，高声大笑，把头倾向妻子伸出。屠刀挥过，一腔热血化为一道美丽的彩虹。在这刀光血雨之中，刘氏竟然没有尖叫一声晕倒在地，而是勇毅地撑开衣襟起身兜住丈夫滚落而下的头颅！奇女子啊，换成一般小女子，早已躲在一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寻找安慰了。

先人的强悍沉淀下来，沉睡在血液中。

据当地传说，贺龙是条水龙。还在娘胎里时，洪家关那一带的雨水多得吓人，临产前三天雷雨之声不绝于耳；河水暴涨，汹涌澎湃。当然湘西雨水多，算不了啥。可是洪家关的人说，一团镶了金边的乌云就在祖母生产的屋机上徘徊不散，闪电一道接一道地滑落，喀嚓喀嚓的雷声惊心动魄。放在古代，这可是皇帝降生才有的待遇啊！

贺龙从小胆大，不畏雷，乡邻认为这是有龙胆。贺龙七岁那年，他爸搞了一个工程——河上修座桥，桥建好那天，贺龙在桥上看桥下流水。贺龙爸爸却飞起一脚把贺龙踢到水里，众人惊呼，贺龙爸爸则不慌不忙地说：“莫怕，喝几口水他就会游水，水里来就要水里去。”贺龙在水中挣扎叫喊，没几下子居然真游起身子，独自爬上岸来。这也太高效了。如果贺龙的爸爸生活在现在，去当游泳

教练，肯定生意不错。众人便认为这孩子了不得。

现在，这座桥还在，叫“贺龙桥”。几十年后，贺龙用这一招教自己的孩子，只不过地址不再是河流，而是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

在湘西红军时代，贺龙的队伍被包围，大家着急得不行，贺龙一边吧唧吧唧地抽烟，若无其事地指着天说：“莫慌，我叫老天帮忙，夜里要它一场大雨，借着大雨我们钻出去。”半夜，果然下起瓢泼大雨，贺龙带着部队借雨钻出包围圈。这事之后，三军都说贺龙是“活龙”，比诸葛亮借东风还厉害。贺龙对段德昌说：“日晕三更雨，夜晕午时风。我不过是会看天，哪里能借雨？”观天象而已，诸葛亮借东风也就是观天象而已嘛。

看来知识（常识）的力量还真是无穷的呀。

一九零四年，大旱。农民变成饥民，八岁的贺龙随饥民一起到城里“吃大户”，就是为了生存，到有钱人家的家里抢东西吃。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参与暴力，眼见乡亲挨饿、疯狂，因为饥饿而疯狂。暴力是恐怖的，官兵杀饥民，血流满地，饥民越杀越多。这个场景给小贺龙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农村孩子应该调皮捣蛋、玩泥巴的年龄，却种下了暴力的因子。

之后开始学武，四年之后，十二岁那年便小有名气。

当时桑植县的县衙有个武秀才，会点三脚猫功夫。武秀才在县衙当领班，算公务员，而且还有个恶霸老爹。时常骑马逛街，横冲直撞，明抢硬夺，收保护费啥的，堪比现在的某些城管。

洪家关赶场唱戏，武秀才骑马闯入，撞翻许多小摊，百姓们叫喊躲闪，乱成一片。十二岁的贺龙见状不觉大怒，抓起一根木棒，横身拦到马前，吼道：“滚下来！”

武秀才开始吃惊，勒马定眼一看，是一个小屁孩，笑了，拿出招牌式的嚣张说：“小兔崽子，我看你活不耐烦了！”言毕，拿鞭子抽贺龙。二人交锋，数回合之后，贺龙一棍将武秀才扫落马下，然后抡起拳头一通哼哼哈嘿。“服不服？”，“服了！”

贺龙赤脚踏着武秀才的胸脯，精光的拳头照准武秀才的面孔说：“别说你才是个武秀才，你就是武状元，敢来洪家关撒野，老子也敢打翻你！”

“是是是，不敢，再不敢了。”

“不论哪里，只要你再敢作恶，叫我知道，除非你脑袋比它硬！”

贺龙说着，落拳捶在垫路的一方青石上，青石顿时裂成几块。武秀才吓得翻身跪倒，连磕几个响头。

武秀才很懂得做好汉——好汉不吃眼前亏，有账秋后算。

武秀才逃回县城，就那么鼻青脸肿地找到他爹，把贺龙告到县衙。知县把“打人狂徒”捕来，押上大堂，探出头望时，不禁目瞪口呆。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将县里有名的武秀才打个落花流水的竟是个娃娃！

贺氏族人赶快找人拉关系，请一位举人造势，散布舆论：把武秀才鱼肉乡民，欺凌百姓的光荣事迹给揭出来。知县见士绅民众都同情贺龙，只好当堂释放贺龙，顺带革除了武秀才老爹在县衙里的官职——正义得到伸张。

不得不佩服贺龙同志，十二岁就如此勇猛，长大后还了得？当然了不得！

殴打武秀才，算是干了件好事，也刺激了他身体里的血性，祖先那种强悍因子以及土家族的悍勇在血液里渐渐复苏。

十几岁的少年应该在青春期，放到现在是中学生，对父母叛逆一下，或偷偷给女生传个字条啥的哈。十四岁，贺龙看不惯税警，摩拳擦掌要对着干，被几个伙伴劝挡住，仍然咬牙切齿指着税警说：“几个汗水钱让你们挤光了！这回要钱没得，打个条了，咱们二回见，不怕不还帐！”十五岁的贺龙对伙伴说：“我们要搞刀枪，打皇帝，才有饱饭吃！”

十六岁的贺龙没有了自己的消遣娱乐，学会了相马，时不时骡马市逛逛。旧时代没有体育比赛，凡是喜欢马的，都是不安分的主。某日贺龙逛马市，看见一云南马客赶来一匹烈马，暗暗出神。只见那马通体雪白，银闪闪地泛着油光；碟子大的四蹄稳稳踏在地上。它有松鼠一样的面孔，老虎一样的胸脯，鼻孔宽敞得能插进三根指头！再细细打量，那匹龙马高贵的体姿洋溢出一种傲气，墨黑的眼球透着放荡不羁的野性，两只耳朵灵性地转动着察听四周的动静，简直就是一神驹啊！

“喂，小伙计，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马客拍打他肩膀，挤挤眼，一副洋洋得意样。

“好马！”贺龙发自内心地赞叹。

马客不看龙马却上下打量贺龙，莞尔一笑，说：“年纪不大就敢论马。你要敢骑上它跑两圈，这匹马分文不取，白送给你。”带有嘲弄的含义。那意思分明是说，年轻人还是追大姑娘去吧，不要在这里充了。

这不是明摆着看不起人么？贺龙两眼一睁，说：“说话算数不？”

那一瞬间释放出来的威势让马客一惊。

马客好心警告贺龙：“当然算数。丑话放前面，多少会家子不敢骑，又有多少会家子栽下来，断胳膊断腿，你要是逞强，摔死了可跟我不相干。”

贺龙微微一笑，笑得那么轻松平淡，好像很随意的样子。马客原本看贺龙一小青年，唬一下打

发走算了，没想到这年轻人如此淡定。贺龙朝他那暴烈的神驹凑近。神驹感觉到逼近来的威胁，仰头曲颈，前蹄用力刨地，抖鬃举尾喷响鼻，齧出金黄的牙齿，沉下头来死死盯紧贺龙，发出愤怒的沉闷的嘶鸣。——它是在示威，警告来人离远点，不然对你不客气了。

说时迟，那时快。贺龙淬然起动，飞身而起，疾若闪电，定眼再看已经跃上马背！与此同时，神驹愤激了，它长声嘶叫，愤然立起前蹄、瞬间猛落，接下来弓背低颈，拼命翘起后蹶，圆鼓鼓的臀部直竖上天；后蹄刚落，前蹄又起，开始猛烈地甩颈，跳跟不止，并拚命甩颈想咬住贺龙。贺龙如胶皮糖一样粘在马背，贴紧马颈，任凭颠簸摇晃，他自岿然不动。神驹再一次嘶吼，忽然放开四蹄，狂奔而去，那是“颠马”的跑法。所谓“颠马”跑路，骑马者鞋子可以省了，但帽子可以颠碎！

没人知道神马把贺龙颠到哪里去了，只隐隐听到马嘶声在山峦里时时传出，告诉人们人和马的较量仍在继续。随着时间流逝，按常理铁打的汉子也该颠碎骨架了，大家都为刚才那鲁莽的年轻人担心。恍然之间只听得远处蹄声得得，嘶声悠悠，驯服的神驹踏着轻盈明快的小碎步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就像暴烈的少女变成温婉的少妇。

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贺龙又策马绕了两个大圈，然后驰到云南马客面前，笑曰：“还算数吗？”这是胜利者的笑容，也是英雄豪杰的笑容。马客见贺龙年纪轻轻就如此英雄，豪爽应答道：“我没说不算数，送你了！”贺龙也够意思，从怀里掏出一把钱（究竟是多少已经无法考证）拍到马客手里说：“小小薄礼，不成敬意。”马客也没客气，说：“行，小老弟够仗义。”

也是在这一年，十六岁的贺龙加入了哥老会，并且当上“十排老么”，相当于哥老会的政治局成员，从此有了江湖地位。之后贺龙和马帮一起行走江湖，又是几番挣扎、几番磨难。然而这并不是贺龙想要的生活。他需要更大的空间去释放血液里那勇猛的因子，去笑傲江湖，去纵横天下。机会终于来了。

由于袁世凯同志雄心惊人，当了万人之上的大总统还不满意，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搞独裁，为皇帝梦铺路。自古以来每一个走上皇帝宝座的人都是障碍重重，袁世凯同志的阻力特别大。因为袁世凯生不逢时，错生于国人遗弃皇权的时代。而袁世凯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孙中山。孙中山一生那是屡败屡战，跟袁世凯斗法失败后，深感有必要重新整合力量，就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一九一四年，十八岁的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把他的勇武带入军队，从此开始数十年的革命生涯。

贺龙的革命生涯充满艰辛波折，却每一次都能神奇地化险为夷。

一九一四年，湖南督军汤芑铭残酷镇压湖南人民的反袁反帝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慨，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倒袁反汤”运动。身为革命党人的贺龙受命到军中去策反，组织反袁武装。贺龙约了几个人打扮成羊贩子活动去了。半年之后秘密组织了一批志人，准备拖枪举义，不料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离开。路上碰上了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

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恰巧警备队前来袭击强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关进监牢。几天以后土匪被斩首。按常理，贺龙也要当做土匪，被牺牲了。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

衙门里的各种公务员老爷一听“肉票”，仿佛见了财神爷，顿时眼睛闪闪放光，使出公务员的发财必杀技：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但放口风说可以出钱赎人。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想死都死不了。因为在公务员老爷的眼中，贺龙同志就是鲍鱼啊、就是二奶啊。时不时有人去看看贺龙，打量一下瘦了没有，还值多少钱。消息传到贺龙的家乡桑植，贺龙的父亲赶过来，招待各位公务员吃好喝好玩好，塞足红包。吃人嘴软，拿人手软，公务员大人们本着上天有好生之德的精神，就说贺龙同志是被土匪蒙蔽了云云，批评教育一通就给释放出来了，贺龙就这样捡回一条命。

这一年贺龙十九岁，坐牢并没有磨掉贺龙的锐气。一年之后，为了响应蔡锷搞袁世凯，贺龙在老家抄起两把菜刀干起来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由此传开。以这两把菜刀为本钱，贺龙竟然拉出一支队伍，成了植桑民军指挥。这事之后，贺龙在革命党中取得一定地位。有了地位就意味着承担更多的风险，过更加凶险的生活。

湖南革命党人搞了一个组织，叫正谊社。名字很好听，是暗地里搞暴力活动，例如暗杀啊啥的。正谊社给贺龙分配了任务——炸掉湖南督军谭延闿的公馆。谭延闿标榜自己是革命党，暗地里却卖身给北洋军阀政府，湖南革命党人极为不满。贺龙二话没说接受任务，准备在坡子街福元旅馆下手。万事俱备之际，西风来了：正谊社谋刺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植根未遂（业务不精啊），引起了军警大搜捕。警察在贺龙住处搜出一些玩具：手枪一支，炸弹两枚。啥也别说了，恐怖分子一个。为了革命，贺龙再次光荣入狱。眼看为革命事业牺牲，革命党人展示了高超的危机公关手段。他们知道谭延闿与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有矛盾，陈复初拥有一个师的武装，对北京政府卖身更彻底，极有可能充当北京政府在湖南爪牙，应该是主要的打击对象。经过权衡，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谭、陈矛盾，变杀谭为拉谭。两方举行了友好谈判，确立共同打击陈复初之大计。谭延闿认为此事于己有利，便释放了“恐怖分子”贺龙。

袁世凯翘辫子之后，孙中山依然没能时来运转，依然屡败屡战。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东搞了一个“护法运动”。湖南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湘西起义。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在家乡很快组建了一支二百余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和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护法之战取得了很大胜利，进踞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被迫停战言和。一切貌似很顺利，然而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人找贺龙，另一派的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归附林修梅，便以会谈为名，把贺龙扣了，吞并了贺龙的部队。七天之后贺龙出狱，再次成了光杆司令，劳动成果被无情剥夺，郁闷不行。这就是贺龙一辈子三次入狱的经历，等到贺龙再一次失去自由，那便是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郁闷归郁闷，并不悲伤，年轻就是资本嘛。接下来贺龙在军中当了一系列干部，一步步升迁，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权力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大，大到连蒋介石的耳朵里都经常听见贺龙这个名字。一九二七年，三十一岁的贺龙迎来人生巅峰。

（2）巅峰时刻——南昌起义

中国共产党到今天经历三次标志性事件：二一年建党，二七年建军，四九年建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南昌起义，意味军队的诞生。

后来的十大元帅中，七个元帅和这次起义关系密切，分别是贺龙、刘伯承、朱德、陈毅、聂荣臻、叶剑英、林彪。

十大将军中，有四位直接来自南昌起义，分别是陈赓、粟裕、张云逸、许光达。算上起义南下收编的黄克诚，和去南昌未成的罗瑞卿，一共六个。

将帅之外的军事人物还包括周恩来、李立三、叶挺、彭湃、恽代英、谭平山。中共元老中还有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陶铸等人，阵容可谓空前绝后，超级豪华。此后历次军事行动，再也没有如此深厚的阵容。即使关系国共双方命脉的东北战场，共产党列出的名单已经足够强大，和南昌起义名单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在这群超级豪华的名单上，贺龙为总指挥，这些大家都知道。

也许还有人不知道：身为总指挥的贺龙当时并不是共产党。一个党外人士掌控、指挥共产党的全部军事大权，在中共历史上非常非常罕见。

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周恩来搞的起义通令并不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即威武的共军诞生时，打响第一枪的实际领导人和号召者是一个党外人士！这大概是南昌起义最有趣的地方了。

为啥是一个外人任总指挥呢？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第一枪。之前的东征或者北伐，共产党都是寄生于国民党内部，配合国军打仗。共产党没有自己打过仗，军事上还没有多少号召力。贺龙当时的名头非常响亮，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周逸群在准备南昌起义时，给中央写的报告承认：“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

贺龙能当上总指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实力。起义不是请客吃饭，谁名气大、地位高、有才，谁就牛叉，关键是看大兵们听谁的话。论名头，刘伯承有“川军名将”之称，贺龙一辈子也没和名将扯上关系。论才气，郭沫若、陶铸甩贺龙好几条街。论地位，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都是中共顶层人物，而贺龙只是党外人士。

看看参加起义的其他人吧：郭沫若、陶铸等人可以忽略，文人嘛，战争年代还不如一百夫长。周恩来、李立三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虽然很高，手中却没有一兵一卒，全靠一张嘴去拉别人入伙。李立三第一个倡导搞暴动，是用嘴。周恩来东拉西扯做工作还是用嘴。

将帅们又如何呢？

朱德：起义前，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朱培德第3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起义时任第九军副军长，手下有几百号人，凑个份子而已。能成为红军之父，并非因为南昌起义本身，而是因为起义失败之后，别的大领导转移了，朱德收拾了残部，保留了革命火种。所谓革命火种，就是后来的大将、上将、中将、少将等数不清的军官。如果没有朱德，像林彪、粟裕这些人，要么“浪子回头”发一个脱党声明，继续跟着国民党混，要么为革命牺牲，指望他们回家种地或去工厂打工也不现实。

陈毅：南昌起义时任第11军25师73团政治指导员，职位不高，搞政治的，也是用嘴说话，而且还没赶上当天的起义，后来追上的，胜在帮助朱德收拾旧部——这为后来在南方游击战中拉旧部提供了经验，所谓“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信心也是这会来的。

刘伯承：当时空有“川军名将”的大名，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孤身一人凑数。因为名将头衔，其他人不怎么会打仗，故赢得委员会参谋长一职。

至于两位黄埔教官，聂荣臻和叶剑英，八月一日那天均不在南昌。起义发动前，叶剑英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人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马上约了叶挺、贺龙、廖乾吾和高语罕4人到甘棠湖划船。正是在这艘小船上，叶挺、贺龙得知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最终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叶剑英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通过秘密方式帮助过贺龙和叶挺。聂荣臻是第二天随他的学生周士第一起赶往南昌的。

林彪：南昌起义时任叶挺独立团(24师)连长。有他不多，没他不少。三十八年后，林彪在给罗瑞卿找罪名时还酸溜溜的说：“罗瑞卿大跟别人、大捧别人，我们威望不够，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满嘴酸味呵！

几位大将的贡献力量更微弱了。当时名气最大数陈赓，头顶黄埔三杰之一，东征救过蒋介石，甚是拉风。然而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3师6团2营营长，比林彪职位高一点而已，并无决定性贡献。张云逸和许光达属于更小的军官。至于后来纵横天下的粟裕同志，当时也就是一个警卫班长而已。

根据刘伯承的报告，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共六千五百人；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五千五百人，十师五千人（师长蔡廷锴），二十五师五千人（师长周士第）；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与南昌公安局警察队五百多人。蔡廷锴并非

真心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所以队伍南下之后就给十师内的共产党人发放遣散费，复归国民党。不论如何，蔡廷锴也是个英雄。

周士第的人马是第二天到的。周士第和陈赓、徐向前一样，毕业于黄埔一期，是早期共产党员，后来之所以只是个上将，是因为二八年到三三年和军队失散了，在白区搞地下工作，错过了井冈山最初五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如果一直呆在军队，前途不可限量，光凭资历也能熬到大将的位置上了。

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只有两股：贺龙带的六千五百人和叶挺带的五千五百人。在国民革命军中，贺龙为十二军军长，叶挺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长。级别上，贺龙高于叶挺。人数上，贺龙多于叶挺。所以贺龙是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另外叶挺当时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属于自家人。贺龙还是党外人士，赔了身家性命帮助共产党打天下，也需要一个头衔对吧。南昌起义总指挥——这个头衔成了贺龙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履历。

所以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周恩来起草南昌起义命令，不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实力决定一切。还原一下历史场景，不难发现，贺龙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没有贺龙的第十二军，十一军内的蔡廷锴第十师很可能根本就不会跟着干。因为当时在南昌城里的十一军只有两个师，二十四师和十师。而蔡廷锴虽然属于左翼激进派，但信仰的是孙中山，和共产党不是一路人。

没有贺龙，南昌起义是个啥样还是未知数——正如没有张学良，国共如何去抗日也是未知数一样。贺龙和张学良，绝对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贵人。只不过后来贺龙加入共产党，而张学良一直留在国民党内。后人评价贺龙的选择，认为是信仰所在，理所当然，评价张学良多从民族大义出发。

南昌起义——贺龙一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然而在乱世年代，任何风光都要付出代价的——看看贺家的牺牲吧。

因为贺龙加入了革命党，惹恼了黑暗势力。一九一九年，在没法拿贺龙怎么样的情况下，反动派就到贺龙的家乡去杀人放火。一夜烧杀，贺姓族人遇难三十多人。贺龙父亲贺士道，一九二零年牺牲在桑植，同年牺牲在植桑的还有弟弟贺文掌。这批贺家人算为了国民革命而死。

南昌起义之后，为了报复贺龙，反动派再一次到洪家关进行疯狂的灭绝人性的杀戮。之后，贺龙四妹贺满姑于一九二八年牺牲在桑植教场坪，同年，堂弟贺文新，为了向贺龙送紧急情报，活活累死在路上。一九三三年，贺龙的大姐贺英在长湾牺牲，同年牺牲在长湾的还有贺龙的二姐贺茂姐。长征之后，国民党再次去贺龙的家乡进行“清乡”，打着的旗号是——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

贺龙家族，一门八十多烈士，有为国民党而死，有为国民党所杀。那是迷茫中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振痛。所谓革命，实际就是浴血重生。推动历史车轮的，永远只有两个字——鲜血。

十一年之后，国共再次合作抗日。一九三八年一月七号，抗战领袖蒋介石见到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一间小客厅里，蒋介石见到贺龙。蒋介石无数次耳闻贺龙的传说，这一次终于见面。身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政敌的一个师长，目的无非是拉关系、挖墙角。蒋介石是挖墙角的行家里手，中原大战时，曾靠这一手挖得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晕乎乎的。蒋介石在心里打着算盘：能把贺龙给挖过来，相当于挖掉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哈哈，划算。显然这一次搞错了对象。

贺龙从容地走过去，向蒋介石伸出右手：“委员长！”

“哦，贺将军！”蒋介石心中收起算盘，换上笑容，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打交道可很久，从北伐的时候就开始。”贺龙说。

然后一番客套之后，开始步入正题。之前因为贺龙为了革命党牺牲重大，而且英雄有为，虽然未曾谋面，蒋介石对贺龙的感觉很不错。为了拉拢贺龙，蒋介石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许以上海、南京的小楼，许以三百万大洋等等。一句话，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女人给女人。结果第一次派去的李仲公秘书长被贺龙抓起来，送交总指挥部；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又被抓起来，押往九江，交给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熊贡卿、梁素佛，不但被贺龙抓起来，而且进行了公审，最后居然予以枪毙！最后，蒋介石对贺龙彻底死了心。正因如此，才对贺龙恨之入骨，多次杀戮贺龙的家人。这一次见面，蒋介石决定再试一次。

蒋介石说：“云卿啊，你一二零师的部署情况怎么样？”

“配合忻口战役，我们攻占了雁门关、太和岭，截断了忻口之敌后方的主要交通道路。”贺龙说，“友军失守忻口，太原告急，我一二零师派兵至大同、雁门关、忻县及太原以西，在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分散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敌人。”

蒋介石缓缓点头，再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摇头，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

“秃的？”蒋介石不解。

“没有刺刀，秃的。”贺龙做个手势，“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这些都是铺垫，蒋介石也不愿意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再说了，贺龙说的困难越多，麻烦事也就越多。到底应不应该给他补给？名义上也是下属嘛。还是解决正事要紧，蒋介石望着贺龙，皱了皱眉头问：“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那件事一直

困扰着蒋介石，要知道当年许多黄埔军校高材生还没有机会去军队跑腿，你贺龙同志倒好，好好的军长不干，跑去当“土匪”；好好的洋房不住，皮鞋不穿，冒着断头流血，不顾家人安危的情况下跑去打游击。对于这个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人不喜欢城市，喜欢山沟的？还有人不喜欢大洋的？还有人不喜欢豪宅的？还有人不喜欢美女的？蒋介石想知道答案。

贺龙直爽地笑了，挥动手臂有力地划了一下：“我和委员长的政见不同嘛！”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蒋介石当惯了领袖身份，不太适应别人讨价还价，特别是对方以军人的身份和他谈论政治的时候，那手势气派，让他很不舒服，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沉默冷场了。

尴尬之后，蒋介石决定缓解一下气氛，喝口茶，换个话题：“过去的事就算了。”蒋介石轻轻摆了摆手，装出一副大度亲切的样子，“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冷瞅了蒋介石一眼，那冰冷的目光让蒋介石很不爽。他想起来了，不该问候贺龙的家人，因为他可以确定，贺龙的家人已经没了。贺龙直愣愣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八十多口子，剩下我贺龙一个拿枪的。”一点弯都没拐。是啊，只剩下一个拿枪的。就算没有政见不同，即使光算这家恨，剩下这个拿枪的也不可能被拉拢了。

贺龙离开之后，蒋介石靠在椅子上松了一口气，说：“以后我不要见他了。”他知道贺龙对他的怨愤只有死神才能化解。在死神来临之前，任何动作都是多余的。

（3）困惑

面对贺龙的选择，蒋介石很困惑。我们很能理解蒋介石的困惑，一九二七年的贺龙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员面临被清洗的危险，生死存亡之际，即使为生存也要拼死一搏。要不然这些职业革命者要么被杀掉，要么发表脱党声明，该回家种田的回家种田，该去工厂扛包子的扛包子。不论何种选择，结果都很惨淡。

贺龙对国民革命是有功的，此时贺龙已经略有地位。一九二七年，贺军长的职位虽然比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这些人的级别低，但是看看其他人，就会发现贺龙的地位一点也不低。一九二七年的韩复榘也只是第六军军长，一九二七年的龙云为三十八军军长，与贺龙一个级别，蒋介石后来的虎将们此时还在跑腿呢。如果他不和共产党搅合在一起，好好地混，说不定能成为一方大员；实在不行就学学其他国民党军官，搞点糜烂麻醉自己也可以当。

贺龙不仅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可以肯定还有房子住、有肉吃、有崭新的皮鞋穿，外出可以骑马

或坐轿子；抽得起雪茄，脱下的脏衣服、臭袜子有人抢着洗；如果心情不爽了，还可以随便拉人出来抽两巴掌、骂两句消消气；没事可以给某些社会名流点面子，去人家的豪宅喝喝茶、打打牌，提供安全保护，顺便收点银两；如果他想要，可以多娶几个貌美如花的老婆潇洒快活，日子过得比今天所谓的富豪还要爽。而这一切都是他贺龙亲手挣回来的，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中挣回来的。既不是某人给予的，也非关系所得，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起来心安理得。从白手起家到拥有一切，应该很有成就感。为啥跑去搞革命？蒋介石不理解，包括今天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为何？

可以说在南昌起义的所有参与者之中，贺龙投入的成本最多：混迹江湖多年的名望和军事地位全搭进去了；最没必要参与：国民党军长，北伐虎将，前途无量；而且付出的代价最大：家乡一次又一次被屠杀，数十口亲人毙命。

是贺龙的脑袋出了问题？贺龙早年纵横江湖，虽然文凭不高，却见多识广，记忆力超群。这种人放在任何时代脑袋都非常清晰，要不然早见阎王了。

贺龙参与南昌起义最直接的原因肯定是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能力太强大了。如果说因为贺龙后来成为中共元老而忽视了共产党搞的统战工作，那么请参考西安事变前后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那是战斗力超强，吃苦耐劳，脑瓜子灵活，有一点裂缝就能渗透进去，就算没有裂缝也能制造出裂缝的一群人。胡宗南对此肯定深有体会，因为中共情报系统后期最杰出的三个间谍全是他秘书！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共产党人叫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人，一八九六年生，和贺龙同龄。周逸群早年留学日本，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同年加入共产党。两年之后，周逸群参加北伐，在贺龙军中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与贺龙成为铁哥们，时不时畅谈人生和理想，关系铁到不能再铁。正是周逸群的影响，贺龙日趋倾向共产党。南昌起义之后，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此后两人成为搭档，关系更铁了。军中传言，贺龙和周逸群穿一条裤子。实际上他们不是穿一条裤子，而是穿同样的衣服。比方说贺龙弄了一套军装，必然给周政委弄一套一模一样的；贺龙自己做件咖啡色皮夹克，同时也给政委做一件；贺龙自己的军装加个斜插兜，关政委的衣服也必定有，总之类似现在的情侣装。周逸群博学多闻，性格和善，和贺龙一起工作配合得非常好。然而遗憾的是，周逸群英年早逝，不是战死、病死、累死，是在肃反中被夏曦同志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时至今日，洪湖人依然传承着那首歌谣：“洪湖水上长莲苔，莲苔年年把花开，莲花时开时又谢，烈士鲜花永不败。”是为周逸群唱的。

但共产党人的统战能力还不是决定性的，比方说同时参加南昌起义的蔡廷锴，离开南昌之后就离开了革命队伍，重归国民党的怀抱，而贺龙选择加入共产党。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贺龙本身。贺龙出身寒微，七、八岁就跟着饥民去吃大户，那是玩泥巴的年

龄；十一二岁就敢挥动大棒和恶少对决，那是放风筝的年龄；十六七岁就加入马帮行走江湖，那是幻想女孩子的年龄；十八九岁就敢拉队伍搞革命，那是谈恋爱的年龄；二十多岁就能靠实力当上军官，那是为工作发愁的年龄。贺龙就这样一步步走来，可以说每一步都不满，每一步都在反抗，每一步都可能死掉。为何？时代的逼迫。

如果说七八岁的贺龙能够安安心心地玩泥巴，玩好之后回家吃点饭继续玩，他可能就不会想着学武，偏偏是没有饭吃。如果当时的治安环境好点，没有那拉风的恶棍，贺龙也就不会十一二岁就去好勇斗狠，偏偏是一个傻里吧唧的家伙都能横行乡间。如果大家有饭吃，贺龙也许就不会加入所谓的哥老会，不会搞革命。即使去搞了革命，仍然很不满意。因为革命队伍之中派系林立，软弱无能，各国列强肆意入侵。

家，没饭吃；国，没有尊严。这样的革命何用？

于家，不是一家人没饭吃，普遍没饭吃，有饭吃的人是少数。于国，不是一个人没有尊严，普遍没有尊严，那些为了尊严而奋斗的人在内斗。孙中山不死，大家尚能团结在一杆大旗之下。孙中山死后，更是四分五裂。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血性的，更多人靠另一种特性活着——奴性。

（4）奴性和血性

咱们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都是这样，血液和文化中暗藏着两种性格：血性和奴性。

血性，即反抗；奴性，即顺从。

在和平年代，生存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大家想办法吃好一点、住好一点、找个好点的对象，血性或者奴性并不重要，也没必要区分。不可能为了验证一下自身的性格找军警干一场，那叫鲁莽或者傻，与拿脑袋撞南墙没啥区别——还好这样的人不多。闲来无事去找别人的事，去威胁别人，那叫侵略或者好斗。

性格展示于逆境。逆境反抗，或者逆来顺受。

每当灾难来临，特别是王朝末年或者民族面临外敌入侵之时，总有人跪在马路中间嚎啕大哭，曰，老天爷救俺一命吧；也总有人紧握拳头高呼，干他娘的！那些跪下来的人，有两种命运，被屠杀或者当奴隶；握拳的人也有两种命运，战死或者为王。

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记载黄巢，记载李自成的时候，背景是那些跪在马路中间请求庇佑的顺民。当刘邦或者朱元璋等人建功立业之时，那些顺从的受害者们依然在自家房子里默默低泣。没有人记得他们的痛苦，因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此时的贺龙，如果为了吃喝拉撒而奋斗，那么他基本上成功了。如果学识高一点，奴性思想多一点，可以多学点自我安慰的理论：什么时势如此非人力能逆转啊、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就好啊、什么清者自清啊、什么修身养性啊、升官发财啊等等。这一大堆、这一大摊、这一大串的理论堪比海洛因麻醉剂，能够舒缓奔腾的热血。服用之后有这样的功效：见了领导拍拍马屁，看见漂亮女人意淫一番，这是对内的；对外，看见鬼子来了，拿点钱粮去慰劳慰劳，买个平安，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女人也送过去，表示只要能给口空气呼吸一下就可以。如果官足够大，影响力足够大，还可以号召大家跟着做奴隶，并美其名曰这是和平的唯一办法，如秦桧先生，如汪精卫先生。

所以身残而不失伟大的司马迁同志才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很多人不喜欢听这种话，听起来怪怪的。然而它已经深入到咱们的文化和生活。每一次社会动荡或民族危机，民族中的这两种性格都会暴露无遗：有人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人屈膝低头卖身求荣。

有趣的是，很多时候，卖身求荣的多半来自上层权贵，英雄多来自草莽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估计是一个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一段时间之后，会认可那种奴隶思维吧。这大概就是沉淀在咱们文化中的一种深沉的悲凉。体制内也有文天祥、于谦那样的英雄人物，更多的则是屈膝叛国者，他们会为了自身娇嫩的羽毛而出卖国家和民族。为啥会这样呢？权贵们生来就如此吗，生来就是冷血动物吗？不！因为他们在摸爬滚打的过程中，练成了皮厚心黑大法。炼成这种神功的前提就是漠视老百姓，把老百姓当牲口看。

大千世界的底层小人物永远面临着生存危机，唯有反抗一条路。所有才有刘邦、朱元璋，才有陈胜、吴广，才有黄巢、李自成、张作霖；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不管成功或失败，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代价大到让人不寒而栗。比如说刘邦同志，代价是老爹、老婆、孩子。刘邦还算幸运，遇到妇人之仁的项羽。如果项羽残忍一点，刘老爹就要被蒸煮了，吕雉就要变成军妓，刘盈就会成为小萝卜头。等到刘邦当皇帝时就会惊讶地发现，刘氏一门全是革命烈士。李自成或黄巢那种，失败之后族人不死也得隐姓埋名，而贺龙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贺龙的代价是，贺家满门忠烈。同时期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祖坟被掘开，亲人被杀害，比如说黄公略、彭德怀，比如说毛泽东。

理解了这一层就能解释贺龙的选择，其实很简单：他不过是一个需要下跪的年代选择拒绝下跪而已，正如他的祖先面对屠刀选择站着死一样。这就是蕴含在咱们这个民族中，来自草莽之间的力量，属于任何数据也无法统计出来的潜力。正因如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群看起来要完蛋时总有人站出来，即使被屠杀，即使奄奄一息，仍然可以劫后余生。正因如此，很多民族消失了，中华民族还在，很多文明成了过眼云烟，中华文明还在延续着。

既然最为艰难的过去都可以挺过去，所以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咱们都应该乐观一些。

不必困惑：朗朗天地，正气长存。

所谓正气，并不在酒色之间，并不是黄金屋或颜如玉，那是指生死存亡之际的慷慨和悲壮、流血和牺牲。也许用真理或正义代替更为动听一点，我更愿意相信传统的那个词——正气。

（5）怪胎

来自草莽之间、生就天不怕地不怕之性格的贺龙和旨在推翻一切反动势力的共产党在精神上简直是天作之合，甚至无须太多动员，贺龙脱下皮鞋换布鞋，扔掉雪茄换烟斗，毫不犹豫倒向共产党，堂堂国民党军长对当时手中无枪无人的共产党表态：共产党让我干嘛就干嘛。

虽然当时的力量很弱，还是拉开大旗就干了，因为无所畏惧。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除了朱德、陈毅重拾队伍去了井冈山，其他领导人多半去了香港或者上海避难；有些人出了国，如刘伯承和叶剑英等人去了苏联进修。当时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贺龙，如果贺龙愿意，也可以去苏联进修。但是贺龙不去苏联，选择去湘西重新拉队伍。他心里憋着一股气：不信打不败蒋介石。

说真的，当时凭借共产党的力量，还真看不到打倒蒋介石的希望。蒋介石有江浙财团的支撑，有钱去买枪买炮；蒋介石有黄埔军校——源源不断的军官资源；蒋介石有大片的统治区——足够的兵力来源。共产党当时有啥？因为变成了“非法地下组织”，没办法筹集经费，全凭共产国际发点党费过日子，要钱没有，要地盘更没有。

这一切在贺龙看来仿佛都不重要，没有人可以拉人，没有地盘可以抢地盘，没有枪怎么办，找机会抢呗。贺龙在湘西主要就干一件事：拉队伍。一茬又一茬，从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惹得蒋介石大怒，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同时对贺龙的家乡来一次又一次的血洗。

相信当时支撑贺龙这么干的并非什么共产主义思想，而是中华民族蕴含在草莽之间的那种英雄气概。纵观贺龙一生，共产主义理想没见多少，更多的是这种英雄气概。毛泽东和国际派的那些理论家们比起来，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把草莽英雄们团结在一个旗帜之下，包括贺龙、彭德怀、林彪、这些个性鲜明却又千差万别的英雄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拿那些所谓的马列主义去适应这些人，而国际派的专家们试图让这些人去适应马列主义。

队伍被打散了，拉；根据地没了，建。贺龙带着一帮人，如同草丛里的黄鳝一样钻来钻去，蒋介石先生虽然恨得牙痒，却也没辙。原本赫赫有名的贺龙在湘西那一带更有名了，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然而一个人的事业如果太顺利的话会惹来老天爷的妒忌的。

所以老天爷给贺龙和他的人马迎来一个超级对手。

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曦同志。这个夏曦同志何德何能，能够把贺龙辛辛苦苦拉出来的队伍毁于一旦，完成蒋介石未能完成的事业呢？

相貌：精瘦精瘦的身子套一件过大的红军军装，腰扎一根军皮带，干瘦的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三七分头油光水亮，纹丝不乱，给人一种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

职能：有人属于武将，有人属于文官，有人文武双全，而夏曦同志属于另外一种个性，不文不武。说他是武将，他不懂军事；说他不是武将，他独揽军权，把贺龙排挤到一边，瞎指挥。在夏曦的指挥下，同志们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说夏曦同志是文官吧，他又不守文官的本分——不和稀泥。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也就罢了，还一手遮天。看谁不爽，一言不合，置人死地。说他不是文官吧，却独揽大权，挥舞一根红蓝铅笔，指手划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手腕极其毒辣，杀人效率之高比蒋介石的枪炮强多了。

看到这样一个人，大家也许感觉他是个糊涂蛋，杀人魔王，变态，比康生还残忍狠毒。当然这些绰号都合适，但是看一看夏曦同志的简历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人还有另一面。夏曦生于一八九六年，与贺龙同岁，和毛泽东有同窗之谊，早年一腔热血，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积极性都很高。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刘少奇的党龄还大。更为牛叉的是，还倾听过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诲。大革命失败之后再次赴苏联进修，和王明交往甚深，成为当时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排名第二十三位。从这段简历中可以发现夏曦同志还有这样的特性：国际派，理论家，书生意气，心中装着革命的标准答案——像苏联那样搞。理解了这一面才能更好地理解夏同志在苏区所作所为。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号，夏曦同志来到湘西苏区。苏区上空开始乌云密布，同志们头顶上的太阳即将隐去。

夏曦同志一到湘西苏区就感觉很不爽。从外边看，苏区革命干得热火朝天，走近一看才发现，这群大老粗一样的人打打跑跑，停停再打，身上的土匪气息比革命气息还浓厚，这怎么能行？一定要好好改一改，整一整，修理一下。和苏联标准模板一对照，夏曦惊奇地发现两者相差很远。在夏曦同志那颗意气风发的书生心中，以为自己找到了中国革命很快成功的答案。答案是啥呢，就是向苏联看齐，为此夏曦故作精明地采取了如下手段。

首先，夏曦同志认为，这里风气不正，是因为政治工作干得不好，那就拿政委开刀吧。所以贺龙的好哥们周逸群同志撞鬼了，本来还想发挥口才辩论一下，哪知夏曦同志直接出绝招，直接把周逸群秘密杀掉，贺龙也没辙。周逸群死了不说，夏曦还把周逸群封为“改组派”老大！这样一来，贺龙问：“都是搞革命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夏曦答曰：“正是因为干革命，所以才可能是改组派。”

看来改组派也是有门槛的！凡是和周逸群相关的都可能是改组派，都有被逮捕、被行刑、被处决的理由，而周逸群是政委，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和他都有关系，此后一两年内他们统统都要见马克思。

第二招更狠：极端主义，彻底平分土地，并以此为基础没收富农的财产，且连中农也不放过，一并没收土地和财产，坚决打击中小商人。夏曦这么一搞，相当于要把人家给搜刮干净。这是干啥？搞人民公社？即使三十年后，毛泽东搞三面红旗时，好歹还建公社让大家有地方睡觉，有一个安稳的大环境。这么一来必然激起反抗，夏曦也不客气，杀。在夏曦同志非黑即白的理论中，阻止革命就是反革命。而他收地收钱是革命，别人不给，就是反革命，所以要杀。他不理解，他这不是收地收钱，是要人家命。这些人都已经成了沉积在历史长河中的冤魂，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了。

夏曦的这种行为虽然短时间内增加了经费，但是后果也很严重。收人家钱，要给人家提供安全保障对吧？对就不能再到处跑，搞游击了。装备那么差，这仗怎么打？当然没法打。而且夏曦的行为惹起了当地人的愤恨，对红军的支持力度降低了。没有老百姓支持的游击队就好比离开水的鱼，能蹦跶多高？要知道贺龙能拉起队伍，能带队伍和国民党干，主要是和当地人的关系搞得不错，缺粮征粮、缺人征人，大家都有条活路。所以湘西红军可以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主要是这一带人的支持。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是这个意思。

所以贺龙、段德昌等人对夏曦同志的行为尤其不满。夏曦同志很生气：老子是革命的，你们竟敢对老子不满，那就是对革命不满；你们敢对革命不满，老子还能怎么办？只能杀掉你们！那就杀，大开杀戒。

当然他不能直接说出来，说老子要把你们杀掉，那样的话被杀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夏曦同志的理由就以钦差大臣兼地方领导的身份，搞肃反。啥叫肃反呢？就是抓反革命、抓特务、抓坏分子。一看这是好事，但要看由谁来办。须知当年跟着贺龙在湘西混的那些人，多半老底不干净，包括贺龙本人，要么在旧军队干过，要么跟国民党有关系，一查一团黑，那就杀呗。也不能简单就杀了，还要杀出花样来。

作为根据地的最高权威和最高领导，那么多人需要杀，不能自己动手对吧？即使杀那么多只鸡也是很累的，需要合伙人。夏曦初来乍到，根基不深，就和当时的保卫局长江奇建立亲密合作关系。江奇同志对夏曦鞍前马后、言听计从，夏曦就对他放心使用。而江奇也是一个人才，在折磨人方面那是绝对的高手，在常规技术手段之外有所创新，比如说“背火背篓”。顾名思义，就是让你不承认有罪，那就给你个烧着的火篓子背一背。其残酷程度虽然比不上纣王的“炮烙”，以及朱元璋先生的“点天灯”，但用现代人的眼光看绝对是大师级的水准。如果江奇先生还在，可以给他建一个专门监狱，专门管理贪官污吏、人贩子等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者。

比方说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同志，夏曦说他是“改组派”，他不承认。一顿毒打，潘的右手被打

断，依然不认，高喊：“拿刀来破开老子的胸膛，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继续打，打到神志不清，关节断光。戴君实任红九师政治部主任，被折磨得不行了，就对当时的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之后庄晓东在回忆录中把这件事写下来。

在庄晓东的回忆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享受到这样的待遇：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对万涛被捕之事非常不满，对别人说了两句夏曦同志的丑话，即在“马日事变”中夏曦让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决定立即逮捕柳直荀。此时柳直荀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刚一出门就迎来江奇同志。江奇也不客气，当场直接把柳直荀打昏带走。抓到政治保卫局的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地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被江奇发觉，连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柳直荀的待遇和万涛一样，打伤打残之后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

柳直荀的妻子叫李淑一。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词，叫《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柳，即为柳直荀。

这样无休止的串联中，杀戮是无休止的。庄晓东回忆：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黄埔才俊段德昌在短暂的一生中干了两件比较耀眼的事，一是介绍彭德怀入党，二是和贺龙一起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段德昌对夏曦的极左行为不满，曾对夏曦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丝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段德昌建议恢复洪湖根据地，夏曦认为段德昌那是“分裂红军”，鉴于段德昌同志一贯反对自己，也就是反革命，所以段德昌是在阴谋“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一定要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夏曦同志展示了自身的高效：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接下来就是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盼斩立决。江奇同志还故意用钝刀执行斩首刑，特意延长他的死亡痛苦。当时很多战士在看，最后哭声一片。若干年之后，段德昌成为共和国第一号烈士，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段德昌牺牲后，湘鄂西苏区的群众含泪埋葬了他的遗体，并在坟前栽下了代表他年龄的29颗青松——老百姓心中有杆称。

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

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第一师政委陈协平被打折十指之后被石头砸死。如此等等，很难想象还有更恶毒的。

然而夏曦同志惊奇地发现，如此疯狂地杀人，敌人竟然越杀越多！什么改组派、托派、AB团、特务、反革命，怎么会越来越多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想不明白，那就杀、杀、杀！看来是以前杀得不够，那就增加屠杀力度，还要火线“肃反”！战员们在战场上没有死掉，下了战场就得面对夏曦和江奇。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杀到最后，湘鄂西原本几万红军只剩下几千人，党员只剩下若干个，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之外基本就没有了，夏曦的四个警卫被他自己亲手干掉三个。最后出现这样的奇观：在物质极端贫乏的红军时代，枪支向来是高级消费品，向来十分匮乏，而红二方面军竟然枪比人多很多！而且都是兵，没人敢当干部，干部给杀光了。

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默默无语。更为无语的是，夏曦同志一手提拔、依赖、信任的江奇同志竟然是国民党特务！这让他老脸丢完。直到最后，他还是不明白咋回事：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忙忙碌碌杀人，杀到最后也没有把现实的革命和心中的模板（苏联革命）对上号。

杀红了眼的夏曦同志甚至动了这样的念头：把贺龙也杀掉。为了打仗的事，两人一度闹得很僵，夏曦叫人把贺龙的警卫的枪给下了，一副要对贺龙动手的样子。哪知贺龙不吃这一套，直接从身上掏出一支勃朗宁手枪对夏曦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如果夏曦坚持要搞贺龙，贺龙会给他一枪么？考虑到王明的关系，资格更老的关向应对夏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夏曦要杀哪位，关向应表示赞同。但是在贺龙的问题上，关向应一直很硬。关向应对夏曦说：“那个老夏啊，如果你杀了贺龙，即使中央不杀我们，蒋介石也会杀了我们。”这话的潜台词是杀了贺龙就要死在苏区。这话是对的，湘西没有贺龙压阵，夏曦这么杀人早被千刀万剐了。贺龙威望太高了，指挥南昌起义时夏曦屁都不是呢！没有贺龙就没有红二方面军。同理夏曦这么杀人，贺龙也是有责任的。没有贺龙团结军队，早乱了，夏曦可能已经被乱刀分尸。但是贺龙本身老底也不干净，加上对共产党的盲目信任，都是促成夏曦疯狂杀戮的原因。在现在看，贺龙当初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找几个亲信把夏曦装作麻袋里沉入洪湖算了，然后上报中央说夏曦同志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了，再附上一份检讨，说没有保护好夏老大请求中央责罚云云。

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南方根据地已经搞不下去了，当时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湘鄂西的

红二方面军也呆不住了，也得长征。长征就是跑路，边跑边打，把游击战发挥到极致。夏曦同志那一套已经用不上了，再也不能任凭他胡来。所以靠边了，就如同博古等人一样，跟着跑路就是了。跑着跑着就挨批了。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军召开遵义会议前后，红二方面军开始批判夏曦同志的错误。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身，基本上同时检讨靠边站。此时的夏曦才体会到啥叫墙倒众人推。向来对他夏曦客客气气的关向应火力最为猛烈，倒是王震相对客气一点。夏曦认错道歉，这是不够的——洪湖之滨的冤魂太多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号，三十五岁的夏曦溺水而亡，算非正常死亡。夏曦的死，是一笔糊涂账。据说过河之后突然响起枪声，夏曦发现情况不好，马上返回徒步涉渡，结果因心情紧张、身体疲惫，走到河中心时，被忽然而来的一股激流卷走而丧命。时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上将回忆，得知夏曦未归，部队派人前去搜索，在下游河滩上找到了夏曦的尸体。据说，夏曦坠河时，曾经大声呼救。河沿儿上站满了人，但是连一个伸一下手的都没有，大家就像看耍猴、看大戏一样，颇为解气地看着夏曦被波涛来回翻卷，最后被滚滚河水活活淹死。虽然同志们看着这位曾经的领导死去有点不仗义，有点不讲革命情谊，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比较解气的做法。过去若干年里，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夏曦同志杀人，现在终于有机会看夏曦被杀——被老天慢慢杀死。所谓善恶因果、天道轮回就是这意思吧。

不管如何死，旱鸭子夏曦死在水里。——英年早逝，该。

英雄也好，恶魔也罢，都是远去的故事，现在翻出来无非是想寻找一点古今之间的连线。

估计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小小的夏曦何德何能，能把湘西雄豪杀戮殆尽。创苏区，没有夏曦的事；拉队伍，没夏曦的事。夏曦不过是中央空降兵，然而这是有大背景的，夏曦红得发光那会流行空降兵。老大王明就是共产国际空降兵，博古也是空降兵。当时整个中央领导层基本上都是空降兵。夏曦是国际派派往湘西的全权代表，王明的好哥们。

那是中央在白区混不下去了，去苏区夺权掌权的时代。不仅共产国际给中共空降领导，整个中共领导层也从国统区空降到苏区。他们到苏区之后就要掌控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苏区。夏曦在湘西胡乱砍杀时，大背景就是在肃反。中央红军在肃反，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也在肃反。都在杀人，错杀、冤杀的不少。

然而要说那帮人的本质有多坏也是瞎扯。看一看他们的简历，一个个都是早早甩开膀子干革命，早早加入共产党，甚是英雄了得。而且和本土那些学识不怎么高的将帅不同，他们读书挺多，理论一流，而且对苏联痴迷。那么这些文质彬彬，却英雄了得的书生理论家们为何陷入疯狂杀人的误区？要解释这一切需要引入一个概念——情感宗教化。

啥叫情感宗教化呢？简单说就是某个人把一种事业当成神圣使命去完成，凡是和使命相冲突的

障碍都要全部清除。这种感情听起来挺感人——确实挺感人，但在某些时候会陷入可怕的误区，转变成一种怪胎。比方说某个男人爱上某个女人（反过来也同样成立），把这种爱升华到高于一切的境地，就要求对方干同样的事，若不然就泼硫酸、或杀人、或杀对方的全家——这就是典型的爱情怪胎。这种怪胎就应该交给夏曦同志（如果可能的话）去管理，然而夏曦本身也是一个怪胎——革命的怪胎。

夏曦和他的战友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苏联模板，一心想复制苏联的成功模式。复制苏联模式也没啥，但在这帮读书人的心中，苏联模板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上升为道德标准，赋予其宗教情结，即和苏联相似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政治也好、军事也罢，乃至革命，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实实在在的变通。而道德非黑即白，和变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中国（不清楚别的国家怎么样）办事，不懂变通将一事无成。

比方说王明唯苏联之命是从。苏联说，左起来，王明就左起来；国共合作，苏联指示右一点，王明就在延安散布这种信息，结果间接导致皖南事变，把苏联的政治上升为道德楷模，把苏联的声音当成圣旨，当成一种宗教，是政治上的怪胎。比方说李德同志，一心按照苏联经验指挥中国红军，家底快打完了还不知道变通，是军事怪胎。夏曦在湘西兼具王明和李德的双重特性。

若非如此，很难解释夏曦在湘西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已经是最高领导，掌管军政大权。如果从世俗功利的角度剖析，为了掌控实权而杀人，杀一批就够了，没必要全部杀光。就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杀人，也就杀到控制红四方面军为止。夏曦同志不一样，恨不得连自己都杀了。如果革命需要夏曦同志去撞墙，他大概会毫不犹豫地撞上去的。如果夏曦同志有张国焘的政治水平，变一变，彻底掌控红二方面军，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国际派就不会败得如此彻底。

仔细观察夏曦的一生，早年的夏曦满腔热血。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是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工运时代的夏曦也干得不错。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出入苏联，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如此人物也算英雄嘛，豪情和意志不应该怀疑。正因如此，他才有机会成为湘鄂西苏区的一把手。遗憾的是豪情和意志毁了他，使他坚定不移地按照苏联模板改造尚处于游击阶段的红军将士。一个陷入在个人爱情上而变成怪胎的人，参照新闻报道，可能会毁掉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在政治上陷入怪胎的政治家，如王明，可能毁掉一个政党。一个军事上变成怪胎的统帅，如李德，可能会葬送一支军队。

可以如此评价：夏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夏曦同志的革命行为，特别是后半段的武装斗争时代，则是革命怪胎的所为。

所谓怪胎，即出发点是好的，方式是错的，如果手腕足够强力，结果只能是悲剧。

（6）贺龙和毛泽东

告别夏曦之后，贺龙虽然没有了南昌起义时代的高光，道路还是挺顺的。但是夏曦和湘西肃反却如同幽灵一样伴随着贺龙的一生，时不时出来闹一闹。

漫漫长征，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贺龙则带着红二方面军在山沟里挪腾闪躲，巧妙地避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顺利到达陕北。当然这和实力有关系。和另外两支雄壮的力量相比，红二方面军的血已经被夏曦放得差不多了，不太显眼。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损失较大，但损失的是兵。红二方面军损失的是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虚弱的实力直接影响了一二零师（以红二方面军为班底）的抗战成绩。作为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之一，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抗战期间并不是特别出彩，比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失色不少。解放战争时代的贺龙依然没能恢复红军时代的雄风，主要精力用在后勤保障上。正因如此，军内资格最老的元老之一贺龙，竟然和四大野战军没沾上关系。后期统兵进军西南固然威风一时，但并没有经历决定意义的战役。

五五年评定军衔时，贺龙终于修成正果，位列十大元帅第五名。以贺龙在军内的资格而论，这个排位低了一点；以战功而论，不低。这一切都和另一个人挂钩，就是毛泽东。

文革之前，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和林彪，基本上就数贺龙和毛泽东关系最铁了。在军内，下级称呼上级，享受到老总待遇的有好几位，比如说四野喊林彪为林总，三野喊陈毅或粟裕为陈老总或粟总。但是上级喊下级，即毛泽东口中能享受到老总待遇的只有三个：朱老总、彭老总，还有一个贺老总。朱老总，即朱德，长期以来“朱毛”并称，没有朱，毛也将失色。彭老总，彭德怀，战功无数，最关键的时刻保护毛泽东脱离红四军。

贺老总，贺龙，他的资格是啥呢？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固然拉风，和毛泽东的关系不大。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不是徐老总。毛泽东之所以喊贺龙为贺老总，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即对付张国焘。在毛泽东的党内对手中，张国焘可以排进前三。遵义会议之后，唯一一个真正威胁到毛泽东地位的人就是张国焘。

当年中央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分量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其中端倪：论名气，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毛泽东略胜；论地位，二人旗鼓相当，都不是最高领导人；论党内资格，二人旗鼓相当，或者说张国焘略胜；这些都是浮云，关键在于实力，当时张国焘掌控的红四方面军，实力强于中央军。毛泽东唯一的优势就是，身在中央，得到中央那帮人的认可。此时的张国焘犯了人生最致命的错误：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而非跟着中央北上。如果张国焘选择北上，以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以红军总政委和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的地位真的很悬。

然而张国焘选择南下，那是一条死路。虽然他带走了大部分红军将士，包括总司令朱德和总参

谋长刘伯承，还另立中央，发文件声称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应该停止工作，把中央改成北方局。但是如果南下可以成功，就不用长征了。南下没多久，减员非常大，大到让张国焘撤销了自己的“中央”，但是张国焘仍然在搞对立。恰好此时贺龙带着红二方面军一万多人马赶到，张国焘想拉拢贺龙这支力量。如果拉到这支力量，张国焘的胜算将增大。然而张国焘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人了。南昌起义时，贺龙对张国焘的印象就不怎么样。贺龙不但不为所动，还和朱德、刘伯承这些南昌起义的老战友一起反对张国焘。张国焘走投无路之下被迫北上，毛泽东取得胜利——战略上的胜利。

古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毛泽东挟中央以令张国焘。

史载：张国焘失败，党内再无人能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

在这个胜利中，贺龙的作用甚至大于朱德和刘伯承。没有贺龙的人马，朱德和刘伯承反对张国焘的声音也将软绵绵的。对此毛泽东心知肚明，喊声贺老总，也是真心实意的。可见要享受毛泽东的口头上的“老总”待遇不容易啊！贺龙不仅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在延安整风中批判张国焘也是相当卖力。批判会上，贺龙愤怒地对张国焘说：“你总讲我是军阀，我承认我曾经是一个军阀，但我现在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由军阀走向共产党，而你却由共产党退向军阀。老实说，我比你进步！”贺龙的这段话博得了热烈掌声，尤其是毛泽东的掌声。张国焘，成了二人沟通、合作、敬重的基础。

贺龙也非常有意思，当他佩服某个人时，总是与众不同的。他佩服孙中山，就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而非孙总理。孙大炮有两层含义，一是爱放空炮，喜欢摆理论，来虚的；二是威力大。贺龙称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即指孙中山威猛。贺龙佩服毛泽东，就喊毛大帅，即党和国家的统帅。

在十大元帅中，毛泽东和贺龙相见最晚，直到三军会师之后才在延安窑洞见面。但两人相知却是相当早，据说贺龙在很早之前就钦佩毛泽东了（存疑呵），倒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对部队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闹到军长级别了，咱们也行。

当年延安窑洞的初次见面，两人可以说感觉良好。贺龙看到的是一个相貌儒雅、说话风趣的领导。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是一个威猛而不失随和，全身上下处处透着活力的汉子。当时的红军将士，多半神情很严肃，机智幽默的毛泽东和闲不住的贺龙简直有着天生的默契。加上两人又是湖南老乡，一见面就擦出火花。

毛泽东望着贺龙说：“我们对你贺老总的大名早就是如雷贯耳哟！”

贺龙的眉眼和嘴唇都情不自禁地舒展飞扬，他朗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在一九一六年就听说过你呀，敬仰得很呢。那时就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都是人际关系的高手呵！毛泽东早年曾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说话、写文章相当犀利。贺龙行走

江湖多年，也是遇事阅人无数。所以两人相见，即使彼此恭维、拍马屁也是自然而然、滴水不漏啊！彼此受用之时又增进感情，这等手段即使放到现在也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接下来又是一番愉快的时光，毛泽东拿贺龙的胡子打趣，贺龙则用毛泽东的名字表达敬仰之情。如此这般，其乐融融。恭维的最高峰则是对彼此业务的认可。

毛泽东夸贺龙用兵：“你们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噢。红二、六军团却很聪明，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基本上没有亏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大家要总结和学习。”

贺龙则回敬道：“主席才是雄才大略呀，光是一个四渡赤水战役，就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玩弄于股掌之间。”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我们的谋略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毛泽东一生偏爱草莽气息浓厚、说话直爽的将领，像许世友、韩先楚等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贺龙比起许世友等人的江湖气又高出不止一个档次，相貌、性格、经历，贺龙均得毛泽东的欢心，加上贺龙对张国焘的表现，贺龙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一下子超过很多将帅。毛泽东多次强调：“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这份褒奖很重啊！

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那会，周逸群曾提出过警告：要警惕党内的“老鸡婆”，即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干嘛呢？具体说来就是那种人：有好处往前跑，有困难往后跑；帮助同志全靠精神支持、鼓励，为自身利益而贬损同志却是实实在在的。

国共合作期间，王明按照苏联的指示，搞了一个报告，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按照这个报告的精神，相当于让共产党跟着国民党混饭吃。别人无所谓，贺龙不能无所谓。一门老少八十口，从老爹到兄弟、姐妹、侄子，要么为国民党献身，要么被国民党杀了，好不容易跟国民党对着干，现在又让跟着国民党，不是胡扯么？！贺龙很不满。

不满归不满，不满的后果很严重的。老鸡婆们就抓住贺龙不满的小辫子，直接写信越级告状：贺龙坚持独立自主，其实是损害统一战线；喜欢闹独立性，是军阀残余作风在作怪。并提出让贺龙去苏联学习，不要留在晋西北部队云云。

毛泽东看了这封告状信后，决定对贺龙伸出温暖的大手，表示：“贺老总有三条嘛，一是对党忠诚，二是对敌斗争狠，三是能联系群众。”

延安整风期间，又有老鸡婆打贺龙的主意，说贺龙同志是官僚、军阀云云，还把洪湖肃反之事给扯出来，说贺龙配合夏曦同志杀人。贺龙一看胡子都气直了：妈的，竟然把老子 and 那夏曦等而论

之，气死人了！毛泽东再一次向贺龙伸出温暖的大手。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被整得摇头晃脑时，贺龙同志安稳如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贺龙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贺龙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如何平价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三个字就够了：刚刚的。

（7）第二次选择

夏曦在湘西干的那些事，成了一道诅咒。那个诅咒要了夏曦的命还不够，随着夏曦的牺牲，开始诅咒活下来的人，尤其是对贺龙。当贺龙走运时，他得到的评价是，在湘西和杀人狂魔夏曦坚决做斗争，保护了一批同志。到贺龙倒霉时，就有人搞材料，说贺龙和夏曦一起杀人，坑害了一批同志。这两个结论都不准确。

湘西时代的贺龙，刚刚加入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名望拉队伍啥的，但是对党内的政治斗争还不熟悉，依然满身江湖气，把党组织想象得过于美好，却不知所有美好事物本身均夹杂着残酷性，所以周逸群劝他提防党内老鸡婆。对于激进的党内老油条，贺龙别说斗了，要不是威望高点，连命都保不住。要说贺龙坚决斗争，那也是瞎扯。夏曦虽然是老大，毕竟是空降兵，人生地不熟的，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杀不了那么多人。能杀那么多人只有一种解释：即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正是贺龙和关向应的配合，夏曦在残忍杀人的过程中却没有杀出兵变。

这里的配合不是指帮助夏曦去杀人，而是在夏曦杀人时干好了自己的工作，既管好自己的将，看好自己的兵不出乱子，夏曦杀人时让他去杀，秘密杀害，石头砸死，还是乱棍打死那是夏曦的权力。即贺龙用自己的威望和权柄维护夏曦的权力，而夏曦拿这些权力去杀人，贺龙管不着也没有管。

无论如何，洪湖成了贺龙一个心结。他的家人死在那里，他的朋友死在那里，他的战友死在那里，他的兵死在那里。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本可以不死的，最终都死了。他们因为自己投身革命打敌人，最终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虽然他们不是自己杀的，却因为自己被杀。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贺龙生性古道热肠，要说不想这些问题，那绝对是瞎扯。就算一时片刻不想，时间长了也会想。就算一时片刻想不通，还有几十年时间可以想嘛。也许他有时在想，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该怎么办呢？当然他没有机会穿越回去面对夏曦，但三十几年之后，上天给了他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就是文革。

文革和肃反相比，形势、规模、手段、指导思想、乃至领导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是极左思想下的产物：出发点是好的，手段是糟糕的，结果是悲剧的。

贺龙要保罗瑞卿，应该不是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贺龙和罗瑞卿之间并无过

深的交情。当其他人批判罗瑞卿时，贺龙为何要保他呢？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贺龙知道罗瑞卿忠于毛泽东，他自己也忠于毛泽东，保罗瑞卿相当于保毛泽东和他自己，同时罗瑞卿和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看起来也很铁，贺龙本人也是。因此贺龙要保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保护一个政见相同、思维相通的同志。这是显性的原因，还有隐性的原因，就是湘西肃反留下的心结。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个人心中如果留下遗憾，就会想办法进行补偿。在湘西，没能保护好亲密战友，这是困扰贺龙一生的巨大遗憾。现在面对政见相同的罗瑞卿，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补偿。另外，罗瑞卿虽然偶尔对其他元帅不太恭敬，对他贺龙礼数还是不少的，时不时掏掏心窝子，换一个人会更好么？不见得吧。

然而罗瑞卿已经决定做一只逆风飞翔的出头鸟，要保他，是很难、很难滴。

就在贺龙明确表态保罗瑞卿之后的第八天接到通知，让他去上海开会。按惯例，他会接到一个大纲，此次却是个例外。贺龙有点纳闷，就让秘书带着作战地图去上海了。同行的还有其他元帅，他们都知道一点风声，而贺龙不知道。不知道情况的不止贺龙一个。当天晚上，刘少奇和李井泉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道：“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说：“你呢？事先知道吗？”

李井泉回答：“我也不知道。”

批判军委的总参谋长，主持日常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竟然毫不知情，岂不怪哉？！刘少奇打破了沉默，他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开会，局势已经很明朗，那么多领导啊、元帅啊都在场，却让一个叶群在那里唠叨半天。叶群是什么级别？轮到她去唠叨罗瑞卿？只因为这个女人背后的病号和毛泽东站在一起而已，只能说明局势已经乱了。就算贺龙当初保护罗瑞卿是考虑到毛泽东的原因，此刻应该明白，毛泽东要让罗瑞卿靠边站了。

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明显，那么接下来让林彪出山整合军队，红卫兵兴起。还嫌不够，那就看看毛泽东的表现，他写了《炮打敌人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时间继续往后推，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已经在讨论刘少奇的问题了。

在这次会议之前，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已经满天飞了。面对这些大字报，贺龙则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不仅自己这么说，还把他说给李井泉、王任重等前来看望的同志听。李井泉和王任重建议贺龙向周恩来反映这个问题，

贺龙也不含糊，就让薛明去找周恩来说了。

这些还是私下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间是六六年八月份，文革已经兴起，已成定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美其名曰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批斗会。既然是批斗会嘛，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然少不了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等传统节目。在这场会议中，毛泽东又一次取得胜利。在这场胜利中，贺龙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不发言，用沉默对抗。

这个太罕见了，要知道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贺龙都是比较积极的，从延安批判张国焘到庐山批彭德怀，对的或错的，贺龙都是高声讲话的。没有贺龙洪钟一般的声音，批斗会似乎缺点啥呢。在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就问：“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贺龙如实报告：“还没有发言。”

毛泽东又问道：“怎么不讲一讲？”

面对毛泽东的紧逼，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哟。”这已经不再是上不上纲的问题了，而是在和毛泽东唱反调。平常的时候在小事上唱反调没啥，在战略性问题上，毛泽东不会容忍任何反对者。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有人见此情景，甚为贺龙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贺龙却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这是在装傻卖萌。如果真傻真萌，他贺龙也不会能成为元帅，不会主持军委。

贺龙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要和毛泽东搞对立，只是表示一下态度——认可刘少奇。

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刘少奇和毛泽东已经有隔阂，搞了几年的四清运动更是加深两人的矛盾，在文革初期他们已经向彼此摊牌了。作为上层人物之一，贺龙经历了这一切，对种种现象了如指掌。应该说从保罗瑞卿开始，贺龙已经决定表态，即认可刘少奇。

那个对张国焘不认可，对彭德怀也不认可的贺老总，为何对刘少奇认可了？那么刘少奇和贺龙之间是个啥子情况呢？

早期的贺龙和刘少奇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关系。战争年代，身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军内老资格的贺龙，加上毛泽东的信任，风头不弱于位居党内二号人物却没有战功的刘少奇。而且以贺龙喜动、好幽默的个性，也不见得会对沉默寡言、严谨刻板、说起理论滔滔不绝的刘少奇有多少特殊的感受。

那个年代的军内大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也没见得哪一个成为刘少奇的死忠。除毛泽东之外，将帅们也就是对周恩来比较信服，因为周恩来在军队干过，而且干得很不赖。贺龙也是一样，即使建国之后，贺龙对周恩来的尊崇依然多于刘少奇。

如果说非得扒两人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国家主席和军委副主席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关系，也就是工作关系。扯远一点，也就是贺龙和彭真关系不赖。贺龙和薛明的关系就是彭真代表组织去撮合的。建国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和罗瑞卿、贺龙来往较多。彭真闲来无事会去贺老总家串串门、唠唠嗑之类的。比方说薛明去北京市委搞宣传工作，彭真是打了招呼的，彭真又是刘少奇的臂膀。当然在非常时代，这些关系已经足够把贺龙、刘少奇联系在一起。

贺龙不愿意表态，相当于把自己划到刘少奇的阵营里。

即使刘少奇真的上台成为一把手，贺龙能得到啥？总理不用想，周恩来之后还有邓小平、彭真呢，政府里面最多也就是一个政治局常委，主要还是在军内干。而此时的贺龙已经是军委副主席且主持日常军委工作了，高升一步成为军委主席？不太可能。说了这么多，只为证明一点：于私，贺龙没必要跟刘少奇扯在一起，而贺龙也没有打算帮助刘少奇对付毛泽东。贺龙认可刘少奇，动机应该和彭德怀在庐山写信一样，即从大局出发。

所谓大局，是对大饥荒的记忆犹新，对刘少奇的经济调整记忆犹新。

在前面的篇章里分析过，刘少奇的实践行为和当时的主流思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正是这个矛盾最后葬送了刘少奇。对贺龙而言，刘少奇思想理论中的矛盾他未必看得清楚，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用意也未必看得清楚，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早年冒着杀头危险拉大旗造反，说浅一点是为了活着混饭吃，往深了说是为了民族大义。革命成功之后又弄出大饥荒，贺龙心理有着巨大的伤痛，正如湘西肃反把自己人杀得七七八八而留下的伤痛一样。所以贺龙认为没必要再搞巨大的运动，特别是要把革命一辈子的老同志打翻在地的情况下。

对于文革，贺龙至少有三个想不通：大家辛辛苦苦搞革命，不惧流血牺牲，成功之后又是辛辛苦苦工作，到老了却晚节不保，到底是图个啥呀？这是第一个想不通；第二个想不通，刚刚从大饥荒之中走出来，为啥还要采取如此激烈的方式？第三个想不通，当年夏曦那般对付自己人的极左手段，如今为何再次出现？

一九六六年的贺龙已经七十岁，却突然迷惑了，如何能释怀？

迷惑中的贺龙是可敬的。

在这三个想不通的作用下，贺龙决定表态认同刘少奇。此时的贺龙已经摆脱了多年以来对毛泽东的盲目尊崇，回到了搞南昌起义时的精神状态。他看不清前路，却愿意为前路搏一把。正如南昌

起义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一样，这一次依然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的代价是身边的人，这一次的代价是他自己。贺龙不想脱离毛泽东，却也不想舍弃刘少奇，不想落井下石，也就是成了所谓的骑墙派。如果是其他元帅，如此骑墙也就算了，最多批一批靠边站，然而贺龙偏偏手握军权。军方，恰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钱，要拿下手握军权的贺龙自然要用非常手段。

贺龙的表态应该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初，应该是把贺龙划归自己这一方的。因为从延安窑洞开始，在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别的元帅都或多或少反对或者顶撞过自己，包括林彪时不时唱点反调，唯有贺龙始终不渝地跟随，这一次怎么就站到对立面去了呢？尽管如此，毛泽东依然没有放弃贺龙，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比方说在党的生活会上暗示贺龙表态发言。

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打倒、其他元帅转行或失业的情况下，贺龙在军内的威望是巨大的。争取到贺龙，很多问题将容易很多；而且争取到贺龙，林彪在军内不至于过于独大。文革后期，正因为其他统帅完全靠边站的，林彪的地位才会一升再升，直到升无可升而成为文革运动的巨大障碍，这是后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好像也没啥好说的，拿下就是了。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依然决定再给贺龙一次机会，即让贺龙找林彪谈谈。

（8）贺龙和林彪——从婚恋说起

贺龙比林彪年长 11 岁。从性格上看，贺龙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大哥类，林彪则过于内向沉默。当贺龙名扬天下、纵横江湖之际，林彪还在为未来担忧。南昌起义时，三十一岁的贺龙风风光光地担任总指挥，二十岁的林彪只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军官，没有交集。之后贺龙孤身前往湘西拉队伍，林彪在毛泽东的提携下茁壮成长。等到延安相见，林彪已经成长为红一军团长，实力已在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之上。之后两人各自统兵征战，天各一方，命运却又把他们牵扯到一起。

命运老人巧妙地送来两个女人，把原本不搭边的贺龙和林彪牵扯在一起。

叶群和薛明曾经是朋友。两人早年都是积极活跃分子，都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当时薛明二十二岁，叶群二十一岁。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失调，两个国统区跑过来的女学生成了稀缺资源——美女，一时间追求者甚众。据说当年叶群的追求者一共有“十八路军”，叶群也是眼高于顶，一路看不上，但是绯闻不少。眼界再高的女人终究还是女人，还是要嫁人找丈夫的。转眼到了一九四二年，眼界高的叶群眼看有沦为剩女的危险，这时林彪回国了。林彪和叶群究竟谁主动一点很难说了，据说叶群常把林彪写的情书拿出来炫耀，证明自己的魅力。

这事惹起了一些老同志的不悦，心想林彪乃我党我军之英雄，怎么能任凭你一小女子戏弄？其中贺龙心直口快，觉得应该为林彪仗义一下。问题是不好说啊，贺龙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总不能

直接跑过去跟叶群说：那个谁谁不要把情书显摆了，有失风度嘛。

但是贺龙也是单身汉，四十多岁的人了，离过婚，需要重新组建家庭。处理其它关系，贺龙可以口若悬河，能说会道，远胜林彪，但是搞对象还不如林彪——林彪好歹会写情书。

西北局的组织部长陈正仁脑袋中灵光一现，何不如此这般。陈正仁就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是天津的女学生，叫薛明。”

“小知识分子我们搞不来。”一听是学生，贺龙连连摇头，说：“现成一个叶群就摆在那儿，我不吃林彪那个亏。”

陈正仁连忙解释说：“不一样，这两个人完全不同。薛明和叶群是天津就认识的朋友，性情完全不同，薛明对叶群的批评不少，老总你见一见就清楚了。”

贺龙寻思，我贺龙走遍天下，阅人无数，看看也无妨，实在不行也可以动员那薛明去批评一下叶群，算帮林彪一个忙。于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薛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贺龙司令，随同而来的还有西北局书记高岗（也是人精），还以为出啥事了呢。

贺龙不见则已，一见倾心。当时就闲聊了一下，还在那里吃了顿午饭。当然贺龙也没忘了办“正事”，即动员薛明去批评叶群：“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了一些信，这本是正常的嘛。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哟！她把林彪的信拿去叫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

“不对。”薛明用力摇摇头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张扬，明确表个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嘛！”贺龙摇头，继续说：“好就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薛明认真说：“这件事我可以办。”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有高岗同志这样的老手在，一番明说和暗示是少不了的。其他同志拼命夸奖薛明同志如何优秀，工作如何卖力等等。高岗给贺龙和薛明创造一对一的机会。正因如此，贺龙有机会迈出一大步——邀请薛明有机会去他那里尝一尝厨子做的天津包子。

当薛明去对叶群做说服工作时，叶群不但不买账，反过来还神秘地对薛明说：“我告诉你，延安来了个黑胡子，离了婚，这个人在找老婆！”薛明无语。叶群趁势说：“怎么样？他在延安很红，毛主席还为他开了欢迎会。贺胡子不太好，他要找老婆。”薛明更无语了。

接下来的事进入早期中共领导人寻找爱人的经典轨道。薛明遇到这样的情况：陈正仁让薛明去

西北局学习，学习结束之后留在那里汇报情况，天天向陈正仁汇报，贺龙以领导的身份旁听。芝麻粒大小的事汇报了半个月，讲了又讲，连薛明自己都讲烦了。当然贺龙和陈正仁听得更烦，但又不知道从哪里打开突破口，那个情形尴尬啊。薛明要回原来的单位工作，陈正仁还不放。事情就这么拖着，七月一号这天，林彪和叶群结婚了。

薛明觉得实在没啥再“汇报”了，就说：“陈部长，我实在没什么可汇报的了。你把我扣了这么久，到底想叫我谈什么？”就是嘛，人家是姑娘家，整天对着陈部长汇报也不是办法。

陈正仁一听更窝火：“哎！薛明哪，我们拖不起了。你不也有工作吗？我比你更忙，拖不起了哟！”是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薛明一本正经地说：“是啊，你这位老首长这次是怎么了？把我拖在这里不放？”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你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我听几句就够了。”陈正仁哭笑不得，干脆把话挑明：“老贺他是一肚子感情说不出来么！”要不是为了贺老总那一肚子吐不出来的感情，陈部长才懒得听一个小女子啰嗦呢。

薛明忍不住笑曰：“我听过他的报告，不是挺能讲的么？”

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让贺龙去讲南昌起义，讲长征，讲抗日，讲打土豪、分田地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贺龙不会讲感情。动了情的女人是妩媚的，动了心的男人是笨拙的。何况贺龙生活在腥风血雨中，本来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心思琢磨感情问题。

就这样，薛明被陈部长扣在西北局。既然陈部长解决不了，那就由职位更高的人物解决吧。于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出马了，出现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对白。

彭真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些人没有时间跟你拖。”

“是呀，我也拖不起。”薛明回应，道：“我在延安县也正经是个主事的人。”

“嗨，老贺喜欢你，看中了你。”彭真直截了当，说：“我们今天就说老贺这个人，别的不谈。你考虑了没有？”

薛明小声回答：“没考虑。”

“你别来这一套，你没考虑我不信。”彭真索性放开讲：“天天这么多大人物陪着你，你不考虑？你也知道贺龙的情况，他已经离了婚。”

薛明当然明白，当然考虑过。否则即使延安的女人再紧缺，也不至于有那么多高层领导整天陪着她一个小小的小干部晃悠。须知那是烽火连天的岁月，每一个领导的责任都很重大，负责很多人的生死存亡。而且当时正是延安整风，有这么多人陪自己说话，确实给足了面子。薛明说出了自己

的顾虑：“我还没干出名堂，现在结婚会影响工作。”这是第一条，工作问题，实际上是暗示自己和贺龙的级别相差太多，担心贺龙介意。

彭真答曰：“谁说结婚影响工作？我们不是都结婚了吗？还有邓颖超、蔡畅同志，影响工作了吗？不影响。”言外之意，贺龙不会介意级别上的差别。

薛明的第二条顾虑：“贺龙能不能写东西？他很能打仗，可有人是文武双全。”等等。找个大老粗，一辈子岂非很无趣，但又不能这么说，这样说的话还不把延安的领导得罪一大片啊？

彭真解惑：“打仗的就都得能写东西呀？革命有分工，写东西的未必能打仗，打仗的为什么一定要会写东西？不要看不起老粗。历史上办大事的皇帝，刘邦、成吉思汗、朱元璋等等都是老粗，能写东西的反而都是没出息的亡国之君，像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还有宋徽宗，能诗会词善画，无一不是昏君，弄得山河破裂。”

彭真滔滔不绝，又有高岗、陈正仁前来助阵。即使诸葛孔明复生，和这几位搞辩论一时片刻也不见得能赢——何况是小女子薛明。在这种情况下，薛明能做的就是一个小女子的正常反应：“不行。”无关道理、无关口才，几个大老爷们这么着给人家安排终身大事，又不是人家爹妈，置人家女儿家的小颜面于何处？男人要面子，女人讲起面子来比男人更要命。

彭真不信邪了：“还有什么不行？”几个堂堂大老爷们还搞不定一个小女子？

薛明抬出第三个顾虑：“我们岁数差好多”，这才是主要的。要想二十多岁混到贺龙那级别也不现实啊，即使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林彪，四二年也三十五岁了。

“你又想不开了吧？”彭真笑道：“爱情不在岁数大小。我也不讲大道理，讲点实在的。你看他身体好不好？”

“当然好”

“比你好不好？”

“当然比我好。”

“他身体比你好。那么，你活五十岁怎么样？”

那年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四十，五十岁对很多人而言都比较奢侈，这点薛明也认同：“真能活五十岁，也算长寿了。”那时候薛明还没想过之后人们的寿命得到大幅度提升，薛明顺顺当当活过五十岁不说，一直活到二十一世纪，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元帅夫人。

彭真又笑了：“你活五十岁，他活不过你？黄忠、赵子龙，哪个不活过七十岁？”就怕没有问题，任何问题，彭真都能给出答案。“贺龙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我党我军的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为什么这么卖力气？我在家吃饱了没事干，跑你这里来磨嘴皮子？不，同志，他是贺龙！”彭真这口才，那就一个字，刚。

薛明忽然开句玩笑：“那你回家去吧。”

不论如何，孤身一个的薛明如何抵挡住这么多能说会道的大男人。何况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死都顾不上的年代，她有机会在延安和高级将领谈恋爱已经非常奢侈了。何况贺龙人也不错，身子骨很棒，能吃能喝能打仗，在当时那个年代属于比美女更为稀缺的资源，比今天所谓的钻石王老五抢手多了。

绕了半天，薛明终于搬出来最后一个理由：“他自己为啥不跟我说？”说到底结婚的是贺龙，又不是你彭真、高岗、陈正仁。

当然彭真总有办法的：“人家表达不出来么！你们这些学生，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少，想的又多，老总是个直爽人，一句话说不对了岂不坏事？他不敢来，你就去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双方都要动才行！”大局已定，彭真和贺龙的关系也就从此铁起来。

在这场持久的恋爱演绎战中，又经过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变化，包括贺龙笨手笨脚的表白、雨夜护送回窑洞等等，最后出现了大团圆的局面：薛明穿着一身男人的衣服，和肖劲光一起散步。在这位未来的共和国大将的陪伴下，不经意散步到一排窑洞前，那是贺龙的联防司令部。薛明刚要离开，迎面来了两个大汉，拦住了去路，定眼一瞧，那两人正是王震和张宗逊。

“哎，薛明，咱们一块走吧。”王震哈哈笑着招呼薛明，跟他一道的张宗汉也说：“走走走，一块走。”两位未来的共和国上将也不客气，连拉带扯，把薛明拉扯进去，见到未来的共和国元帅贺龙。

陪同贺龙一起开会的还有另外几位，包括李富春、任弼时、林伯渠等人，都是西北局的大人物。而借给薛明男人装的好友刘革非也在，还有一帮同学啥的。薛明还没明白咋回事。

陈正仁一脸喜色地走过来：“今天正好开会，首长们都在，一切从简，吃饭时放瓶酒就算意思了。”薛明这才明白，这是摆婚宴啊。那个时候的条件艰苦，都很简单。七月一号林彪结婚，毛泽东亲自参加，也就两桌人。贺龙结婚也一样，很简单。

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任弼时说：“老贺，这杯酒你得喝吧？”李富春和林伯渠也同时说：“我们的酒也得喝吧？”薛明一看不干了，怕贺龙喝太多，勇敢地站起来，说：“我都替他喝了。”在欢呼起哄声中，薛明替贺龙喝下了一杯杯敬来的酒。

女人心，海底针啊！薛明转变如此之快，让闹酒的老同志没回过神来。

是啊，他们的心早已在一起了！

（9）风波

那一天是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是贺龙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选择这一天结婚，那绝对是喜上加喜。然而那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代。薛明嫁给林彪，叶群嫁给贺龙，人生有了归属，同时也把林彪和贺龙卷入恩怨之中。

那时节正是延安整风，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许多小人物更是备受屈辱，有人甚至丢了命。比如说那个传言和叶群有绯闻的狂生王实味就死得不明不白。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人多半老底不干净，特别是叶群同志。

叶群的父亲是国民党少将，有好几房姨太太，叶群的妈妈是第三房。如果这些出身还能容忍，那么另外一层就不好说了。抗战爆发后，叶群跟随天津南下的学生到南京，通过亲戚关系到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又在陈氏兄弟的 CC 上过岗。据说和一个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特务）关系暧昧。最要命的是另一层经历：叶群参加了一个演讲，题目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当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一个领袖当然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一个主义，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三民主义。也就是说叶群的老底很黑，薛明按照组织原则把这些给揭发出来。

现在看来也没啥，一个年轻人嘛，卖力工作而已。指望一个二十出头、现在看来尚处于花季的女人分清这个主义那个党派也不太现实，而接下来能从南京周折到延安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在延安整风那会，这样黑的老底足够资格去见马克思了。所以叶群吓得花容失色，撒泼耍赖，失态痛哭就可以理解了。无关人品，只因她害怕。

叶群之所以安然无恙，只因为她是林彪的老婆而已。这事把贺龙和林彪都惊动了。贺龙对林彪说：“我老婆揭发了你老婆，你老婆也可以揭发我老婆。”林彪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对这事自然很窝火，要说这火能烧几十年也不靠谱。叶群从此恨上了薛明，一恨就是几十年。这些女人家的恨有时候固然狠毒，但是小恨，动不了大人物贺龙。然而建国之后，随着林彪身体不便，叶群代替他掌握了很大的权力。被风暴吹落的贺龙倒下之后，手中有枪的叶群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此后贺龙和林彪的交集不多。在解放战争中林彪在东北，贺龙在西北，基本上不搭界。林彪比贺龙的战功大，但贺龙的资格更老。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虽然排名比贺龙高一点，但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实权。从性格和处事方式上看，两人也合不来。如果没有大的变局，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走到最后，大家紧跟伟大领袖，谁也奈何不了谁。然而文革来了，林彪依然紧跟毛泽东，贺龙做了不同的选择。

要说林彪对贺龙多少恨，也不太靠谱。只因为选择不同，必须拔刀相向。什么大比武啊、突出政治啊之类的观点都是这个选择之后的表现。林彪搞的那些政治口号看起来确实对增加部队战斗力无益。是林彪不懂军事么？当然不是，他只不过通过这些口号宣传毛泽东，加强毛泽东在军内的影响，达到把军队和毛泽东紧紧绑定在一起的目的而已。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本就无人能及，加上林彪一折腾，那简直是至高无上了。罗瑞卿和贺龙跟林彪唱反调，实际上就是在表态。所以要发动文革，必须拿下贺龙和罗瑞卿。鉴于贺龙的重要性，毛泽东忍了一段时间，一直忍到对刘少奇动手。一直忍到六六年九月份，就是在等贺龙的回心转意。让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给贺龙最后一个浪子回头的机会。

既然毛泽东愿意再给贺龙一次机会，为啥不直接跟贺龙谈，而是要贺龙去找林彪谈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贺龙和林彪的那次会面。

（10）生死只在一瞬间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贺龙元帅去拜访了林彪元帅。场面非常有趣，如同武侠小说中高手过招，暗藏机锋。

时间：1966年9月10号；地点：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人物：七十岁的贺龙 vs 五十九岁的林彪。

浙江厅内是另外一个世界：浅绿色的地毯，浅绿色的沙发，浅绿色的帷幕把空间完全围住，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这里没有光，没有风，没有水声。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白天如同黑夜。

在相关人员的引导下，贺龙来到那个光线晦暗的空间里。

生活在这个晦暗空间里的林彪脸色苍白得吓人。

贺龙知道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没想到怕到这种地步。

林彪握住贺龙的手，按礼节寒暄了几句。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谈这么大的事即使不谈个几天几夜，几个钟头还要吧。两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元帅相识已久，相知已久，长久以来有一些不大不小的积怨，此后怎么走将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内决定，就如同两人曾在战场上做过的决定一样，生死只在一瞬间。

合作还是决裂，将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如果合作，那就携手推翻挡住领袖去路的那个人。若决裂，那就不好意思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虽然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今天，但是为了将来的路，还是要划出个道道来。

寒暄过后，贺龙直接说明来意：“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是第一招，很直，一如贺龙长期以来的说话风格。虽没明说，都知道是领袖的意思。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一个虚招，挡了回去。

这是第一个回合。贺龙直接，林彪避实就虚。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再次出招。没意见我过来干吗？找事吗？我很忙的，林大人！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腿脚也不灵便，你天天搞隐居，见个面也不容易。

林彪沉默了一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林彪没有再避让，一下子亮出底牌，干净利索，一如他的作战风格。

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高手过招，很快很致命。

贺龙也不含糊：“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很犀利的反击，很标准的客套话。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军人都会这么回答。

然后再次寒暄道别。

一共两个半回合，就结束了。大家亮出底牌，剩下的就是战斗了，结果如何各安天命。

更为搞笑的是，这短短两个半回合的交手过程中，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林夫人叶群女士，正与几个警卫员在幕后埋伏，防止贺龙突然掏枪要了林彪的性命！简直在拍电影，不是吗？

现在流行的解释是，六六年就月十号那天，林彪在浙江厅试探拉拢贺龙不成，恼羞成怒才对贺龙出手。好像贺龙说，林总，贺胡子我以后跟你混了，林彪就会笑逐颜开。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结论就算不完全是胡扯，也是胡扯一半；就算不是故意胡扯，也是无意的胡扯。

这次别开生面的会面中，虽然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实际上还有一个没出现，就是领袖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在对贺龙做最后的试探。

毛泽东为何让贺龙去拜见林彪？他想林彪从贺龙那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贺龙向毛泽东表示忠心不奇怪，任何人询问贺龙都是这个答案。不仅仅是贺龙，当时所有人都表态忠于毛泽东，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但并不是所有人在行动上听从毛泽东。比如说刘少奇和邓小平，行动上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毛泽东要踢出那些口头上忠于他而行动上不听话的人，具体办法就是：选择林彪为代理人，如果完全认同毛泽东，就应该认同毛泽东选择的代理人林彪。要想进一步对毛表达忠诚，必然要对其代理人表达忠诚，相当于转了一下弯。不认同林彪，就意味

着不完全认同毛泽东的选择，就要挪到一边去。

那一刻，不是林彪在问，是毛泽东在问。

毛泽东想让贺龙表示跟随林彪。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么贺龙还是那个贺龙，还将继续主持军委，既不会被打倒，更不会被迫害。毛泽东绝不会真的让贺龙“跟着林总走”，他会把“贺老总”紧紧攥在手心，成为牵制林彪的棋子。伟大领袖不是一个喜欢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如果贺龙选对了，九一三之后，领袖至少还有一个真正的依靠，也不会如此孤单。

然而此时的贺龙正如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再也不愿意撤退。

鉴于此，林彪的表现绝不会像现在的资料中描述的那样“被贺龙一身正气羞辱”。贺龙的答案正是林彪想要的。如果是罗瑞卿表态忠于林彪，没问题。因为罗瑞卿一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可以完美地融入林彪一系。贺龙是一个林彪消化不了的人，战争年代，贺龙领导过林彪，林彪没领导过贺龙。就算贺龙暂时委身林彪，一旦局势变化，贺龙很快就能取林彪而代之。因为贺龙有那个威望，对此林彪心知肚明。如果林彪是有野心的，一定在心里暗喜，贺龙的回答等于判了死刑。拿下贺龙，意味着毛泽东的军队代言人只有林彪这一家，别无分店。他林彪能不窃喜？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那林彪才要仔细看看眼前这位看似豪爽的同僚。林彪不会忘记，在彭德怀没倒之前，彭德怀每一次干的罪人的事（如反教条主义），林彪都会表示“紧密团结在彭总周围，听从彭总领导。”彭德怀一完蛋，林彪上来。

那天之后，贺龙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11）布局和代价

贺龙再一次当了英雄，再一次付出代价。三十九年前，南昌起义的英雄付出的代价是数十口人断头流血。这一次，则是贺龙自己的性命。

在九月十号之前，局已经布好了。早在上海批判罗瑞卿期间，叶群拜访“老朋友”薛明，说林总对贺总很关心，我对贺总很崇敬等等。两个人口是心非应付了一番。两天之后，叶群再次拜访老友，这一次不仅仅是唠嗑，而是指出：“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孀。罗荣桓和林彪，是十大元帅中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两位。毛泽东信任罗荣桓的政治水平，就如同信任林彪的军事水平。林月琴的弟弟那本是一桩冤案，现在翻出来只因为林月琴和贺家住得近而已，无非是警告贺龙，小心点。六六年初，贺龙去了趟四川。等贺

龙回来之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人已经成了反革命。林彪已经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政变演说”。非但如此，林彪还说贺龙的手很长，到处插手要权。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罗瑞卿的。

这些还只能算和风细雨。对付统帅级的人物，真正的杀招有两个，一个是里通外国，另一个就是兵变。彭德怀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戴了十几年，贺龙则深陷“二月兵变”难以自拔。

关于二月兵变，现在的结论是这样的：林彪、康生等人为打倒贺龙、彭真而捏造的谣言。这个结论基本靠谱，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六六年春，大练兵，北京军区拉出去拉练，京城守卫有点弱。那时候的中苏关系很僵，中央担心苏联对北京搞突袭。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之外调一个加强团来守卫北京。因一时缺乏营房，曾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处借房，后并未入住。文革发生后，北大的一名活跃分子据此写了一篇大字报，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并被传抄，引起强烈反应。书生就是这样，常常意气用事——人家搞兵变也要秘密点好不好？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都在武汉，大练兵过程中的军队调动都是毛泽东和林彪布置的。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人均不知情，所以才有贺龙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调动一个加强团守北京的事。这应该算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的分内事，然而当时正是布置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任何一兵一卒的调度都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不了了之。

毛泽东要搞文革得有一个前提：掌控大局。

工人、学生出来喊打喊杀之余，斗倒一批人啥的，但整个大局还在控制之中，即遇到外敌入侵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国家也不会分裂。该乱则乱，但这个大局还在。这是文革十年和所有纷乱年代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因为这个大局还在，从文革转向改革也就是若干年的事。

在毛泽东看来，贺龙此举就是听命于刘少奇。联系到贺龙之前保罗瑞卿，以及之后在生活会上不愿意表态批判刘少奇，毛泽东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等到七月份，康生同志出马了，说彭真搞兵变，当时彭真已经是反革命了，脏水任人泼。康生同志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康生为何如此卖力宣传彭真的“光辉事迹”呢？就是要引出贺龙。彭真和贺龙的关系不错，而贺龙在北京主持军委，彭真搞政变，贺龙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当时是七月份，毛泽东还在争取贺龙。所以康生同志只能在私下里散布点谣言：“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等等。

和康生活动对应的是贺龙的表现，六六年七月十一号，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等等。

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吴法宪只是代理人。贺龙这么批吴法宪，相当于把手榴弹扔到林彪的面前。大概是李作鹏和吴法宪这两位还是嫩了点，不仅是贺龙，其他老帅看他们也不爽，纷纷发表批评教育的言论。搞得林彪很被动，只好说：“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贺龙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这是明摆着要军权嘛，而且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军权。就贺龙的地位而言，算不上要军权，就文革之初而言，完全是在要军权。

所以此后林彪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教导曰：“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然后吩咐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这一天是八月二十八号。又过几天，九月二号，林彪又在电话中指示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同志：“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所谓材料，就是告密信。

贺龙在七月份批评吴法宪，为啥到八月底才写材料呢？那是因为八月份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林彪成了党的副主席，刘少奇的地位下滑不说，还在党的生活会上享受批判。大家都在发表看法，刘少奇也是主动检讨，唯有贺龙不表态，贺龙此举耗尽了毛泽东的耐心。林彪已经知道贺龙快完了，便给毛泽东寻找拿下贺龙的借口。

材料很快写好了，送到毛泽东的手上。九月五号，毛泽东把吴法宪写的材料给贺龙看，跟贺龙谈了谈历史问题，包括民国初期的护国战争等等，用意还是告诫贺龙安分点。民国初期的贺龙是什么人？典型的不安定分子嘛！当然毛泽东也安慰了贺龙：“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并且重申了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这叫大棒加胡萝卜，还是促使贺龙回心转意。大棒来自林彪，胡萝卜来自毛泽东。这是所有领导人的用人之术，即好事自己干，脏活累活留给追随者。古今中外的领导干部，玩不转这一招的都不合格。胡萝卜之后又是大棒。

三天之后，九月八号，也就是贺龙和林彪决定性会晤前两天，林彪在军委会议打招呼：贺龙问题很严重。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九号，毛泽东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实际上在拜访林彪之前，贺龙的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了。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贺龙依然做出了让人尊重的选择，即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愿意低头。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号那天，我们又看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号那个豪气冲天的男人，那颗无所畏惧的心。

——身虽老，心不死。然而当英雄是需要代价的。贺龙固然英雄了一瞬间，也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九月十号之后，风雨之中的贺龙更加飘摇了。

一个叫宋治国（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的软骨头写了四封揭发信送给林办主任叶群。叶群耍了手花样，让宋治国写个保证，说这些材料是真的。非但如此，还让林办的秘书写个证明，说宋治国保证了材料是真的，现代版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呵。

宋治国写的是啥呢？一篇奇文，大概是这样的：“罗瑞卿家里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的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人家办公桌下面放谁的照片也管。然后以此为基点可以做一系列的推断：“我觉得（注意这个词）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并且“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好像在旁边看着一样，如同超级特工；比高级特工更高级的还有：“贺（龙）本人自己的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而且，“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看到这些就纳闷，一个警卫处长竟然对一个军委副主席知道的如此清楚？！如果需要，材料上估计还会写明贺龙身上有多少根汗毛。

这位宋治国处长根本就不应该去军委，搞编剧的话肯定能挽救电影市场的。实在不行，给《天方夜谭》写本续集也不错啊。

以这些材料为基础，又有告密者进一步发挥：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以便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泽东！把董必武也牵扯进来了。不但牵扯到董必武，连周恩来都惊动了。周恩来亲自找到董必武确认情况。董必武自然吓了一大跳。据董楚青回忆：贺龙是给过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一支手枪，但那是十年之前。当时董楚青和一帮男孩子去贺龙那里玩乐。贺龙很开心，就送他们点礼物，鸟枪啥的。贺龙见董楚青一个女孩子不好意思开口就送她一支小手枪。一九六七年时，小手枪已经不能用了。

从二月兵变到刺杀毛泽东。经过一系列折腾，贺龙越来越黑了。当然这事也少不了江青同志。江青跑到清华大学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曰：“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当然不是因为贺鹏飞有多牛值得江青跑一趟，而是利用这事在红卫兵中造势。接下来江青同志又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贺龙有问题。”然后就是程序问题，大字报了，抄家了，抓批斗（没抓住）。最后没办法，贺龙躲在周恩来的家中。

在贺龙越来越黑的过程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成为最大的走资派。其他人更惨，比方说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批斗时脑袋上戴着十来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直到身亡；东海舰队司令员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枯井里；比如说许光达死在马桶上。虽然躲在周恩来家中，吃喝不愁，贺龙依然不安全。

六七年一月七号，林彪同志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

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林彪话不多，总能语出惊人。说贺龙经常请客吃饭那是对的，拉关系可能也是存在的，各军区、兵种都有贺龙的人也对。但是，他如何能看透贺龙灵魂深处的秘密的？异能？这已经不再重要。以林彪当时二把手的地位说这话，贺龙已经完蛋了。于是全国各地开始揪斗贺龙的亲属、部下以及同贺龙有过工作联系的人，罗织贺龙的罪状。

十二天之后，也就是一月十九号，周恩来终于顶不住了，和李富春一起代表党组织回到自己家和贺龙来一场“正式谈话”。大意就是说：现在党中央认为你有问题，洪湖肃反（又是这幽灵）到现在到处插手夺权等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贺龙当然很不服气，想要辩驳。周恩来知道说也没用，阻止了贺龙：“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这算诺言，也算命令。如果是诺言，周恩来没有实现。如果算命令，苦了贺龙。

对于这次谈判，贺龙当然非常非常失望，喃喃自语：“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然而周恩来没能满足贺龙敞开心扉说一说的愿望，不顾贺龙的黯然神伤，留下一句：“我还有事。”就离开了。周恩来确实有事，有很多事要干。但匆忙离开，只是不愿意面对贺龙而已。周恩来明白，此时贺龙需要一个公平说话的地方，希望就在他身上，但他也无能为力。既然无能为力，何必彼此尴尬对视。这是周恩来、贺龙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三十几年的战友关系从此阴阳两隔。

这事为啥是周恩来出马呢？对贺龙那个级别而言，除了毛泽东，也只有周恩来能够说服贺龙了。这是文革的三大特色之一：江青到处煽风点火，林彪时隐时现，周恩来到处浇水熄火。凡是别人不便点火之处都由江青去点；凡是难以掌控的局势都由林彪出面；凡是难以剿灭的火苗都由周恩来出马。贺龙这事，以贺龙的个性，换成别人来谈判估计会拍桌子摔板凳。

就这样，贺龙夫妇去了西山。此时贺龙七十一岁，这位在共产党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英雄从此失去了自由。失去自由的贺龙是苦闷的，那些想不通的问题依然在脑子里徘徊。苦闷归苦闷，他贺龙这辈子大风大浪经过了，一辈子也有了交代。唯一担心的是孩子的问题，担心阴险之人对孩子下手。罗瑞卿也这么担心孩子，担心被斩草除根。好在文革固然残酷混乱，还是守住了这个底线，没有真正伤及后代。虽然贺龙惨死，虽然罗瑞卿身残，他们的孩子也受到牵连批判，但终究安然无恙。

贺龙等啊等，等到叶子黄了，叶子落了，秋天过了，最终也没等到周恩来。薛明这样描述：“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每逢这样的時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

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在那个时候，如果连周恩来也罩不住，那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那么贺龙怎么样呢？夏天热，本来多用水。一连四十五天，贺龙和薛明只能得到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瓶瓶罐罐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大雨之后，贺龙和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七十多岁的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一连十八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来。还是薛明急中生智，用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总算缓解了贺龙的便秘。

住宿条件不好，加上精神苦闷，贺龙本来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下各种病状纷至沓来：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等等。等到六八年三月份，贺龙又患脑缺血失语症。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诈病”，在病历上写上毛主席语录：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窝火不行，病未治愈，就出院了。很残忍么？参照罗瑞卿的治病经历，就会发现这个医生还算仁慈了。

生性豪迈的贺龙哪能受这等窝囊气，愤而出院。专案组对贺龙照顾得更加细致，每天要求贺龙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美其名曰防止和不存在的特务们传递信息，实际要剥夺一个老人享受阳光的权力而已。为了不让贺龙睡得好，把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伙食方面：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嚼不动的豆角。都是“绿色”食品呵。这么做的目的是啥呢？很简单，就是要搞疲劳战术，让贺龙吃不饱、睡不好，交代罪行。而且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啥叫背靠背呢，就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就像苏格拉底搞辩论一样。

问题之一：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

问题之二：三三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

问题之三：湘西肃反，为啥要和夏曦站在一条船上？

还有什么大军阀啊，反党反毛主席啊，如此等等，像苍蝇一样向贺龙扑来。比如说南昌起义，贺龙要是搞点阴谋，估计周恩来等人早就当烈士了，说不定林彪都不在了。比如说湘西肃反，贺龙要把自己人杀光？至于熊贡卿同志，更是冤枉，直接被砍了。连两方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都不顾了。贺龙看了之后那是一个怒火中烧：“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突然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那“冤”字写得特别用力。

其实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恶心贺龙的，从精神上折磨他。这叫身心两手，双管齐下，就不信拖不死你。一个七十多岁、一身病的老头子哪能经受如此折腾。对此贺龙看得很明白：“他们硬是想把

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然而此时的贺龙已经是油灯将尽，想战斗也没多少战斗力了，因此他的病情更严重了。

雪上加霜的是，六八年十月十三号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贺龙丧失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毛泽东宣布不当贺龙的保皇派了，此时的贺龙已经成了死老虎。毛泽东为啥要到这个时候说这话呢？按道理说，此时军方已经是林彪一人独大，文革的最高潮已经过去，毛泽东应该继续保贺龙才对啊，老糊涂了？当然毛泽东已经很老了，但并不糊涂。

文革之初，毛泽东确实想过保贺龙，保住贺龙对毛泽东很重要。然而贺龙选择一条路走到黑，毛泽东再保他已经是浪费力气。此时的贺龙已经成了文革被打倒的标志性人物，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就是贺龙、彭真、罗瑞卿这些人了。对于这些人，没打倒之前可以保，打倒之后再去保，相当于否定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嘛。在当时，毛泽东绝不会容许任何人、任何事反对文革的。

半年之后的中共九大，实际上是一次大换班。之前的政治局委员，要么成了反革命，要么靠边站。上来的都是新手。事实上在六六年九月十号，林彪和贺龙的谈话失败起，毛泽东已经不是贺龙的保皇派了。毛泽东宣布放弃贺龙，也就是断了“右派”们的政治幻想，同时给贺龙的竞争对手林彪吃一颗定心丸。

此时贺龙又是怎样一个心境呢？一句话，心知肚明。某日，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相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他的看法是对的，毛泽东确实“有一天”说了这样的话，但那是在贺龙和林彪均归于尘土之后。应该说虽然身陷囹圄，但贺龙对毛泽东依然不失尊敬，就如彭德怀最后时刻依然评价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个道理。对林彪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和薛明说：“我看，我们党里出了鬼，出奸臣啦。现在不是我们个人命运如何，而是整个党、整个国家都处在危险之中，人民正在受苦难啊！”他不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却不愿把这一切归于毛泽东身上，可以认为这是贺龙的局限。那么哪个人又是没有局限的？有缺陷的贺龙却能认识到：“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这些话即使从刘少奇嘴里说出来也不过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接下来贺龙的情况可想而知。病情越来越严重，连续摔倒，医生却视而不见，只催写“犯罪材料”。六月八号早晨，贺龙连续呕吐。薛明去找那位驻地医生，但医生同志外出了，中午才回来，直到下午才打了一针“止吐针”，但不管用。接下来有人给七十三岁且身患重病的共和国元帅送来了晚餐——黄瓜汤。薛明把碗端到贺龙面前说：“你能吃一点儿吗？”贺龙看了看汤说：“你看那汤。”薛明拿起筷子一挑里面全是老黄瓜皮。这盘老黄瓜皮煮的汤成了贺龙最后的晚餐。下午五时，贺龙

血压降低，腹部剧烈疼痛，驻地医生才决定向上级报告。四个小时后，上级派来两个医生。此时距贺龙早上发病相差十三个小时。

两个医生也是高人，不做血糖、尿糖检查，而是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看看贺龙有没有“畏罪自杀”的企图！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第二天，六月九号零点五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然使用那种高渗葡萄糖，而不是胰岛素。于是贺龙的病情急剧恶化，两位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点四十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常言道：医者仁心。仁心是高级要求，不求仁心，但求人性。

此时贺龙神志仍很清醒，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五年之后，最后时刻的彭德怀也是这个反应。

九号早晨五点半，专案组人员陪伴下的三〇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又是检查，又是请示，直到七点，医院才答复：“可以送来。”贺龙明确表示不愿意去，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贺龙越是不想去，他们越是坚持要送贺龙去住院，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是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却都是一张张木然的脸，谁也不表态。为了不耽误时间，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贺龙微微睁开眼深情地看了看薛明，也紧紧地握住了薛明的手，这是他在世界上最信得过的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握手。此时他们想到什么呢？应该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薛明穿着一身男人装当新娘子的情形吧。

上午八点五十五分，贺龙住进医院，直到十点二十五分才开始治疗。半小时后，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又过半小时，主治医生才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也就是下午一点半。会诊时还不让专家接触病人，不让专家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如此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旗帜、元帅榜上第五号人物含恨离世，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分。从入院到逝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每个人都是要死的，贺龙也一样。就人生而言，贺龙一生已足够精彩，远胜我等芸芸众生。就在当时的乡下，还有许多老人患病之后连看医生的机会都没有，境况远比贺龙差。为何把贺龙的遭遇拿出来晒？只因贺龙的处境特殊而已。对于后来人而言，介意的不是贺龙死去，而是贺龙死去的方式。那方式证明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后人在为贺大元帅惋惜之时，更希望那种悲剧不要再重现世间。最为重要的还是，每一个老人生病之后能得到治疗的机会。这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最基本原则。

从贺龙所在的时代到现在，中国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但也不能说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所以国家的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又啰嗦了，呵呵。

好吧，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那个悲剧的时代。